

著名世界譯漢

未來的世界

(下)

著 威爾斯
譯 楊熙

商務印書館發行



H. G. Wells
楊 萬
懿 良
熙 炯
著 譯
校

漢譯
世界
名著

未
來
的
世
界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十二月初版

(35427)

漢譯世界名著
未來的世界三冊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每部實價國幣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 G. Wells

譯述者 楊 懿 熙

校訂者 萬 良 炯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F一五七六

嚴

(本書校對者 王養全 滕秉吾)

第三集 世界復興 新式國家的誕生

一 新式國家的計劃

在以前數章已把個人資本主義文明的最高峯，以及牠的混亂與崩潰的過程說過了。牠是一個普遍的禍患，牠帶給千萬生靈以無限的痛苦和挫折。我們已經看見渴望統一和平思想的初現與挫敗，再現與再挫。最後，牠再捲土重來，得到勝利。這個問題便解決了。

在一九五〇年前世界的不能統一，原因是很簡單的：沒有一個包羅萬有的計劃；半世紀後所以能夠統一，是因為彼時整個問題已經提了出來，解決的情形已爲人所深悉，而對於此事直接感覺興趣的一個社會階級，已經分化而進行工作了。於是新式國家已經由一種空洞的思想，成爲一個具體與可行的計劃。

人類所以不墮陷深淵，並不是由於道德的力量，而是智力的恢復。重要之點是這樣：社會與政治科學已經追蹤禍亂的步驟而且超過牠了。

在這些災害頻仍的時期中，在暗地裏堅決地工作的人員，把那個啞謎逐漸打破。勞工的數目與所生的結果是極度的不平衡。集會的心理，團體的心理，是社會生理學的一面，而在此時之前，是完全不爲人所注意的。人們對於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的原起作用與過程，仍然非常地模糊。人們於其累積的關係之網，接受了最武斷與最簡單的解釋，甚至連這個社會網的根本變遷，都一無所覺。妄想、癡望以及劫厄，使勢所必然的接踵而來了。

如果你向一個一九二五年的普通歐洲人詢問關於他的政治活動與集會的動機並他個人的普通社會行爲，他一定會感覺你這樣問法是太魯莽，就使你把這度難關打破了，他的答詞不是說家庭爲社會組織的核心，由親屬的範圍推廣而至於帝王那一類的廢話，便是向絕端相反的方向發言，對你說上一大篇他與他的同儕，在同意的主義下，爲互保與互助起見，所藉以聯合的盧梭 (Rousseau) 的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 附和兩種相反的言論的人，也是差不多地平衡的。

在一九二五年時他不會談宗教的關係，或者在五十年前他會根據『天命』(Divine Will)的學說而大發議論哩。他對於交錯關係的金融組織的重要，並不表示遠慮，他會像羅馬的前人，昧於措施得當的金融是初步的社會重要點。他會認為這是一種工作的酬報，購物的媒介，或者還會很不快意地說『金錢是『萬惡之源』(The root of all evil) 啊！如果說及愛國的事情，他一定舉出家庭觀念作答案，以證明綜錯的憎恐與連帶的忠誠，他又會說及『母國』或『祖國』。如果他是具有智術技能的，他的心理不一定要和他的職業或職工聯合會相符，這與他的愛國心是不可比較的，或者是此勝於彼，或者都向迷信與性慾的複雜心理投降。

偶然地他會洩露深的妬忌、迷信與懷疑的主義，在每一個弱點之間叢生，而他的觀念，也多少受了那無所不在的憎恨心理所薰染。在他的眼光看來，由這種不相連貫的事物所作的觀察與動機，都是非常地自然的，他會絕對不知道學校的教育與環境的濡染是鑄成他的思想的冶爐啊！

在千百萬一知半解，缺乏有系統思想的人們身上，世界上的組織便這樣地飄流到二十世紀中葉來。以後便是搖蕩，而不祇是飄流了。人們自稱為個人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他們對於這個

個人是如何的，與怎樣和社會發生關係是沒有一點意識，他們是愛國的國家主義者，但沒有人說得出國家是甚麼。祇是到了這些國家互相爲敵，同歸於盡的時候，有知識的人，纔明白他們對於那重要問題『使我們團結與維持我們的合作的是甚麼？』所作的答詞是多麼地危險、情感化與不忠信啊！

這種對於社會勢力的淺見與愚昧處，正是表明教育機關與知識階級的如何地落伍與缺乏能力。普通的人，終日忙於他切身的小事，並未曾對於團體的事情，稍一介懷，原因便是當時並沒有一個溶合的有系統的思想可以刺激他的心理的。社會機體的智力是非常地幼稚。所以表演一個完全的社會反應制度，用實際可行的言詞來表明新式國家必須的思想，不特要透過政客與政治家的心理，而且還要使當時的心理學家、歷史學家與所謂『經濟學家』得到明瞭。

一九三二年團體心理學的發展，與烏司特（Marquess of Worcester）著發明的世紀（Century of Inventions 1663年）的時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情形正復相同。仍然是一件晦昧的，無系統的思想的現象。牠的不能產生世界社會有如物理科學的不能產生飛機與蒸汽渦輪

一樣普通的人，想在經濟恐慌中找尋指導（見德沙古里亞斯（Emil Desaguiliars）所著混亂中的思想與崩潰中的社會（*Ideas in Chaos and Society in Collapse*）1917年出版，）便遇到了知識的賤售。他以為總有人會知道的，但他發覺了尚沒有人想去求知。許多高尚而文明的識者，對於他的難題，都給予各種的可能與不可能互相矛盾的勸誡。他們的這樣做法，便是他們在獨立的武斷的成見中飄蕩着，對於人類生態學的根本事實，完全不相習之故。

雖然如此，在當時也有些事情是很快地被分析了。例如對於貨幣的普通認識是增加得很快。據德沙古里亞斯所述，大約有一百七十個人的名字列舉出來，是從事於此，而且包括那個不甚有名，性情急躁而於此卻極有興味的一位非專家的學者大都格拉司（Major C. H. Douglas）著作見歷史文件集經濟部 B. 一七八二〇〇）在內，他是在那裏從事掃除那以金屬標準為貨幣基礎的觀念。他們很明白地表示一個前進世界的唯一貨幣必須與那個世界不絕增加的真財富平行。他們普遍的心理，都把這個認為是基本要點。

但他們卻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方法。『都格拉司計劃』（*Douglas Plan*）為普通的社會信用

所賞識，但爲他自己的淺狹的政治眼光所限制着，他幻想着銀行家的廢除，但不是廢除他們的邊界。在美國方面『技術政治』(Technocracy)的運動也轟動一時。牠是一個很好的科學方法在純物理的基礎上說明經濟學。但牠竟成了一個新聞學式的研究，使感覺敏銳的公衆認牠是一個新社會制度的乾脆計劃，社會與經濟生活是被視爲專門家所操縱的一種能力制度 (Energy system)。在當時技術政治論者的公然反對民主政治是很顯明的。能力的單位 (Unit of energy) 便是新貨幣的基礎。這樣每一個發電廠便成了一個鑄造局，每一個瀑布便成了一個金鑛，在人類事業中，貨幣與能力是同一步伐的。第二種學說爲經濟學家斐雪 (Irving Fisher) 與凱恩斯 (G. M. Keynes) 所代表，也得了許多的附從，相信用價格表來管轄發行貨幣的思想。

這是一個不相聯系的心理醞釀的現象。很多對於金融事情最明晰的人如都格拉司與凱恩斯對於國家與帝國的界限仍然很模糊；他們想利用人工的障礙與禁制把有些現存的政治制度和一般的制度隔開，這樣的來在牠的範圍內發展他們特有的制度。他們完全不顧這傳統的政治制度的日益薄弱。他們把整個精神，放在他們的百效膏上面，而不暇計及其他的東西。如果金融的

改革論者不全是大同主義者，那些大同主義者也同樣地不能忍受金融改革者的理論，和昧於金融的重要了。

第三種學說是方言矯正那個撼動全世界的增進生產便增進失業人數的難題。應急切需要大的公共企業這又是一個失當措置。但這一派思想家是昧於修改幣制的重要性的。至於誰來管理那所提議的互助的複雜方法，如世界幣制與世界社會主義等等，更是各立門戶，見解不同，聚訟紛紜了。德沙古里亞斯在他的結論裏有這樣的一段說：『人們不能離開那行將沈沒的社會之船，最簡單的原因便是，他們目光所見的，祇是一個不完全的救生船的影子，一個大的、沒有舵的、沒有力的東西站在那裏。』

祇有最富於知識的人能够預言這種表面上明亮而實不相連貫的思想如何地自己結束，與社會教育科學開始團結之後，如何急轉直下的向實施的路上走。社會的發明急促地來挽救人類的厄運，其速度比較十九世紀的蒸汽與電力的發明更爲迅速。牠是在困難中進行的。或者便是，因為有這些困難纔使牠加速與精鍊起來。

特溫得 (De Windt) 於一九四二年所作的鉅著社會的結核 (Social Nuclation) 是一本最初對於心理法則包羅萬有的研究，其中包括分隊比賽的心理、犯罪組織的養成、工人團體、水手、軍隊、政黨、教會的心理、職業主義、貴族主義、愛國心、階級意識、有組織的研究、與建設互助的精神等等，無不具備。牠第一次用新的教育方法與新的政治觀念去把個別的心理得到相互間的了解。雖然這本書的題目不甚動聽，牠的敘論不無缺乏精彩的地方，但牠已經成爲新時代建設勢力的具體的脊梁了。

特溫得在所有的知識分子所遇到的障礙環境之下工作着。像馬克思與列寧一樣，他的著作大都成於倫敦的英國博物院，但在一九三九年仇視外人的空氣裏，他被驅逐出境。直到一九四一年纔能够由荷蘭再到英國。當波蘭第九次由空中襲擊柏林的時候，他也微中了毒瓦斯的毒，這樣便使他苟延到倫敦肺病貧民區病死。他的著作也是在那裏完成的。

後人對於他的廣闊的立論，雖加以推論與修改，但他的聲名已經與柏拉圖、伽利略 (Galileo)、牛頓、達爾文、歐文 (Robert Owen) 並駕齊驅，都是對於人類思想的擴展與表示方面，表明一個真

實的步驟的。這些人都成了社會的基礎。一九五〇年後特溫得的學說，雖然逢着混亂的世界，卻依靠世界的混亂來推動牠，竟風行一時了。

今日很少有人讀特溫得的著作，正如很少有人讀柏拉圖、培根（Bacon）、達爾文、斯密亞丹（Adam Smith）與馬克思的書一樣，但是他的思想，已經成爲人類的普通見識。他所倡立的，在今日已成爲平庸之談，但在他的時代，如果不是他苦心孤詣地將他的思想來立論，一定到現在還要被認爲邪說空談哩。

他的最重要的地方，便是他堅持人類的社會性質是完全爲人工所造成的。人是生成的，但公民是造成的。一個孩子你教他怎樣便怎樣。他接受習慣、傳統與各種普通的思想。所有他對於社會的反響與他的情感的解釋都是由他的教育而來的。

讀者們一定會認這是很明顯而用不着說的事情。但是爲明白歷史的重要，我們必須知道在特溫得的時代之前，這並不是顯然的事。一切的道德價值、癖好與偏見、仇視心理等等都認爲是天赋而來的。所以在他的時代的人都是生長於一個見解迂腐，空談玄理的空氣中，這些畸形的心理，

便反映着畸形的社會狀況。他的一分工作，便如一隻強有力的手腕把可怕的障礙物掃除，而在牠的上面重建一個清晰而固定的組織。他使柏拉圖的主張重爲人們信服，那便是：無論如何地困難，是可以由絕未受薰染的心靈上重新做起的。把他的立意弄清楚之後，他便進而爲人類建設前進的教育與生活。

特溫得使普通的知識分子明白貨幣的關係是任何複雜的生產社會所認爲重要的，因爲牠是唯一酬勞的工具。牠解放了經濟的關係。但貨幣祇是一個達到目的的媒介，而牠的價值是視乎牠如何地達到目的而定。牠本身雖然是一個交換貨物，是銀質或金質的東西，但現在並不如是了，而且，因爲把貨幣由原來的地位轉到後一個的地位的過渡時期中，感覺困難致釀成經濟制度的弊病，先把羅馬帝國主義摧毀，繼便及於歐洲的主權國。一種完全抽象的貨幣，完全脫離了其他物質的重量的貨幣，纔是人類所需要的，沒有牠，人類社會是不能避免劫運的。牠應該通行於全世界，牠所發行的紙幣應該維持一個水準的價格表，還有嚴密的法律來保障牠以避免任何謀利的壟斷。特氏以爲不單是製造假幣，就是任何的賭博與投機也須被認爲觸犯刑章的大罪。他說放債取

利是無須的。他攻擊舊的糾紛制度，使新的生產在加增與實驗過程中負起了永久的債務。他把圖利的銀行——那個『海上老人』——由企業的背上卸下來。他不承認牠的任何謀利的藉口。銀行是公衆的事業。支配信用是政府的重大工作之一。

二十一世紀的新銀行制度是根據了特氏的方法而成立的。現在銀行是我們的公衆簿記制度，我們國家統計組織的一部分，債務的清理所，以及爲種族能力，貯蓄盈餘的貨幣紀錄。牠是完全屬於公衆的而且完全無代價的。人們向來都認銀行爲私利之源，這是很難索解的。我們現在把收入與支出登記，猶之乎把生產與死亡註冊一樣。我們的貨幣，根本上是這種公開的個人數目的錢摺子。

這些各種不同的貨幣祇不過是基本的需要（Foundation need），建設重要的關係上一個數量的基礎，或照特溫得的術語叫做『社會的結核』（Social nucleation）等到把貨幣秩序化了之後，便無須再掛慮貨幣的事情，即如在一個有合度的燈光與流通的房間內，吾人用不着去掛慮光線與空氣問題一樣。

在特溫得的前二百年，那個在人類農業時代所認為社會核心的家庭制度，其界線已經泯滅，已經溶化爲較大的關係，尤其是在北方和西方的社會裏。同時牠也失去了經濟上、精神上與情感上的自主。在十九世紀中，家庭的瓦解是很急促的。女子已經由家庭內解放出來，並不專司家內養育孩子與管理家務的職務了。

普通的情感，都是把家庭統一的本能要素太過重視。其實本能的維繫在小孩子十三四歲以前便早已消失。自此時以後，父子女間的維繫力量，並不是本能的，而是出於情感、利便、習慣與傳統種種複雜的原因。這種利便、習慣與傳統也蕩然無存了。因爲外面的引誘日增，家庭的鞏固日趨薄弱，不祇西方如是，凡經歐風美雨洗禮的地方如土耳其、印度、中國與日本也莫不如是。這是一個重大的變遷。一個家庭，祇成了父子女女的會集室與寄宿所，牠已不遵循傳統的慣例，已經不施教練了。原因便是家庭以外，已有許多機關替代了牠的職務。公民是由家庭內產生出來的，但是他們不再由家內造成了。

特溫得把十八世紀中歐的家庭生活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家庭相比較。在前者，父親聚集了他

的子女，讀聖經給他們聽，領導祈禱，監守着，責罵與懲罰他的子女；甚至於到了十六七歲還要干涉子女的婚姻問題。在後者，家庭的組織是非常地鬆散的。

這個組織的解體，在特溫得之前早已普遍地爲人們所承認，不過他祇是注重於在這渙散的社會中，須有一個重新組合的計劃而已。公衆學校、工業生產的經驗與會合，每日的新聞紙等等都摧毀了家庭的精神與道德的教育，但沒有拿甚麼去代替牠。祇有摧毀，沒有建設，在這種環境之下，人心便趨向粗鄙、自私與完全個人主義的目標上走了。

特溫得諄諄地說這些情感的主張與奇異的理想，並不能使人類成爲一個社會的分子。社會的筋絡並不是由這種方法可以造成的。引路的明星是教人類向有組織的世界社會——新式國家——前進，如果想達到這個目標，如果重新改組的人類不想在半途崩潰、腐化與喪亡，這樣，全世界的人心都要經過教育、訓練與準備，而且專是爲這個目標而努力的。這是不能聽命於自然的。個人的社會方面是要自動地確定的。『社會是一個教育的產物』(Society is an educational product)啊！

把全人類引向新式國家的道上走，須要使千萬的人，個別地使他們的生命，趨向於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後可。新式國家不能像一個空殼子這樣地降臨，把人類遺棄在後面。每一個教師，每一個作家，每一個發言者，每一對談論的朋友，都是組織復興的社會制度上一個基本重要的分子。這些分子必須組織起來。牠們的生存須要被人知覺，牠們還須作有力的協助。

我們今日很難明白何以目今所視為平凡的事情在往昔是何等的不平凡，而正當特溫得著書的時候，很多懷了好意的人們，正企圖集合那不熟練與不準備的羣衆來做社會改造與世界革命的運動。要使這些沒有忍耐心的改革者，把對付那些不可能的政變、宣言、非戰與愚鈍的千年太平觀念等事實的心理，移轉到有系統的初步重組世界的必須階段上去，是極爲牽強的。這目前的工夫似乎對於他們太狹窄與太緊張，而牠的目標也似乎太高超太遼遠了。『光問人們需要甚麼是沒有用的，』特溫得說：『這是民主政治的錯誤。如果要拯救社會，你便先要思維他們需要的是甚麼。然後把所需的告訴他們，而且爲他們取得牠。』如果你不能在每一處創設核心，最低限度，你可以從近處着手。『使核心推動。你自己便做一個核心。』由生命的原始，核心是再生核心的。新式

國家是到處可以生出來的，所以可以從任何的地方開始。

在西方的文明中，他的第二個新異之點，便是他注重於發育時期的青年教育，以及反對父母們那種只照自己理想去訓練子女的權力。重組社會是應該完全的。那「核心」是一個新生社會的唯一的教育與訓練的分子，首先應該在深入研究範圍與集會內受道德上與體格上的訓練。他們的社會與政治的活動須居於次要的地位，而附屬於主要的德、智、體三育之下。他在他週圍的混亂社會之中，尋求適宜於初期結核的環境。他認工廠、實驗室、技術學校、公衆服務、醫院的職員與及各項的男女團體爲他的聚成核形的原料。他堅持建立社會制度的動機是本能的。那處發生社會的騷動，便有粗疎的力量團結起來去創設一個新的領導的秩序。

他指出他那時的蘇哥定、國社黨、法西斯蒂、共產黨與國民黨爲未來較大組織的初形。牠們雖然在狹義的忠誠與偏見之上浪費了不少，但牠們卻有着優秀階級的精神。人們並不領導着這班青年，他辯駁說：「他們是在利用這班青年本能上的需要，試試看去明白他們是甚麼——是多麼地盲目的追求啊！」

像基督教的創設者聖保羅 (St. Paul) 向雅典人宣傳一樣，他引證說：『那位你們在不知不覺中所崇拜的無名的上帝，我向你們宣佈他的名字。』他也在那裏宣佈那尚未爲人知的新式國家。

就狹義來講，特溫得的教訓是一個教育的原理，就廣義來說，牠是新式國家的說明。這是同一事件不可分離的事態。『一個社會便是一個活動中的教育，』他宣言說。爲使他的學說完全，他把他的社會組織的計劃試用到生產組織、管理與企業各項之上。人是須『合力地爲這個目標服務的。』

他以為祇有與新式國家發生相連的生活關係，纔能夠獲得充實的生活。其他的生活都是『浪費、不滿足與悲哀的。』除非人們是向着這個目標走，他使很難保持了自尊與自得之樂了。那些對於國家階級所表示的忠誠，此時已成爲陳腐而不可置信了。牠們成了不真實的。牠們並未曾盡人之所長，因爲現在我們看見牠們的缺點。牠們不復能保持生活上的『滿足。』牠們不能得一個清晰與問心無愧的人來服務。牠們到底把人們弄得非常地頹喪而變成毫無目的的人。在

以前，人們可以在他們的愛國觀念與企業上獲得充滿的生活，因為他們不知道有甚麼是較好的。但現在他們知道了。

最後特溫得向當時尚佔很大勢力的國會制的民主政治的觀念大肆抨擊。『不錯，是批評，但不障礙，』他這樣地寫。如果一個統治的組織是根本上壞了，簡直將牠毀而棄之，不要抱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觀念，而取了一個決定的態度。國會黨政府，那時已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不絕的修改反使牠腐化，疊出的計劃反使牠衰弱，百端撓阻，黑幕重重。而反對每一個在朝的政黨的，還有一個在野的敵黨，牠的目的似乎完全專注於顛倒黑白，旁敲側擊，陰謀破壞那在朝政黨的一切行政，希望藉此，可以把牠推翻，取而代之。在這麼一個的環境裏，是向鑽營之士，大開方便之門的。

所有這些衝突的思想，都要廢除。『很多事情是不能有兩個好的而又相對的主見的，』特溫得說：『假說牠是有的，簡直是廢話。正當的法子祇有一個，但不合法的法子卻是無窮。一個政府若不向正當的方法進行，牠便是犯罪。抵制破壞的手段必須停止。牠是前進運動中的一個最醜的罪惡。牠是一個根本的社會罪惡。』

他對於批評與反對兩點異同的討論，是二十世紀的英文散文中最好的一種風格，可惜讀此者甚少。批評的權利與盡其批評的義務是現代公民根本重要之點。他思維這種權利與義務如何地已經爲意大利的淺狹的法西斯蒂所忽視，以及爲俄羅斯的暴力所壓抑。他分析西方社會的魯莽檢查輿論。在宗教、政治、商業的團體裏，又沒有法律去範圍壓迫輿論的陰謀的。他反對禁止輿論的警告，沒有像他的普通革命計劃那樣立刻生效。很多人不明白他的命意所在。實際上，當人們掙扎着去維持航空獨裁的時候，世界秩序與反對精神的衝突也時時引到壓迫忠實的批評。漸漸地批評與提議，不知不覺之中流而爲激動與反叛的宣傳。

特溫得的乾脆的革命計劃對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精壯的青年是很新穎與麻醉的。此處我們只要把牠的重大的建設觀念簡略地述出來，無須去把他那由核心而連貫世界宣傳的高瞻遠矚的計劃詳述，因爲在不知不覺之中，這個組織已經成爲今日的教育制度。這一本歷史和其他有用的書都可以奉獻給他。他的複雜的與詳細的世界革命的步驟，我們可以不必過細研究。（其書第五集 *The New World in the Body of the Old* 所論大半屬此。）因爲我們現在可以談這

個偉大的組織的本身了。

在有些方面，他是顯得有預知之明，在他方面，他把人類的反響估計得不準確而且很錯誤。人事的改造，不免有些或者會使他嚇退的那種極粗暴的作動。他並不是在那些附和他的，希望實現這個幻想的千萬人民，把這個幻想，由理想變成事實以前，對於一切建設新式國家的主要原素，說得不甚明白動聽。他把牠做成了像定命似的，所以牠也便成了定命。

在幾年中，他的學說遲緩地散播開去。知道的人也漸漸增多，但在開始很少有人肯細心去研究牠。人們不是說：『這是對的！』便說：『這是不可能的！』等到他的學說成了世界的一個權威的時候，特溫得墓木已拱。他也像馬克思一樣，絕對不知道他所播的種子是有甚麼的收穫的！

當我們描述國聯的失敗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試驗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當時的執政人物與普通羣衆絕對沒有一種覺得一個新世界制度的必需的觀念。當時的政治家、外交家、與政客們所給予我們的印象，只是他們昧於一切的事理，就現在人們的目光看來，都是瞭如指掌的，而且很難令我們相信，這種盲目是出於無心的。的確他們是看不見。我們再讀他們在會議中所作的

演說詞，直到他們的聲音爲破壞的高潮所淹沒，我們必至歎息而說道：「你們這一班蠢子！世界的統治不是在你們的面前嗎？難道除了禍患便無他法了嗎？」

但事實上，世界的統治，卻並不在他們的面前。慢慢地、辛勤地、用了恆久的復述與輕微的更改，這種思想纔能够散播融化在人們的心目中。特溫得的受人類頂禮，並不是因爲他發現了甚麼新鮮的學說，而是他把顯而易見的事，加以發揚光大，使至愚的人，也認識牠的重要而已。

二 思想與行爲——革命的新模範

對於個人的自尊心的一個打擊，便是沒有一個人和一個單獨的一種人能够把社會最簡單的事情做到的。甚至耕地生產食物的人，也不能自製生產的器具，與揀擇那給予他盈餘的種子和植物。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荒島的故事，說一個單獨的人，祇用幾件世外的工具，可以在異常惡劣的天氣狀況之中，一個人跡不到的荒島島上，使得自己舒適與安全，是一種事實上不可能的觀念。在這個最高度不安全的時代，人類的互相倚賴，尤有必需。這樣新的時代纔能够從當時的經濟與政

治崩潰之中脫逃出來，而創設我們今日的社會制度。

首先便是那班知識分子，那些置身事外，缺乏領袖與實際組織的才能的人物。像特溫得一樣，他們計劃着一切，但也祇是畫餅充饑，毫無實效。而在人類冒險事業之中，這種人是不可少的，因為他們能把一切的事略加以剖別；尋根追源，使人類知道怎樣地去工作。其次便是那些有幹才的人，能够把所得到的一個複雜的觀念，握住其總經，並且把一切的障礙物去除，聚精會神地進而實地施行。缺乏幻想，正是他們做這樣工夫的一個長處。沒有一個心多外騖的人可以專心注意於一件事情而使牠成功的。沒有深遠的幻想，而長於實力的人，是革命必須的執行人物，而革命的利益如何，那就要看所輸給於他的理想，是否健全了。

因為革命需要這種補充的人物，所以歷史上不再在新式國家的故事中，產生一個梭倫（Solon），一個摩西（Moses），和一個孔子。特溫得並不是一個創造者，而是一個集大成的人物，他把當時的智力的光線，集中於一個焦點之上。

這最後革命的燃犀，並非單獨的腦力所能成就，牠是由千萬活動與竭誠的腦力，一試再試，不

援前例，與以前的物理、生理科學，是整個有關的，並不是個人的感覺，而是在整個人類的直覺中發
現着。

我們已經注意到新式國家的思想，是萌芽於許久以前；我們已經表明在十九世紀時的經濟生活力量是如何地向這個路上驅策。在福特與威爾遜的腦子裏，已經有半本能式的激動。到了特溫得的社會的結核（Social Nucleation）一書中已經成了一個具體的實際計劃，具有重要的設計組織與一切須要的條件。新式國家已經不是一個空洞的幻想，而成了一個計劃了。富於實力的人，便可以採行牠。

甚至在一九四〇年中的戰爭漩渦以前，倡言新式國家運動者的品流也大有變動了。現在是計劃好了交給堅決的人們讓他們把個人生活與新式國家觀念合而為一。現在是由想像的人，交付於任事精幹的人了。最初的宣傳者大多數是富於想像力而缺乏現實能力的人；一羣非戰主義者，痛恨戰爭的爲害，認唯一避免戰爭的方法在建設一個世界的和平；一班的作家、純粹的科學家、青年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勞工運動中的知識分子，都是這個旗幟下的戰士。現在卻有無數

的工程師、建築師、熟練工頭、工業的組織者、各種的技術人員、工商業的鉅子，也都高談新式國家，對於這個提倡加增努力與注意了。

這種轉變是很明顯的。社會狀況的混亂疊增，使有精力與實際工作的人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在初期繁榮時代，與大戰後表面上恢復的時候，這班人都可以在大規模的工業中，按了自己的才具獲得相當的位置。他們組織大規模的企業，大量的生產；牠們發現很多新的發明；他們開發無量的富藏。他們把生產量增高，竟超過了人類社會的購買力。如果事情是一直這樣風平浪靜地過去，他們是用不着為政治與金融的事情而操心的。有時他們之中，有些是在銀行組織上表示很不安靜的，即如自然派的工業頭腦福特，在他的生命史裏和銀行家也起過兩度的鬭爭；但普通說起來，政治與金融的緊迫空氣，是自從胡佛時代的經濟恐慌之後纔開始使人注意的。

於是他們開始用應付大事的人力與容易收效的工作能力去對於社會的狀況，加以思索、談論與著述。蘇俄的偉大試驗，使他們既羨且妒。而由當時技術學校出身的青年，一方面受了以前書籍所給予的印象的鼓勵，一方面希望着物質建設上冒險與成就，很快地感覺他們的前途，是愈為

光明了。

照這些人看來，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似乎是一班無聊人們的工作，這班無聊的人們包含批評家的刺斯欽（Ruskin）、美術家的莫里斯（William Morris）、戲劇家的蕭伯訥（G. B. Shaw）和其他一班不着實際不能取信的人物。在他們的腦海中，湧現了哥特式建築，黃青色的畫簾，修長的頭髮，反對活體剖解與素食主義的印象。在一九〇〇年，沒有一個科學家與技術家是站在革命方面的。在一九三〇年以後，三分之二的技術家與科學家是積極參加革命工作的。從此以後不再是勞工階級的叛亂，而是知識階級的革命。他們的腦中到處找尋新思想。他們覺得特溫得的那一本書是正中下懷。他們便開始很堅決地來倡導新式的世界國家了。

這是革命思想中的革命。那些容易變化的革命精神便截髮易裝，自爲設計，來創造一個新的典型，在有秩序的方式中進行工作了。

三 技術的革命

在西方社會中有這樣多的科學與技術人員，與這樣敏捷的感覺到週圍環境日就恐慌，便是第一次與第二次崩潰時期最大的分別了。

我們在羅馬歷史中是找不到像這樣的前例的。當時有很多沒有科學知識的沈沒於傳統觀念裏的技術人員，和這些技術人員風馬牛不相及的。又有一班毫無實力的哲學家，他們的思想是脫不了基督教的束縛。技術人員與哲學家是各不聞問的。史冊所載，哲學家有公然鄙視技術人員的表示；很自然地技術人員對於哲學家也有相同的反感，祇是不載於明文罷了。似乎這兩種人都會稍稍注意於那大的社會勢力方在那裏毀壞他們公共的安全，把羅馬帝國變成了一個野蠻的冒險者的大戰場。

吾人很懷疑那帝國與專制政治曾否對於任何苟延殘喘的衰落有一個真的感覺。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歷史家如奧支爾維 (Ogilvy) 與弗勞得 (Frendl)，在他們所作的羅馬史 (Roman History) 居然幻想着凱撒 (Julius Caesar) 屋大維 (Octavius) 奧理略 (Aurelius) 或杜密善 (Domitian) 等帝王是具備了今人的才識的，他們把這些帝王描寫得都是按新式的方法來計

劃的。但在拉丁的紀載內，便無可考據了。祇有一個羅馬古國所具的特質是比較上合於時用的，那便是普遍的建築工業。牠在衰替之中仍舊繼續維持着，但在直覺方面牠並不是政治性質的。

學生們尚把保存下來的美術與建築的神密加以研究。很多知識是失去了，但也有一個真的留存。中世紀的泥水匠，他們建築了那些脆薄而美麗的哥特式教堂，是一種保存傳統的工夫，仍未脫埃及金字塔的建築師的窠臼。但他們沒有政治的觀念。他們有一種保護式的行會組織，像資本主義時代的職工聯合會一樣，他們干涉地方的行政是為他們自己的職業起見，絕對未曾對於整個的社會秩序有何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目光，是在智力的水平線之下的。

二十世紀的崩潰制度裏的熟練與指導的人們的品質便比較活動了。他們的訓練不是囿於傳統而是向前邁進的，比較其他任何階級都來得進步。他們對於範圍、方法與原料的根本變遷是覺得慣常的。他們只要一感覺其活動受嚴重的阻礙，他們就不能再服從其所處的政治經濟生活。同時，當世界出版界，發現了這個轟動一時的術語『技術政治』以後，同時在世界報紙上的一轟動一時的『技術政治』的呼聲中有一位機械工程教授華爾克 (Miles Walker)，在英國科學

促進會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中居然大膽地以工程效能的標準來整理當時整個的制度。在那腐敗的時期內，社會秩序的黃昏中，到處的工程師、工業家、物理科學的教授們，著述談論，都是建設的政治問題。他們向政治的範圍進攻了。有蘇地 (Soudby) 教授者，是科學的先進人才，此時已經不單管自己的事情，而從事於商業的心理學了。

在開始的時候，這些技術人員與商人也不過徒尙空談而已。他們並不立刻實行工作。他們仍以為政客們與金融的鉅子是這些事情的專門家，即如他們自己的習於發明一樣，所以他們祇作要求有實力舉動的呼聲，而昧於當時政客們與銀行家所處的環境，是絕對不讓他們有根本的改革的。但禍害的相尋使他們恍然大悟。如果想把新的方法實行，便應該由一種新的人物執政。新的行政方法是必須排除舊方法的。大部分的青年人，對於舊的行政制度已失去信仰心與互助精神，並且把他們的目標認得更為清楚，就做照特溫得的計劃來組織核心，而且把牠與其他的核心連結起來。

轉瞬間這個運動便風行於全世界，由一個工廠到第二個工廠，由一個研究室到第二個研究

室。照當時的估計，便是在一九六〇年間已有八分之七的飛行人員是新式國家的人物，而其餘的，也是爲這個思想所濡染的。這種濡染，深而且廣。

不知是因爲稀少或絕無禁制的原故，這種挽救文明的運動居然公開地進行。但在開始，牠便遇到很多嚴重的反對。軍人分子，一向便很輕視技術人員。全身甲冑的軍人，吩咐他們去施行技術，他們便去施行技術，這便是軍人的觀念。在世界大戰時，這軍人與技術人員兩種不同的人的行爲，頗足證明軍人對於技術人員的觀念的不謬。凡爾賽條約也在未有嚴重變態之前成立的。十九世紀的科學家是很偏重於一方的人物，往往除了他自己特別研究之外，對於外界的事物，是不合時宜的。

在『科學』之前尚有很多科學，科學的眼光，是一種較後的結果，而不是有秩序地追求知識的根本原因。牠是一個發明而不是一個起點。科學是教導服務於牠的人們的，而學生的所得比較教師所知爲廣。在科學的世界裏，已成的事實與新鮮的研究往往發生衝突，而以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葉更爲厲害。年長的人疑忌青年人有遠大的思想，便多方阻撓他們的前進。他們想這班

青年人都從事於一技之長的專門學。但世界大戰之後，實用科學的世界自知有向事物的廣闊方面着想的必要，經濟恐慌的繼續不息，使牠更焦思苦慮起來。技術人員對於實際的事業是比較密切的，所以也易於把建設的習慣與思想，應用到政治與社會的組織上來。

甚至在中國戰爭之中，化學家、工程師與醫士們也與軍人表示不同的思想。自從東京的絕種呼吸氣的錯誤，尤其是自第十一次毒瓦斯轟炸武昌失敗以後，日本的軍事當局開始研究『專門的抵制』的可能性，這種的研討，使歐洲的科學化的軍人與真實的科學與技術的專門人才的關係上發生相當的反響。而且去辨別誰是忠實的，和誰是破壞的專門家。往往後者是聰敏與發明的人才，而絕對忠實的人，乃是比較愚鈍的。當局者便處於一個兩難的地位，有些是想他們這樣做但不能勝任的，有些是不肯做的。

在一九三〇年來，反對非戰與革命思想的勢力漸生。到了四十年間，便成了混亂與無聊的迫害。但因為牠是不相連貫的，所以沒有多大效力。那些想把技術學校的教職員與學生剷除，想把教育馴伏的方法都歸於失敗，因為很難劃分甚麼是重要的科學，與甚麼是反叛的思想。要想把人類

腦中的自由部分摧毀，而保留其他的部分，使牠自由活動，盡力創造，這是開始便注定了是一定失敗的事情。

四 先知們開闢者狂熱家與暗殺的人

歷史，尤其是普通的歷史，都是注重大體與綱要。我們所說的是「整個德國」的反對侮辱，或是「亞洲的希望」打倒。但是活的歷史事實，是千百萬生靈心理上的思想、情感與反感的變遷。

在以上數段，吾人已經以普通的言詞來說及『聯合概念』(Concepts of Combination)的發展，一個理想，像雲煙一樣地在人類的腦海內掠過，第二個理想又接踵湧現。在以前的書籍中，吾人追蹤世界國家的思想，是經過兩千年的遲遲覺悟的。但牠的成熟是一直等到把團體的決斷觀念轉到個人的經驗，經過腦海中的風浪，磨折的細微之事，纔完成這些大規模的構造。

我們必須利用兒童時代的幻想資料，不論牠們是多麼的遼遠，纔可以明白一點那些最初追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的人物是若何心理。要明白在初期文化時代人類思想的受束縛

如何，必須先理會一隻狗，一匹馬的生活是如何的。那時人類的的生活，是被放在一個像獸類所處的環境裏。那裏有城市、河流、田畝、遠山、廟宇、親近的朋友、異地的仇敵，這些便組織成一個完全而滿足的整個 (A complete and satisfying all.)。當時的觀念是，那些神祇是可信而負責的，可以把你肩上的責任卸卻；獸類也像人類一樣是有靈魂和非常明白事理的，黑暗的地方便爲幽靈所憑佔。在這種的環境之下，人類便度過他們的喜怒哀樂生死愛憎的一生。以擬人的方法 (Personification)，把每一事物都弄得明白與熟悉了。你已把一個生客帶到家裏來；你使他成爲你的團體的一員了。地球是母親，而太陽是昂然巡遊於天空之中的，光明偉大的父親了。

吾人很難查究追索人類的心靈是怎樣地開始發生懷疑偵察與詢問，去透穿包圍着他們的成見的幔幕與幻想的安全的。或者是信念的破裂，比較由牠自己的敦促所致的出路更多一點吧？紀載那在機械、動程 (Travel) 與邏輯分析等發明未有以前處於有限制的情況中的不安樂的人類的事跡的書，以基督教所保存下來的希伯來聖經 (Hebrew Bible) 爲最好。牠述怎樣地人們由樂園 (Eden) 懷了絕大的信心出來，而遇見了很多不可解的複雜事情。牠讓我們對於這

千百的掙扎的腦子作一瞥的觀察。他們起首注意前途的荆棘毒草，與人生的辛苦與困厄。他們盡力地去把覺悟的心情表白出來，說世界現存的狀況都是錯誤的。他們要把事實弄得戲劇化。而他們所憑着解釋的，也祇有擬人的方法。除了幻想牠是一個人，他們不能有一個普通觀念。新奇的思想，是他們所恐怖的，而且似乎不是他們的觀念中所有的。他們不敢公然地說『我想是如何如何』；他們只能說：『我聽聞一個聲音，』或是『上帝的言詞傳到我處。』於是不得不以無限的力量去把一個『教長的部落的上帝』觀念，變成一個更有權力，凌駕一切的上帝的觀念。人類並沒有把各個社會，合而爲一，人類所奉的上帝卻是彼此相同的了。一神教便是人類心中的世界國家的雛形。

對於內心震恐的人，去高呼反對當地的長老以及神祇說：『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上帝』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啊！在他週圍的人們，仍然生長於傳統的信念之中。對於這種打破環境的反響，祇是譏笑怒罵、恐懼與疑慮。我們是讀過穆罕默德的傳略，及其與麥加（Mecca）的神祇作戰的故事，但這是一個很稀罕的例子，這是一個受了新思想鼓動的人，打破他當時的社會環境的事實。

看見光明而發言的人們，只是大部分人類中一種心理作用異乎常人的人，一種比較常人爲更熱烈的活動的人。其他便是些偏執的人或真正的瘋狂者。要辨別這兩種人的彼此是很難的，因爲兩方面都是說些不可置信的事情。

在耶穌以前一千年的歷史，已經載着對付這種奇異的人物的古例。如果我們把古史檢閱，便見清靜的日常社會生活爲這些擾累討厭的人物所破壞；他們到處遊行，生活奇特，說着各種異常的事情，煽動人民作怪異的行爲，以天怒爲恫嚇，預言災害的降臨。如果不用尊崇他們的手段去敷衍他們，便要置諸不聞不問。低能與不快樂的人們或者對於這種奇異的宣言會感覺興趣與激動。但是統治者並不喜歡他們，安舒的人們也不喜歡而恐懼他們。他們對於生活滿足的人們騷擾與恫嚇。他們似乎是很怪癖的。如果他們做得太過了，人們便反對他們，加以虐待，予以擲揄，監禁於牢獄，施以鞭打與殺害。

照我們今日的標準，最關緊要的，便是那些立刻說了非常重大的事情，而又不是十分真確，完全正確地說出來的。很多的使徒，響應着他們的宣言。當他們死亡或被害之後，人們便要問道：『到

底他說了些甚麼？到底他的命意何在呢？」那些受了聖神感動的言詞，很快地便成了難猜的啞謎與深奧的學問。於是這些成啞謎與深奧學問的言詞，就給人家一次再次的用作成語，或者給人們拿來施用或者被人誤用，或者給人們用各種可能與不可能的法子來加以精鍊。

現在我們發現這些瘋狂的人是同具有一個特質的。人類已習於利用言語宣傳，運用思想，說些新奇與廣泛的事情。牠是在大的反抗之下進行的。牠的理智事業是和牠那對於新奇所生的本能的恐怖相衝突。有些教師們的死，是很可怖的，多是焚燒與毒刑至死。其中之一在兩個和他一同受害的罪人受刑前數小時被釘在十字架上，力竭而亡，遺留下來一個具有優美的觀念，奧妙而不可捉摸的教訓，為以後二千年數百萬生靈心目中一個道德上的鼓勵與智力上的啞謎，一個異端邪說與發現新思想的淵藪。

我們絕對不能明白當時被迫害的先知的心理如何。我們知道他的教言的價值，牠是真的。但他在做甚麼呢？這種神祕的，殷勤求知的腦子是我們現在所不能了解的。

在社會比較繁榮的時代，這種擾亂者尚不大明顯；在變遷的時候，尤其是社會精力發洩的時

候，衝突的傳統觀念互相傾軋，騷動的人心便增多起來。廣大而不鞏固的羅馬帝國主義的日子不得不說一點人生方面新穎與深刻的事實。到處都有新的信仰，因為信仰似乎是把新思想與生活方法由一個人的心理傳到第二個人的心理去的唯一法子。每一個地方那些抱有懷疑的人類，都要說些神祕的說話來解決疑難與指導和平。

學術的復興與有組織的科學的成立，使探討與改革的人才大大地增加。整個人類努力於控制環境的思想，也範圍擴大起來。但此時擾亂安寧的，不復為神祕的先知，他們不再託詞於上帝之命了。空洞與邏輯的思想已經透過了人類的腦海，這種擬人的方法，已經失去效用了。他們並不詆斥舊的神祕；而是加以分析。加以我們現在已向新時代進展，事跡的紀載亦較豐富，我們對於當時改革者的心理甚為明瞭，尤接近於其後的開闢者、反叛者、批評者，以及那些和所居環境習俗相搏戰趨向一個比較清晰充實計劃的民族思想的革命者。

一向沒有人完全把自紀元十七世紀以後基督教的千萬的小傳與無數的資料做一個完備而巧妙的提要。如果舊時的先知是太久遠而不易使我們明瞭，那新時代的革命家便似乎與我們

太密接了，幾乎沒有讓吾人從旁靜觀的工夫。研究各種學問的大規模組織成立了克丁頓 (Roger Cuddington) 與其同人所著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荷蘭、來因蘭、瑞士、不列顛的新教思想研究 (Studies of Protestant Thought in Holland the Rhineland, Switzerland and Britai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包括範圍甚大，時期甚長，並述及宗教儀式及猶太人與異方人的衝突醞釀新教思想的事實這是一例。其次為馬格林 (Margrin) 所著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雛形 (Early Forms of Anarchism and Socialism) 一書，要了解現代的批評法律與財產的思想與人物，此書實為最善之本。藉此等工作的臂助以及傳記的所得，吾人對於那些人物的反應可以心領神會。這些反應是把現今的社會重新整理的最初呼聲。

把這些個人的事略完全序述，是應該由一個孩子講起，小孩子認世界的一切是自然而然的，相信他的家庭，他的爸爸與媽媽是永遠對的。他所遇到的是一個已經成立的世界，與古往今來都無比較。他是被人告訴他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和應該去做甚麼的。惡運、不安、震恐、開始向這些固定的事物詰問了。這樣，那些天生擾亂的人，便發生懷疑『他們告訴我的並不對啊！』繼着便更加

騷動而有了一種可能性：『他們所做的以及要我也如此去做的這件事情並不是對的。』於是更進一步而作廣泛的考察：『事情是可以做到比較這個更好一點的。』這樣那個被濡染的人，便由他原來的安逸生活中退出來，脫離獸類般接受固定事物的傳統思想，去加入那少數的煩擾的人們的隊伍中去。

他開始與他人談話，或將自己的意見祕密作記。他發爲奇特的疑問。他就想作批評與諷刺。我們可以猜到十八世紀開始表示意見的無數這種懷疑派的畫像，在小的工作房子裏，在貧乏的家庭裏，在街市、村店裏，大膽地發表一些言論，其實也不敢說些甚麼，而且往往不能將空洞的反對集爲有秩序的批評。在圖書館裏，有其他的人坐在那裏伏案看書，偷偷地寫作，而日常的生活，就是昂然地在路旁叫囂鼓吹着。『以前向人們所說的都是不對的事情是可以比較這更好的。』人們並在大學班子裏大膽地發表新奇的學說，提出驚人的不合正教的言論。

這種的疑問大大地廣佈起來。政府風聞這種問題，於是便大肆搜捕異端邪說之徒。當我們展讀這覺悟時代的書冊的時候，見著作中都是知而不敢盡言，言而不敢過激，便可以看見當時怯弱

的心理。人們爲了這些等於不說的言論，也會得到刑罰和死的報酬哩！

在開始，他們的質問中，並沒包含甚麼資料。在十六世紀時，雖地方上有無數的旁門左道之談，但沒有一絲一毫與新式國家有關的。在十七世紀以前，除了有些學者對於柏拉圖的共和篇 (Republic) 或法律篇 (Laws) 作反響以外，是沒有人把社會的及政治的結構加以研究比較的。十八世紀與前幾世紀比較，是一個富於革命思想的時代。人們對於根本觀念與政治制度也發爲疑問，爲基督教紀元後所未有。他們爲了革新而至於被放逐，而至於所著的書籍被焚毀，並有檢查機關的成立來禁遏這種新的思想。但禁者自禁，蔓延者仍蔓延。在這些因懷疑而發爲質問的言詞之下，貴族的權威，專制的神聖，都歸於晦暗與渙散了。共和國出現，社會主義也成了雛形。

當我們述及第一次法國革命與十八世紀的革命暴動時，(雷汾稿並無此項紀載——編者識) 一方面我們須分析控制政治的經濟與社會勢力，一方面須考察新思想的影響。我們已經表示這種的變更是如何地缺乏計劃，以及這些事實對於創造的發明與精神的進展是如何地不相關係。雖然如此，發出的問題已日漸趨於真實，而計劃的範圍也日益推廣。我們不須再述人類對於

個人財產，自由與金融關係的思想是如何地深深變遷，這些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運動裏，已經表示出來。我們所注意的，是着重那些改變團體思想的，千千萬萬的微小的衝突，是把往昔那種現在已趨沈寂的爲革命預備地盤的呼聲，如同街頭巷尾的不大清晰的宣傳，小集會中與露天的演講人們，使其活動起來，以及搜尋那些奇異的報紙，及當時禁止刊行的那些和傳統相搏戰的書籍。到處新式國家的醞質，都在那裏很紛亂地發動着。

我們一向知道，一個單獨的世界社會的新概念，並不能在人類心目立刻成爲完全與有力的思想。甚至在特溫得的時代，牠的大綱尙未具備，在此以前，足以代表這種觀念的祇是拉雜的材料，斷枝零梗的知識，以及對於這些零碎知識的不合邏輯而且謬誤的發揮。牠不能不這樣疎碎鹵莽地開始。這些新的不完全的觀念，往往會給一種強有力的處置，很鹵莽粗暴的來施諸實行。人們意識上愈感覺能力的不充，他便愈與內外的反對者起衝突，而他也愈堅決與武斷了。這種欲把新思想一驗其真實性的態度，這種急於要拿試驗來確定新思想價值的欲望，便是使改革心理不斷增加煩惱的主源。政治的組織與傳統的習慣並不與這些思想發生衝突；祇是當這些思想成了鼓

動物，成了真實的動力之時，衝突便生了。

十九世紀中，人們到處反對政府，攻擊習慣。腦中充滿了改革世界的光明，但這點光明又往往為誤會所蒙蔽，為憎惡情感所濡染。他們夢想着反叛、奪權與組織恐怖，但實際上，他們的力量漸淪為愚昧的暗殺——往往是無意識的暗殺——或在街頭巷尾，混集疾呼，或向政府的機關及公使館施以襲擊，或向舉行公衆典禮的無辜良民施以轟炸。

法國革命之前，這種的暴動是比較地少的。雖然有些宗教與種族的熱狂的暗殺，但往昔的政治罪，大多數是一種陰謀去改變政府的人，而不是根本推翻牠的性質。十九世紀的『無政府黨』的暴動，不論牠是如何地笨拙，也比較上是一種社會的批評。在牠們之後，隱隱約約地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願望。

與那一切早熟的希望新生活的表示相伴而來的事實，就是那些範圍較廣的革命活動，如地窖中的印刷、祕密的分播報紙與集會、恐怖團體的野蠻的訓練、信使的相互往來等等——這些人們，往往是胸襟褊狹而心理不健全的人，可是，他們又是損失一切而不能於此等活動上有所獲得，

有所希冀的人。在各種的怨毒的情感之下，這些人便成了專心致志的人物。他們是傳播思想方面不可少的發酵物。

這種不絕地增加的革命發酵物，在牠的種種試用上通常稱爲極左派（The Extreme Left）。這種組織，在世界上還是空前所未有的。這些人不單是打破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而且破除宗教的信仰。在一七八八與一九六五年間數千百萬的男女，其勇敢尤勝於回教的熱狂，並沒有希望得到一個未來的生活，亦沒有希望這不時的犧牲可以獲得人們的贊嘆，甚至不明白他們所效命的理想生活是甚麼？這樣，便不屈不撓地或慘淡無告地站在執死刑者的面前，去等候生命的終結。無數的人，都爲了這隱約若現的人類自由，而流於放逐，坐困牢獄，痛受笞打，飽經侮辱，與忍受貧苦。他們甚至沒有劃一的思想。他們都深知有一個較好的世界的必要，但他們沒有這種知識，沒有自由與公開討論的便利，來把他們公共的需要制度，加以仔細的研究與成立一個大綱。他們很遲鈍地與累贅地立了思想的方式，向着真實的路上走不多遠便終止下來；他們對於另外的方式都表示懷疑；他們自己當中便不停地互相傾軋，互相殺害！往往兩個人，對於事物的正義，祇粗淺的

知其一半，便互相殺戮，其實當時他們應該把兩方面的所長匯集起來，同謀一個完善的改革工作大綱纔是。

戴·司爾華(De Silva)把一七八八與一九四八年間爲革命工作的人叫做『半明的革命』(Revolutionaries of the half-light)他對於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政府在俄國成立之後所生的新社會思想的研究，是一種很明顯與很簡易的工作。這是一本起自黃昏而終於破曉的歷史。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之間，普通的人們敢於公開自由地討論思想與採行步驟，爲兩世紀以前的人不敢耳語與想像的。他絕對不知道有一個開闢者，熱狂者是能够爲他的心靈爭得自由的。

衝突的性質是變遷着。到了一九四〇年已經很清楚。以前有的是開闢者，此時是有秩序的探險家與測量家，人類之中，雖然仍舊產生專誠與犧牲的人物，但是向來半明的狀態，此時已到了朦朧的曙色，而像特溫得這班人所作的分析和計劃，已經使人明瞭互助，這是十九世紀絕不可能的事。在十九世紀時，革命是受嫌疑禁遏，視爲黑暗罪惡，失望與絕端震恐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紀，牠便成了很明顯與很同情的了。兩者的分別，以智力方面居多；經過一個暴風雨的紛辯時期，革命的思想

想便澄清起來。新式國家的太陽，已經由雲際透現出來了。

革命仍然需要牠的犧牲者，但這種犧牲是不同性質的。大戰以前的革命人物傳記所載的，是在黑夜中，窮街僻巷裏，地窖監獄中，嫌疑與通敵的氣氛下進行的。在最後爲建築新式國家的革命人物小史裏，是表示在清天白日之下公然進行的。這是一種對於黑暗、設計、謀殺與不合法的步驟的反響。新式國家的宣傳者，漸漸地不類似那被征服民族中的一個叛徒，而竟像一個在未開化國家裏傳道的人，不持武器以自衛，隨時可以受到不利的攻擊，可是，在他的後面，卻具有一種沈潛的大勢力。

其後革命家的死亡人數，死於刑罰日漸減少，而多半是死亡於暗殺與公開的鬪爭。漸漸地大部分的死亡，不是由暴亂的民衆所襲擊而致，便是爲了公平的搏戰而殞喪生命。不久，新式國家的思想已經很爲流行，既無須戰爭來替牠打一條出路，亦用不着以戰爭來反對牠；而祇剩了異途同歸的熱誠人們之間的一種誤會。在許多糾紛中，歷史家很懷疑地不能決斷那一方面是爲新式國家而作戰的。

特溫得的分析，大大地增加人們的瞭解。富於創造能力的人們，雖然極反對欺蒙的人，也漸漸地不大情願與那些無謂的黨徒與忠誠的熱狂者作對。『這不過是一種誤會與障礙而已。』他們這樣地說，於是不計一切的艱難失敗去從事說服的工作。例如法西斯蒂及時把那舊式的恐怖與恫嚇的在西西里(Sicily)的馬非亞黨(Mafia)加以合併改組，取而代之，又如國社黨的運動，把大批的共產黨人吸收，來重新整頓德國，所以現在新式國家的會友包括着世界各處的組織，盡力地去獲得信徒的信仰，隨時大膽地相機行事奪取大權。新式國家的運動所以異於其他革命運動的地方是在於牠的溶合能力，而這種力量，是源於人類心目中有清晰的目標作指導。

大戰前的革命與大戰後的革命彼此的不同，正如一個舊式的煉金術士與新式的科學家彼此的不同一樣。前者常與妖魔鬼怪往來，常為信條觀念與神祕的咒語及術數所蠱惑，獨居生懼，深恐宗教與審問異端的官員的查究，上懼統治者的權威，下畏人言之嘖嘖，不絕地想做一些偉大的事情，但所具的知識，又都是些毒藥與惡計等危險的不成熟的知識；後者具有為數世紀的分析與簡單化所解放，為連續的科學勝利的記述所安定的心理，漠視通常的謬論，而深切地相信他的

世界和他自己。

五 第一次巴士拉會議——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五年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在巴士拉 (Basra) 的會議爲歷史家認爲新式國家出現的重要日子。牠是爲運輸聯合會 (Transport Union) 所組織，該會的源起是由生存的航空人員與船業人員爲互相幫助與保護而創設的一種不甚嚴密的組織。這會議所建立的觀念——雖然仍舊是試用與不甚完備的——已經具有相當的力量了。但這個會議是第一次去把人類普通的見解來成立一個肯定的計劃，與創設一個機關來實施牠。牠是由思想到實行的一種過渡工作。

利用那個成爲一種新文明的合併與統率的力量，的航空運輸，其思想來源已久。牠已經在人類的腦海中醞釀着三十年了。一九三三年風動一時的小說叫做人的死亡 (Man's Mortality) 一書，英國浪漫派作者密切爾·亞倫 (Michael Arlen, 一八九五—一九九〇) 所作，是一個很有趣的幻想，說將來世界是爲航空運輸的公司所統治的。牠至今仍舊是一本很好的書，表示當

時有教育人們的幻想的缺點。對於發明的可能性的信念是很大的；空中的疾速與空中的戰爭是被形容得似乎太過失真，而在另一方面當時股票的起落，雖然已經經過一個半世紀，仍繼續不變，世界的航空獨裁者是很不忠實地以股票作賭，最後財政上的火併與崩潰他們正如普通的政客與神祕人們一樣，而不是甚麼航空的全權之主。在一個充滿了不可信的貨幣爆炸物，與急激轉變的世界裏，股票交易所，商業公會是仍然存在的。列強與外交政策也依然的並立着。對於描寫當時人民不能了解那壓迫在他們身上的政治與經濟的變遷再沒有比牠來得詳明了。爲了些不顯的原故，似乎智力德力的進步，與有組織的發明，是他們的能力所不及的。

同時倫敦有一個小刊物叫做重要新聞 (Essential News) 的，近爲便利研究歷史的學生起見，重刊於學生再版叢書 (Students' Reprint Series) 之中。其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發行的第四期本，有一段講近代對於世界航空管理 (World Air Control) 的思想的大要。牠載着一個國際管理航空人員的完全計劃，是一個由亨利 (Henri de Jouvenal) 所創設，鄧尼 (Pierre Denis) 所主辦的法國小團體所計劃的。這個小團體提議一個國際航空聯合會 (Union Aéronautique

Internationale) 亦就是一個大同航空轉運公司的組織和此相連，而受制於那無能的國聯的是一個『互助的空軍』(Air Force for Mutual Assistance)，是空中的警察。這種的提議，在主權國家的面前，顯得是烏托邦式而不切實際。直至三十年之後，歐洲的主權國的同歸於盡，技術人員大會於巴士拉，纔把這個提議的廣大思想重伸。

第一次巴士拉會議與前此的會議不同的地方：第一便是牠的普遍性，次之便是牠所接受的絕端勇敢與完備的聯合行動的提議，一種具有新式國家計劃的提議。牠是第一次的集會，包含美、中、日的參加者，歐洲的慣常代表，以及俄國的技術人員，牠具着空前的聯合勢力，不為同時赴會的政治統治者所左右。新西蘭也重在世界事業中出現了。那裏甚至還有兩個由冰洲 (Iceland) 來的代表（是兩位教授，在社會心理學組中），冰洲在實際上是曾經和世界斷絕交通至於五年之久的。我們祇須把此次會議的議程與以前會議的議程相比較，立刻便可以感覺科學與技術思想的範圍與勇敢是已經大踏步向前進了。

這是一個青年人的集會，照當時的估計，會議者的普通年齡是三十三歲，有五六位女性出席。

於社會與教育的分組。第三個特點，便是大規模地應用那簡便的飛行人員所用的基本英語。甚至英語國家的代表，也竭力地使他們的演說詞不超過那限制的成語之外。

主腦的仍是普通的運輸問題。組織這次會議的團體是運輸聯合會，原是一個純粹商業的團體，但鼓動牠的，卻是新式國家的運動，參加的有醫學、教育、農業與各種工業生產的技術人員。對於維持世界路線與統制問題都有討論。這種統制大膽地佔有一切，向新的範圍內推廣牠的活動，使讀者們明白當時世界的狀況是多麼荒廢。即如牠決議把所有現存的飛機場邊界，燈與點燈場都直接收歸牠的管理。並不是購買，簡直是取了過來。世界上每架飛機都得註冊，分發號碼，繳納普通稅，以及向管理部繳註冊費。違者將被視為盜寇，不得利用機場與油站，並驅逐牠使不得翱翔空中，由管理部組織空中警察以司其事。收容這等分子的飛機場或地方，便受其他各處的抵制而斷絕交通。

這種提議並不是不經討論而遽行接受的。牠實在是一個不合法的權力篡奪。俄國的政治會員予以最大反對，其他的反對者，並不是航空人員、工程師、化學師、生物學家及與此一類的人物，而

是那些比較落伍的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反對的骨幹是一個問題：『政府對於這個將如何說法呢？』西方人與中國人是主張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涉。『候着牠來罷，』他們很愉快地說。但當時蘇維埃俄羅斯 (Soviet Russia) 與蘇維埃日本 (Soviet Japan) 是比較世界其他各國注重政治的，至少，牠們有政客和科學家同時參加這個會議。俄國的委員卑斯可夫 (Uladimir Peshkoff) 深鑒於以前的禍亂，發爲很長的言論，痛斥所提議的管理是一種想恢復資本主義的托辣斯的陰謀。牠的心理是布爾喬亞與資本家的。莫斯科永不能同意讓統制的飛機飛渡蘇維埃統治下的廣袤領土，與許可任何外面的組織來榨取俄國的煤油與鏗產的天然富藏。

『莫斯科怎樣去防止牠呢？』伊凡·安格魯赫 (Ivan Anglerant) 一個俄國的飛機師與飛機建築家，當卑斯可夫坐下之後，站起來說：『是否這種的國家觀念是第三國際的目標呢？』

卑斯可夫向着他，用俄語爭論着說：『等你回到莫斯科再看吧。』

『或者我要稍等一會，』安格魯赫說：『我是一個世界的公民，我將以我自己的時候與我自己的法子回到俄國去。』

「這是賣國。等莫斯科聽見了看看吧！」

「莫斯科將於何時聽見呢？怎樣地聽見呢？」

「快得很。」

安格魯赫站着和卑斯可夫相距數武的地方。他搖着頭，口邊露着一線譏諷的微笑。他很舒徐地發言，似乎許久便準備着有這樣的一件事情發生似的。

「卑斯可夫同志，不要忘記你是乘了我的飛機隊的飛機來的。你打算怎樣回去呢？」

卑斯可夫站起來，想繼續爭辯，一眼看見週圍的人都缺乏同情的表示，急急地不知說了些甚麼，便頹然的再坐下來了。

安格魯赫等了一會，便繼續發言。他選用了很適當的字眼，去證明俄國的技術人員是附從這個統制的提議的。「多年普羅階級的鬼影也和其他的帝國王朝一齊幻滅了，」他對政治的代表們說：「吾人現在是爲一個已經誕生的新的世界制度做初步的工作。」

他的演說詞成了繼此而生的辯論的中心點。設立管理部便是討論的脊梁，但牠也不過是一

個包括整個將來社會組織計劃的脊梁；根據着牠，還有整個組織的骨幹的提議。中央組不獨專注於航空工作，而且及於各項的交通組織。世界上的燈塔、燈船、海線、海港與港口是經過十年的金融的困厄，十年的戰爭摧殘與十年的混亂與崩潰。氣象的設備，久已停止運用。這些都得重復整理。放棄各種鐵路是認爲一種必然的事實。鐵路便在巴士拉永遠葬埋了。恢復重建各種的生產工業也爲這些根本議決案所認爲需要的。

讀者愈研究這次的議事錄，便愈感覺這次會議所標榜的名目是多麼和平：「一個科學與水利交通問題的會議。」很明顯地會議者想盡力地去推行重新改組世界的工作，而不欲引起當時孱弱愚昧的政治組織的嫉視與干涉。所以措詞都留餘步，計劃的形式非常地大膽。一個專家委員會已經準備去測量地球上的天然富藏，包含那已經表示疑忌的俄國地方在內，這個會議毫不遲疑地去研究普遍恢復生產的問題，不顧一切有礙於進行的原有權。對於這些原有權，棄置而不加討論。空海管理部 (The Sea and Air Ways Control) 不獨志在佔有所有荒棄的港口、機場、煤礦、油井、電力站與鑛產，而且把那些千方百計不肯就範的，加以勸誘威脅。牠的對於聯結熟練人們，

來做此種建設的信心，是絕對的。這種的聯結，真非三十年前夢想所能及。金融的冒險已經由新時代的技術人員心目中浣洗淨盡了。他們所希望的，祇是把事情做下去。他們都以爲如果不同心協力在這個世界工作，便應離開這個世界。因爲他們有了這個普遍的信念，個人致富的念頭，便消滅了。

所以在這種合乎邏輯的和緩空氣之中，在被驅策之下，這個會議便廣播牠的計劃，超乎世界相互交通的物質與機器以外。

這重新改造的運輸如何地進行呢？用甚麼來培養牠，供給牠呢？在到處航空港口的四週所有的境域，都回復到那種爲過去未開化文明基礎的原始農業狀態。奪取農民產業以改良農業生產的問題，以前爲列寧與史他林所定的，此時在巴士拉再度提出。這個會議很清晰地覺到在同一地球之上，在同一個時間，不能夠一面有着航空，另一方面仍有一個饑饉流血的農民，永遠勞苦，終身負債。兩者不可並立的。會議的根本目標便是爲前者取得保障。不久，後者也自然消滅。而且以前凡與此互相關連的組織也一日就消滅了。

在對於他們彼此間的關係與對於整個世界的關係的觀念上，這些巴士拉的技術人員，是十九世紀時代人們所稱爲社會主義的人物。他們是這樣地根本社會化了，所以甚至連社會主義的問題都沒有提起。這個名詞是否曾經應用過，還是疑問。他們自然而地認這個在他們心目中漸地滋長的統制應該是佔有飛機、航線、工業城市、工廠、鑛產與他們計劃相符的耕種等；牠將成爲有力的主人翁與開拓者。他們絕不相信會有新的福特與洛克斐勒起來偷取海空之權，像以前霸佔工廠與鑛產爲已有的現象。這是不自然的，因爲這是爲公共的福利的，即如工業是爲公共的福利一樣。

我們不要忘記所有這些人，都是屬於薪工階級的人物。他們生長於一種的傳統觀念之中，認金錢是次要物的。自機械時代開始，科學家、技術專員、發明家與搜尋家、買辦組織人員都是屬於薪工階級的。有些也混跡金融以致富，但這是例外的。在世界大戰前，真的，這種人是習於接受那些謀利與鉅富的人而成爲一種必須的罪惡。現在他們成了不必需的罪惡了，要做起來絕對不用甚麼報復的計劃去抵制他們，而且可以防止他們的再起。巴士拉會議如果讓他們存在，到不如把外

交部與君主及神權恢復哩！

但是他們要考慮的地方是他們將如何把恢復的世界財富去分配消費，以及完密組織的世界機關如何地纔可給與個人的自由，尤其是與美術的、文學的創作力相吻合。這一組便名爲工資款與供給組 (Section of Wages, Charges and Supply)，就中以美國人的活動力最大。

一個最完全的協定，便是利用貨幣爲服務與個人自由相合併的唯一方法。既沒有貨幣，就必須指定消費與指定工作人員，必須給予和他適宜的東西。但貨幣是使工作的人與做股東的人，在貨財、享樂及生活的利便與自由等方面，都獲得普遍的運用。你拿了錢在手裏，便可隨意所欲地使用牠。但發明貨幣在昔是富於危險性的。在人類歷史中，貨幣曾經兩次使人類的制度崩潰。此時，他們以爲人類已有前車之鑒，在製造新的貨幣之時，是應該防備各項的欺詐愚弄的。這便是工資款與供給組的目的。

這一組把貨幣的問題引到三十年前所不計及範圍方面。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的時候，以及四十年的戰禍時候，對於貨幣的言論雜出，莫衷一是。人類已經感覺到牠的危險，因而努力地分

析牠的過程，發明新的方法來防止大批的集中資本，狡猾的壟斷信用，剝削工人與扼制工業等一切摧毀第二個金融文明的弊端。漸漸地人們感覺到沒有完全的社會組織學說，便不能有貨幣的學說。這個會議便開始去做預備與簡單化的工作。

貨幣學說與普通的財產學說及社會結構學說的相互關係，爲前人所不及料的，此時已普遍地公認了。參加的人，有些青年律師，雖然前人夢想不到他們是和技術人員及科學家並列的。他們在這些成熟的辯論中，掃除了以前所有權的觀念。我們已經說過當尼古生在美國看見新式的法律學校是如何地驚訝不置。在巴士拉，這些學校的產物是很前進的，此外還有倫敦經濟學校（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老前輩也參加討論。這些新律師，根本上具有科學化的心理，和以前的律師，那些老奸巨猾的，使美國的經濟發生困難與摧毀一切高超思想的人們相較，真是有天淵之別。他們絕對放棄那個以爲法律是保護個人財產，索取債務與維持人與人間的一個僞公道的藉口。他們知道沒有平等地位與機會的正誼，是等於欺騙。而他們對於法律的觀念已經完全根據我們目前的思想，認爲是人類公衆幸福與個別的營業及個人相互關係的制裁制度。他們

絕對輕視任何主張權利、契約、例規、前例等那些足以妨礙人類福祉與自由擴展的東西。在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們中，這些青年的律師，一方面與新經濟家相連絡，一方面與團體心理學家相融洽，而且受了最大膽的政治建設力的鼓勵，自然是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大部分藉了他們的力量我們纔得到巴士拉會議，對於『在新式社會中沒有個人財產只有個人的雜物與貨幣』這個原則，加以肯定的承認。這些已認為太顯明可無庸議的了。房屋地產自此以後不能作太長期間的租借，一生的租賃算是時間最長的了。其他特定的物件都是屬於世界國家的，就享用權來說，全人類都是股東。做分析的簡單化的工作亦以這些青年律師的功勞居多，這種工作把貨幣的功用低減到祇能用於正當的用法，就是只能當作易得消費物與服役的支票，或者是支給個人，或者，遇未成年與殘廢者，是支給其管理人，可以當作人類的遺產看，也可以當作工作的酬勞看。這個世界是須重新誕生，此後不復有重利剝削與金融投機的陋習了。

那時世界的金融制度是在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況下，所以沒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有效的制度去立刻反抗這些新思想的施諸實行的。每一個地方，都自有其代用貨幣及支票的制度，且往往是

任意決定的，簡單的，但是交通的恢復已經增加一種所謂『空中貨幣』(Air-dollar)。牠並不是金屬的東西；牠是一種紙票，代表距離、重量、載量與速度的。每一張票子的價值是依距離與速度而定的。一個空中貨幣的價值大約是一個立方米特，重十啓羅格蘭姆，在每小時行一百啓羅米特的航程中，一個空中貨幣足供旅行二百啓羅米特航程的代價。

這已經是一種能力單位 (An energy unit)，而非舊日世界上所常用的物質單位 (A unit of substance) 制度了。這個明示那種富源有限的舊日的靜態的人生概念，已爲動態的，在不絕地擴張的生活的觀念取而代之。空中貨幣在轉運的名詞中是一種能力單位，而牠的轉變爲我們今日日常生活上的能力貨幣 (Energy dollar)，已由巴士拉的專門家計劃出來，雖然實際的變遷是要待至十年之後。

急於佔有及開拓所有世界的能力之源，使人類得到平衡的待遇，做人類的董事會來分配薪金與利潤是新空海管理部的計劃，即使還未草成計劃，也是牠的目的，但如果卑斯可夫的恫嚇實現，而俄國蘇維埃制度（或其他占有團體），仍有力管理其領土內的財富，這樣，那能力貨幣在相

對峙的統治下，任何貿易方面也不失爲一個劃一的媒介。

第一次巴士拉會議的全部工作，並不祇計劃着新的政治、工業與金融的世界制度而已，還有一個強有力的教育組和技術人員及社會心理學家很密切地工作着。牠所作的計劃並不祇爲那些剩遺下來的大學與技術學校補其缺遺，而是肯定地去做新式國家思想的宣傳工作，這是吾人今日教育的根本材料。這是由訓練廣告組 (Section of Training and Advertisement) 處理的。基本英語便做了世界語的基礎。空海管理部勢力所到之處，便繼着有一個新的宣傳隊、新的報紙、新的學校的設立。無疑地當時參加巴士拉會議的大部分教師們，多已看清楚這整個世界的心理的與社會的制度在他們的前面。他們有自知之明。離會之後，懷了鼓勵與信心，去爲開展在他們前面的可怕的冒險事業奮鬥，日復一日，灌輸知識，在這劫灰之餘，瘡痍滿目的世界裏，創設一個新的文明。

當會議閉幕的時候，世界上見諸實行的事情有二，祇以進展甚便，所以民衆經過相當期間，纔知道牠們的重要。其一便是中央部 (Central Board)，即是稱爲空海管理部的，合併運輸聯合會，

並以其他的管理部與其連屬，以巴士拉爲永久機關所在地。其二是空海警察，在開始時，是一個規模甚小的機關，祇有三千架飛機十幾架水上飛機，一百隻巡洋艦，而有二萬五千的服務人員。牠的規模與從前，及以後相比，都似乎渺小，但在當時環境之下，便首推世界上最有勢力的軍隊了。

六 反對空海管理部的勢力的發生

十年間，那新的空海管理部頗能擴張牠的勢力，並未遇到甚麼衝突。俄國的政治統治與技術人員間的微波，並沒有釀成大浪，而且反消滅於無形。俄國最後也學到智慧，她那一向把新式的科學人才處於舊式的奸雄勢力之下的觀念，也發生搖動。因她的黨魁們錯誤的計算，與緊縮的指導，已備嘗痛苦，她的機械仍感不充，她的飛行人員亦感缺乏，這樣，那個舊的精神困頓的獨裁制度便退而不敢與那些新的技術專門人才相鬪了。雖在嚴密偵緝之下，俄國的飛機師、工程師與科學家的信仰，已經是新式國家而不是無產階級獨裁，她的政治統治者亦恍然於這個事實。

於是乎那個空海管理部依據了特溫得的方式，包含了很多的核心，分播於整個世界，很像布

爾什維克的政治組織以前爲共產黨所把持一樣，不知不覺中已滋生擴展，蔓延於全世界了。牠的革命性質除發起人外，明白的人並不甚多。牠很快地生長着。正如愛沙尼亞（Eesthonia）俚諺所說：『人必須先誕生了，纔有煩惱的。』

一九六五與一九七五年的十年間，人類繁榮的恢復是很快的。牠和交通制度的擴展並駕齊驅着。到了一九七〇年，那空海管理部的主要附屬機關運輸管理部（Transport Control）的服務，已遍於全世界，同時飛機的數目增至二萬五千架，在幾處大埠已建船塢，有鋼質的貨船十餘艘，已在建築中；舊的鐵路，已經沒收，加以更改，創設新的大路，開設自來水站，用化學方法，替代舊制可怕的人工採煤法，油井的開掘，也在進行。後來又成立一個附設團體，那便是供給管理部（Supply Control）很快地便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組織，專爲生產鋼鐵，生產或購買樹膠、金屬、棉絨植物，恢復各種服裝的大量生產、電氣材料、機器與各項的化學用品，其中有些出產，是已經停頓了二十多年的。

和供給管理部略爲有點關係的，便是食物管理部（Food Control），牠是隨了運輸交通而起

的，不久便做大規模的食物營業，並把牠自己的過剩供給與貨品販運於世界各處。在一九七〇年這三個團體所僱用的人員大約有二百萬，他們所領的薪工是新式的能力貨幣，在這些管理部門下的交通、屋宇與各種價錢的貨物，都可以通用。

這些管理部的財產是集中於新式國家會 (Modern State Society) 內，此時已有二十五萬的會友，已經具有相當的技術能力，當活動參加的時期中，曾經受過會中的訓練的，他們的薪工，是依照各人職位，以超過或不及平均標準百分數二百為高低之差。其他僱員中四分之一是希望做會友而先事實習的學徒，他們的人數比例是正在增加着。新式國家會已經把維持了一百年的組織加以擴充。會友是依了技術的目的而分派的，他們是地方所選舉的，他們對於會中的中央委員會的技能代表行總選舉。新式國家會的地址是在巴士拉，和三個管理部的機關在一起，新式國家會和三個管理部的關係，和蘇維埃制度初期時共產黨與莫斯科政府的關係沒甚差別，這種關係也是一種並行的活動。

最初指導新式國家運動 (Modern State Movement) 的教育活動的，乃是這個「新式國

家會自身。牠有着牠的自己的核心，或是有管理部的僱員，牠仿照新的方式來建設一個初步的教育，使人們很清晰地瞭解新式國家思想的歷史與目標，並且牠有着工廠與充量的學生人數，牠還設辦科學學校與技術學校，包括心理學、醫學、團體心理學與管理等。漸漸地在空海管理部之下，也成立了一個訓練與教育組 (Section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後來成爲分立的教育管理部 (Educational Control)，但牠並不像其他的管理部對於新式國家會友，絕對獨立，或附屬於會友的。我們可以把這個世界制度的全部分，譬作一隻大章魚，以海空管理部做牠的頭部，而以其他的管理部做牠的爪。這隻大章魚的會計事務是集中於巴士拉，但是不久附設的紀載與統計局也很快地成立了。調查所與研究所也同時滋長。迨到一九七〇年，天文學的進步爲空前所未有。

交通與金融流通的恢復所發生的效果，遠過於會友及各管理部的僱用能力所及。人類生活力的低落已經過了牠的最高點，此時到處開始恢復活動，在落伍的城鎮中出現了新的運動，在鄉村四野中，顯着有蓬勃的生氣，一種普遍復蘇的創造力，冒種種的困難與危險而向着新式國家的

方向走去。

在一個傾覆與破產的世界裏，來把以前成立的空海交通大大地廣播，是比較上容易的事情。因為這個世界已經飽受戰爭、饑饉、癘疫的磨折，民窮財盡，已不復能維持一個擴充與侵略的政治組織。另一問題便是核心的廣播，新的學校與宣傳來管理與融化人民，現在他們已經很豐足而安定，充滿了新鮮的力量與強烈的欲望了。

讓我們把一九七五年的世界情勢觀察一下吧。運輸管理部已經奪取空海運輸的專有權而且壟斷牠自己所築的大路。這樣使牠成了世界上主要產物貿易的實際主人翁。牠把所有剩餘的產物的活動力去增加牠對於普遍人類經濟的掌握勢力。在一九七五年新式國家會已有一百萬的會友，而且僱用與訓練二百萬的候補人，另外又僱用三百萬人員，在新式的學校裏又有七八百萬的學齡兒童。他們所受的不單是物理科學與生理科學的訓練，而且學習世界歷史，獲得一個世界的目光，替代以前淺狹的政治幻想，而且用基本英語來做世界語。在十年之間，運輸管理部比較二十世紀初期的托辣斯的規模尤為宏大。牠已創設了一個世界貨幣。但牠仍未能佔有耕地。牠

自己的出產不能超過外面買賣貨物的八分之一。大宗的生產爲燃料、金屬與機器。買進的物品爲食料、木材、豆油、粗樹膠等等。數千萬的人類仍舊是自給自足的，不參加這個計劃，或者除了爲製造品與大量出產的商品的交易而外，與牠無別種關係的。其他的數千萬人卻是很急速地在發展或恢復一個相與並行的生產，這些生產，有的是與牠的活動有關係的，有的是和牠的活動相競爭的。

新式國家運動的主要困難是與牠的急促的成功相平行的。牠造成了一個表面的繁榮，超乎牠的融合能力。而宣傳人、教師、商業顧問、勝任的指導人員，又並不是一日可以養成的。在一九七〇年時已經感覺能幹、忠誠完全了解這個運動的人才的缺乏。到一九七二年，我們便聽得有嚴密審查資格的呼聲，成立新例以排除才具欠缺與力不勝任的會友。管理部的職員不絕地增加，而具有必須的人格與明白羣衆心理及了解運動上的建設的理論的人才，是有限的。

世界議會 (World Council) 中有一個中堅的人物叫做費度·加倫 (Fedor Galland)，在一九七三年所作的轟動一時的演說詞，當中有這麼一段說：『讓我們來服務，不要陷於偏黨，不要自成團體。我們不可自相傾軋，斷喪精力。我們所做的不過是開始的工作。記着俄羅斯的受制於史

他林的事實吧！記着特温得攻擊反對精神的那幾章精警的言論吧！新式國家的奮鬥纔開始呢！

由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在雛形的新式國家之中已經顯著困難了。

如果這個運動在維持內部的一致方面是感覺困難，至少也有與牠有利的環境，那便是此外沒有一個單獨的整個世界的組織可以爲反對者所把持的。舊的國際銀行制度已經死亡，這個新制度發行新的貨幣，可以控制全世界的經濟組織，舊的軍械營業久已葬埋。舊的國家主義的報紙也湮沒不復聞了。報紙湮沒的迅速是很可令人注意的，因爲在一九四〇年時牠仍然操縱着世界的集體思想與輿論。現在一張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報紙都要被視爲稀世的珍物，必定要拿來什襲珍藏。大部分的新聞材料以及所有恢復的電報、電話及空中傳遞等制度都是歸中央部管理。

這個運動所遇到的外部與內部的反抗及仇視是很多的，但牠們是極端的不同，牠們所發生的危險永不會湊合而成一個單獨的大危險，永不會同時興起而產生一個高度的危機。新式國家的前進，不是在這方面受到障礙，便是在那方面遭到阻撓，但牠永遠不會完全的自衛過。既然牠操

縱着貿易、金融與那滋生不已的新式學校，時間總是對於牠有利的。「如果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愛森登說。「但不如今日啊！」費度·加倫說。

一九六五年的運輸管理部急激地擴展成爲一九七五年的新式國家大章魚，又是另一種困難的事情，和培養人才去應付這不絕擴展的工作一樣，都是不易成就的。這些困難，便是因爲傳統的思想習慣，深入人心，一時尙未能盡泯。那舊的世界爲牠自己的錯誤所摧殘蒙蔽，尙掙扎着至於一九三四年之間，而到了五十年間纔昏迷過去。到六十年間新的世界已經產生。但在世界上所有四十歲以上的男女的腦海中及大部分比較年輕的人們中，多少總留存着舊世界的影子。一九七〇年間的人類生活力復蘇，還不只是一種復興 (Renaissance)，且有一種復古 (Restoration) 氣息夾在裏邊。似乎舊的事物已經回轉來察看這個尙未完全爲新者所占有的他們的原住所呢！

現在且讓我們研究一下到底這些舊制度取了一個甚麼形式，而在一九七五年仍然生存着。找着了這一個關鍵，我們便可以明白以後七十五年的歷史。

空海管理部的的工作首在使整個世界，照牠的模型建立起來。在牠的長臂所伸的地方，牠欲把

人類大同互助的思想與方法，浸透這些仍舊生活於幾千年創設下來的制度之下的一千五百萬的人類心靈。照馬勞威 (Morozin) 的計算，在一九七六年這些羣衆中百分之六十是一向務農的，其中三分之二，在溫帶地方的祇爲自己消費而生產，並不作貿易。他認這種現狀是由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間的事態而生的一種反覆。耕地解放與農民廢除在那時止，已經進展了一百多年。大批的生產，多用機器，已經使每人的出產增加，已經把農夫由農業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改就工業工作或失業。但一九四〇年後，這種過程又反覆了。由那時起，便有工人們回到田間，在不充足與困頓的生活裏過日子。

廢除自足自給的農民是列寧與史他林的目的。農民得了機械之助，便增加生產，超過他自己的所需，剩餘的食糧，可以爲他換取各種的幫助與安舒。數百萬的農民在一九一〇年是完全爲市場生產的；他們生產棉花、茅苧、樹膠等等，而且像城市居民一樣倚靠食物店來供給他們的糧食。社會的崩潰，把一切都消歸無形了。在饑饉的五十年中，照馬勞威所說：『每一個人都是在自己的田畝內覓飯吃。』在六十年間世界上的普通生活又復回到生產與消費的狀態裏。祇有在運輸管理

部指導與鼓勵之下，農民們纔恢復了信心與勇敢去為市場生產牲畜與糧食。

新式國家會友的奢望在成為地球的地主，包括鑛產、森林、牧場在內，如不直接耕種，便交由負責的佃戶，或團體的佃戶，在牠自己監督之下來耕種。但實際上牠不獨沒有人才也沒有權力去把這樣一個人類事業的根本改革計劃施諸實行。俄國第一、第二兩次的五年計劃的失敗，對於言過其實的提議，是一個很好的警告。

新式國家並不是像一句老話所謂「貪多嚼不爛」(To bite off more than it could chew)的。牠的主要的負有使命的人便是商人。他們的數目比較多，但他們所受的訓練卻無須像教師們與宣傳員的豐富。他們四面去向現存的或有勢的食物生產人，棉花與樹膠的種植人，以及可以開發的鑛源，去訂立契約與議定價格，管理部又向遺剩下來的工廠擔保買賣價值，牠委託運輸，新的幣制與研究技術的教育去增加牠的能力，幫助牠在這個生產破產，貿易停滯的世界裏，重新設立一個普遍的制度，來恢復一切的活動力。

在開始，牠並不查問貨物的所有者，牠付給現款，遵守契約，牠沒有想把交貨的人們分別彼此。

在一九七五年，牠的核心與學校仍舊是宣傳性質的，而且是脫離了貿易、運輸與工業組織而半獨立的。但這不過是新式國家的最初步驟。以後的便比較困難了。

讀史者必須注意人們在一生之中可以看見的社會與政治的變遷。一九三五以至於一九七五，為期不過四十年。到處舊制度的思想仍然佔據於人們的腦海內而且傳達至於後代。舊的思想習慣，道德懿行在窮困危急之秋，有如珍飾美裳，暫時棄置，倘境遇稍佳，便會重現。在一九五〇年的饑饉時代，新式國家的整個創造計劃，使幾萬人的思想入了牠的範圍，這些人們所受的科學的與技術的教育，已經使他們準備為此。此後宣傳工作更變本加厲，可是，甚至在一九六五年的巴士拉會議以後，可以配稱為新式國家創造者的人，尚不到二十萬名。

以後的宣傳更是敏捷而急切，但新的會友的才具，便不能如舊會友這樣優良了。新式國家會固需要一切可能與其會友合同的男女服務，但牠不要那些一知半解的信徒，德性欠缺需人指導的人以及抱了奢望的利祿人物蜂擁而至。每一個宗教，每一個教堂與每一個有組織的運動，都知道擴展的欲望與泛濫的恐怖間的衝突的。在一方面新式國家仿照基督教與回教的羣衆宣傳，這

些都是把偉大的信仰降到野蠻式的迷信的，在另一方面，俄國最近的前車之鑒，道德與智慧兩方都爲國家政治保安隊的偵察檢查所滅絕。新式國家的中央腦力，必須把牠的世界制度在絕端魯莽的接受與黑暗的懷疑中來推進。牠不得不膽大心細地前進，但牠又必須很敏捷地進行。如果在一方面，牠發覺得牠自己的會友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不爲反動弱點與傳統感情所左右，在另一方面，牠又覺得牠的領導宗旨，藉了物質的成功與清晰的立論，已經遠超過牠的核心與有組織的訓練的範圍以外了。

在經濟的範圍中，甚至在開始時，已經發見恢復以前的繁榮，及很多的發展等現象，新式國家對於這種現象，假使牠有相當的方法，必已除惡於未萌。牠想直接的與每個生產者相交接。今日便是這個情形。但不久因對於棉花、樹膠、豬肉、米、麥等類要求增加，於是那些承接生意的人，便交相與異色種人的種植棉花者接洽，重到久已放棄的大樹膠場收集樹膠，去與種麥的農民及畜牧者徵收貨物，他們一方面收集出產品以應購買者的需要，一方面將管理的貨物零碎分配出售。

這些人，原先是世界上的商人，由腐化的城池蜂擁而來的，由市政機關，由自己耕地之角，由式

徵的退伍團體，由小規模的商業組織魚貫而來的，都知道貿易有恢復的希望。他們組織農民借款，假以原料，予以勸告，而且正式地去向管理的人員請求指示。

這種的干涉並不祇限於個人，也不限於勸誡與允許。在世界各處不論鎮、縣或小邦，都有一個市議會，或者工人蘇維埃，或者市長與地主掌握政權的，或者有鑛產與種植場是荒蕪被棄的，當購買的微風起了之後，人們便生出一種強烈的欲望，想利用人力爲自己謀利。一九六九年美國有『重行工作』的口號去鼓勵地方的商業。

到一九七五年，由滿洲到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由溫哥華到爪哇，那舊式的事態——農民負債，工作償租，以產物作抵，漁人、鑛工、工廠工人、收集者與獵人等，古式的人類經濟生活——都恢復活動起來債務奴役到處復興。租項增加，剩餘的產物便按當時認爲適當的方法支配。甚至奴隸制度，也改頭換面的重行出現了。

在舊制度中，往往有一種利用作奸犯科者爲苦役的強烈趨向。強迫勞工似乎是一種很公正合理的懲罰，當執政者認爲最有益的時候，便驅逐那些不幸的人們去做沒有酬勞的苦役。在昔

希臘、羅馬時代，大多數的鑛場是爲囚徒所工作的，大多數的橈船是爲罪犯所划槳的。在中世末葉，地中海的航船是等候縣官的取決，如果罪犯的人數不足，還須去搜尋補充。經過了五十與六十年間的黑暗時代，與回復到此時的活動時代，到處便發生有地方的土豪與政治的不法組織來驅逐人民去做市場貨物的生產的現象。供給管理部在一九七六年所作的報告名叫『供給我們貨物的勞工情形』(Conditions of Labour Supplying Goods to Us)文中講到在美洲南北兩方、非洲西岸、蘇俄、印度中部、中國北部、日本、爪哇與其他各處都有罪犯勞工的現象存在着，有些地方簡直與拐騙人口無以區別。

那個報告又說：『人類生命之賤又一再障礙有效的機器生產組織。在我們的役務與工廠範圍以外，現在還有大批的與繼續增加的羣衆，生活低賤，長受壓迫，甚至不知新式國家的目標爲何物，而由此等人的身上復生出一種榨取的階級，企業家、整批發人、零售人、放債人（用地方的銀幣來轉換我們的紙幣）、政客、個人與合股的律師、投資者與地主等等，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以謀利爲先，以服務爲後，且與我們擴張的組織極力相牴觸。這等現象的回復，與我們的進展速

度幾乎相同。」

同年運輸管理部的報告又發生另一種的困難制度。這兒對於新式國家的攻擊是比較直接的。「我們漸覺擴展路線以作地方運輸與載重運輸的用途，漸增困難。這個世界並不能任我們的意旨去安排牠了。到處有重新合組的公司。地方的當局與個人自稱爲土地的屬有主，要求我們付租金與償還損失。有些地方，當地方當局願意歸併於我們的組織的時候，我們和牠妥協，把牠的法治以下的道路收歸管理，但大多數是公開反對，從中作梗的。我們的心理學家的調查所得，見那些從中作梗的人竟有明來或暗來勒索賄賂的欲望，雖然有許多是非常愚蠢的舉動。他們很少明白他們這種行爲是要求賂賄與悍行索詐的。他們是囿於舊式的個人財產觀念，幻想着無論甚麼東西都可以分配爲人們自己的，不肯拿來供公用，毀壞牠，任牠棄置，或者便以爲奇貨可居。

「這種的阻礙力卻很少得到牠們的社會團體的全力贊助，這也足見新式國家的宣傳與我們的思想的廣播及新思想的成熟之功。我們將阻礙物列了一個表。牠們的性質各有不同，由一個思想狹隘見解陳腐的個人起，到各項的集會，城市議會與省議會，以至於戰爭時代遺留下來的主

權國家爲止。兩個埋沒的皇室已經由歐洲的德語部分的退休所掘墓而出，並且據說尚有接踵而來的。在各路線上，尤其在波爾多黑海 (Bordeaux-Black Sea) 路上，有中國人所稱爲「釐金」的那種情狀的復現。在溫底米格里亞 (Ventimiglia) 我們的貨車被扣，在那兒，羅馬的法西斯蒂的政府設有稅關，在通行路設立一座柵門，以意王的名字索取稅款。其在法國與意國的城市很多徵收入市稅的。

「新式國家社會心理學組 (Modern State Faculty of Social Psychology) 的法律委員會，已經對於這些妨礙世界復興與統一的事件予以注意，下月當可準備對付的方法。這些欲恢復那種曾經促使舊秩序滅亡的組織的企圖，如不及時加以防範，將來必至成爲大患。舊日世界的占有制度與政治制度已在一九六〇年前算了總帳。我們已無意以收買舊貨的價錢把牠收買過來。我們對於任何想在我們由恢復生產及商業所創造的價值上增價的要求都是極端反對的。」

七 知識階級對於新式國家的仇視

早期的人類歷史是朝代的，不外是一些神父式的帝王，世俗式的帝王，部落及捐稅等等的表冊。由希羅多德（Herodotus）起，歷史纔成爲政治的。直到十八世紀纔有經濟的過程，直到馬克斯以後，牠的重要纔爲人們所注意。再後，氣象、生理與地理的變遷，纔織入歷史的帷幔裏。不到最近的百年，教育、文化的影響，以及心理學的結果不能在人類舞臺上擔任一個角色。

我們了解過去情形最困難的事情，就是叫我們去認識那些以前的，和我們一樣難以憑信的，男男女女的心理，甚至在最初的形式中，也要我們同樣的去認識。以前人們的體格，雖然不像現在的人，有好的鍛練，好的滋養，而且大多健康，體格的形式，是與我們相同的。他們的腦力也一樣地能幹與複雜。祇是當吾人把他們的行爲來作比較時，證於他們的思想與反響的習慣，覺得他們的腦子似乎是屬於另一種生物的。

讀古人歷史有令我們不能置信者甚多，卽如公衆焚燒異教徒，以非刑強迫犯人承罪，暗殺暴動、姦淫、擄掠、獵獸與鬪獸，與及男女各種享樂無聊的舉動，很難使我們不把祖先們當作瘋子看待。如果把我們放在英王亨利第八時代的倫敦城裏，我們一定會恐怖，一定會照樣的恐怖，正好似置

身於犯罪的瘋人隊中。但是這些人的腦子並不比較我們爲不健全！他們的心理習慣是建設在一個不同的模型上的，這便是整個不同的地方了。

釀成世界大戰，不顧屢次的警告，聽任私有資本主義制度把自身打得粉碎，並且幾乎把人類都毀滅了。這卻是完全清醒的人們做的事情啊！如果讀者回復到一百七十年前的一九三三年裏，便會感覺不安，惴惴然不知道人們第二步將會做甚麼。如果他鎮定了心，和這些人相往還，便知道這些人的完全自滿的心理，正和他自己一樣。

久之，他會覺得自己也在求與這種的心理相吻合。末了，他會明白，就使他自己，對於有些事情，也會感覺得是被迫而去相信與去做的，又有些是絕不能相信也要去做的，雖然在他的時代可以應用，但並不能說是天下最完滿的計劃，比較那種造成了羅馬帝皇與撒馬連奴隸的思想並不見得優越啊！

以古昔人們的心理與我們現在的心理相比較，其困難日益見其增加，因爲所不同的地方已經於不知不覺之中漸漸與我們所接受的習用的言詞與價值相交織。凡是一種成了通用的言詞，

吾人便難於時時牢記着牠的用意不斷的通用或廢止的。我們現在是這樣的浸潤於我們的環境之中，充滿了安全，世界大同的活動力又是這樣地豐富與有生氣，便很難明白何以知識最高之人對於我們現在的秩序的根本概念會發生疑問。甚至二十世紀中葉的觀念，照我們看來是非常自然與必須的，我們幾乎不能明白何以當時會爲那些最有智力的人們認爲是應批駁的、過分的、可能的與悖逆的。

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大多數知識最高教育最優的男女，對於新式國家都不表示信心；他們憎惡牠、恐怖牠與反對牠，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紀，是否把這個態度改變仍是一個疑問哩！新式國家是爲中庸之人所建立的，對於他們那些思想似乎有很大的動力。卽如一九三二年李威(H. Levy)在他那科學的宇宙(Universe of Science)一書〔歷史文件集中普通觀念叢書(General Ideas Series)一九三三〇一〕內所說的，科學是一個社會的冒險事業而不是個人勝利的積累。科學觀念與人類社會的觀念都不是個人的產物，而是社會的產物。而新式國家所以得勢，是因爲牠的邏輯並不是去征服特定的個人，而是征服普通人類理智中的適宜的觀念(Sense of fitness)。

馬哈威爾·勃郎對於新式國家思想的研究，十分注意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美術與文學。除了那幾位社會學家如哈得孫 (J. A. Hodson)、白爾恩司 (Harry Elmar Barnes)、魯濱孫 (J. H. Robinson)、貝德 (C. A. Beard)、浮士的克 (Raymond B. Fosdick) 與幾個英、美新聞學家，及赫斯里 (Aldous Huxley) 所作的勇敢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外，簡直在社會的組織上沒有大的革命變遷的思想。蕭伯訥雖然是被認為一個革命的作家，然而除了那本回到馬士撒拉 (Back to Methuselah) 之外也沒有甚麼表示。其餘的作品都是對於當時事物作破壞的批評，以那本太真了所以不好 (Too True to be Good) 作結。他具有愛爾蘭人的最高度的反對心理。

一九二三十年間文學與新式國家運動的趨向愈加相左。等到戰爭與不景氣降落到社會的生活上來，所有的文學、美術與批評，都退縮於自己的範圍內，成了特有的美術家的風氣，他們具了特殊的風格，或是顯得很敏慧或是非常地粗鄙。

據勃郎所說，文學的退化，是表明三四十年間經濟的破產。他把那個引到美感觀念的心理與引到科學的心理作明顯的比較。那「美術的創造者」(Aesthetic producer) 是為接受力所控

制；他是爲反感而寫作的。那科學的工作人，目標注在知識，而不大介意於人們對於他所產生的知識、愛憎如何。美術的生活是爲時代所規定的；科學是規定時代的。

文學與美術都是時代不可少的東西，牠們反映着當時社會的各種狀態。沒有一本好的書不爲人所喜讀，沒有一幅美的圖畫不爲人所喜看的。當日的心理學尙未完全發展，准許把創造的工作做科學的分析，而所有的批評，實際上是一種力量用以威嚇或勸誘人們去照批評者的幻想去購買書畫與靜聆音樂。牠們偏私處與宣傳處，比較政治討論尤有過無不及。

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擴展時期，繁盛階級的普遍信念是由一個偉大的充滿了希望和朝氣的文學所反映出來，而每一個批評家都是年高德長的人，但到了二十世紀開展，文藝界的人士漸漸地感覺危險的將臨，便在知識的階級上立了一道自衛的防線，與科學及發明的範圍分開。不復再作進步的文章。所寫的都是些仇視新理，嘆息舊道德的沒落的作品。

當時的作者並不是志在復古，而希望各事一律地停頓，最大的渴望便是從事於整頓休養的工夫，不要再失去一些原有東西。所反對的，又是向大體上攻擊。大批生產是遭受譴斥的；科學得不

到一句好話的勉勵；新式利器的戰爭大受指謫，雖然對古昔的義俠戰爭是歌功誦德的；有提議去把一切的飛機與試驗室廢除關閉的；衛生學，尤其是性的衛生，是被斥為『摧毀了人生的浪漫』；對於好行爲的腐化，風格的喪失，尤爲慨惜不置。馬哈威爾·勃郎採列了四千種代表作的書籍與報紙的言論集成一冊（見於歷史文件，普通觀念叢書三一〇〇二）可供參考。

世界既脫離了荒年與大疫而重復走上復興的途徑，反對的心理便在整千整百的舊頭腦裏重新活動。牠的復蘇是因爲他們祇有這一點東西留存；而這些恰巧投恆河沙數的狡獪人們所好，他們方欲與在上擴展的運輸統制制度，在下的蒙昧貧乏的羣衆之中，急激地求個人的商業發展及利潤制度的復活。他們不知道這種的繁榮恢復是出於新組織的所賜。在這種人的心目中，繁榮的如何恢復是不計及的，他們的欲望祇是如何地去利用時機以謀個人的福利。自開始，他們便認運輸管理部是一個競爭者，精神嚴酷，方法毒辣，阻止小聰明的人們去做未雨綢繆的工作。他們把牠視作一個龐大的、齷齪的、有害於一切私人小利的東西。爲求服務者的忠順，牠給予他們大公無私的機械的安排方法；爲尊崇工作者的勞力，牠提議些不關痛癢與危險的機器。『難道我們自

己不够智慧與道德，而要這個世界統制把我們整理起來嗎？他們這樣地問。

很明顯地這個新制度是決定了去把這些只想謀利與不負責任的人們合併起來。牠鐵面無私地向着他們。牠的衛生的與教育的活動，恫嚇着與規制着他們的生活。牠提議奪去他們由賭博與投機所得來的興奮與冒險；剝削他們眼光所到的合法的利益。牠以服務恫嚇他們，他們拿所認為不可忍耐的單調乏味的工作給與他們。他們想有一個不平凡的生活，而視這種制度為一個「沒有靈魂的統一」(Soulless uniformity)。

工人們反對新式國家的方法幾乎與他們的僱主們相等。人們是難於教育與不允就範的，於是學校教師對於這些新式國家各地核心的人們就有一個奇異的提議。對於目前的不滿，便產生了對於將來的恐怖。一旦營業自由喪失之後，那一條法規不把那個強項的個人征服使他聽命於一個世界的僱主呢？例如新式國家的中心區是在談着管理人口的事情，便很容易看出來，這是侵犯私人生活的最可怕的事情。今日是度量衡與金融制度，明天便要及於你的妻孥了！

這種廣播的反感，恐怖與仇視，大多數是由於難以加入新式國家會友，與不得在管理部中佔

有勢力的地位而起的。職位並不是開放給每一個人的。被拒不納的會友候補人便成了新式國家最大的仇敵。到了一九七〇年整個世界內，那裏有舊式的富裕與教育的獨立及營業人物，便產生各種會社與新式國家的核心相競爭。例如自由俱樂部 (Liberty Clubs)、自由貿易會 (Free Trade Associations)、公民聯會 (Leagues of Citizens)、保護貿易商會 (Trade Protection Chambers) 與『恢復法律』(Return to Legality) 的會社等等都是。此外還有宗教與愛國等團體。這新式國家派是那些反對者所認為不道德的、不愛國與反宗教的。那班謀利之徒羣趨荒毀的教堂去要求基督的復奉，的確是很可觀的事情哩。

每一處地方，每一個城市，都有些舊日的律師與政客是很敏銳地在那裏恢復與保護他們的利益的。世界便復聞有人民權利、國家自由及境內自主的呼聲了。逐日地，在這個地球上，藉了自由的聖潔名詞而飄揚的旗幟可以百計。甚至那些組織債務勞役的種植家、工業家，在美國綿花區，在舊的樹膠場，在印度、中國、意大利南部的工廠的人們，都爲着這個個人自由的神聖運動而努力走着。

下層階級羣衆的反響是有大大的不同。戰爭期間與饑饉的五十年中，共產黨的宣傳廣播，增進他們對謀利的布爾喬亞階級的仇視，他們是不會與壓迫者合力的；但是新式國家會鑒於俄國的覆轍，並不欲利用階級戰爭來達到牠的目的。牠很清晰地知道向那些被壓迫的人們鼓動反叛的衝動，是去招致一種特殊的、爲不法的組織與祕密的偵探所維持着的政治團體，來操縱議會的權威。

特溫得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晰了。「創造的革命是不能與反叛的革命合作的。」我們不能強向愚昧與低能的人作諛詞，說他們是本能智慧的關鍵，我們尤不可鼓動人們對於知識與能力生嫉忌與怨恚之心。新式國家志在廢除勞役，亦就是欲廢除所有的勞役階級、勞工、無產、僕役與奴隸等等，但牠並沒有意思去利用這些精神肉體不健全的人們，而去向他們致過分的諛詞。牠冒着險讓反動勢力去組織罷工與羣衆抵抗來反對牠的法規，牠的僱用經濟，牠的機械，牠的移民政策等等。

這樣，世界的舞臺使爲二十世紀末葉，二十一世紀初期安排了一齣三角戲，千百種的反動力

居一面，新式國家的組織居一面，互爭雄長，想把那被動的大多數人類征服或溶化於牠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下。

我們所寫的是大綱，而在基本的歷史中，也祇可以作大綱寫法。但當我們把觀察擴大時，地圖上的廣闊的界線便消滅，國家與界線便成了山谷、森林、屋宇、道路，當我們說到地球，便祇見木、石、花草，所以這種粗率的把人類劃分成三個互相混合與彼此相關的羣衆，而實際上是有着千萬種不同的個別的複雜的特質的。

總之，彼時人們的心理是比較今人來得狡獪複雜，讀史者不能不注意到他們。人類理智的進步是不絕地解除糾紛與使事情簡單化而達到增大的掌握與權力。這破壞時期的末年，拿來與今日相較，是一個不安定、不準確、動機複雜、不合理的驚訝與痛苦的感覺時期。沒有一個不熟練的工人不爲剝削者與僱主的工具，而被玩諸掌上的。沒有一個反動的人物不是缺乏整齊與效能的。反過來說，沒有一個新式國家的會友，不論男女，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自私與虛榮的觀念的，是不高談玄論懷恨及尋仇的，是不爲舊制度的情感與美術觀念所感動的，是對於不可救藥的反對人物不

生愛悅之心的。

二十世紀末期的稗官野史滿載着這普遍的人類心性中的觀念與心理習慣的搏戰。往昔初期的小說以及目前的小說述個人在一個有明白標準的世界裏如何地善我與惡我相衝突；但在社會糾紛的時期中的小說，便述兩種善的與兩種惡的思想的互相混亂，使一個人受到千百種的挫折。那是一個困難的時代。生命仍有其無涯的諷刺與曖昧的，但拿來與一九七〇年中人們的生活相比較，便有天淵之別了！

八 第二次巴士拉會議——一九七八

在第二次巴士拉會議中，雖然中堅的人物有許多在第一次會議時，已經露頭角，但此次的範圍與精神便與前者迥然不同了。照李哈尼(Amen Rihani)所說，這一次的會議中，比較年長的，參加人的平均年齡超過前次的十年。年青的人仍舊很踴躍地參加，但此外還有很多年紀較長的人加入，他們是戰爭時期中的急進派的及革命的領袖。他們的經驗已經把他們養成不負責任的抵

抗態度。他們的心理是非常喜於抨擊而不肯順從的。很多是沒有技術經驗的。他們對於學校與宣傳上總是加上一種無政府的色彩。

加以此時新式國家的偉大計劃，也失去了一些牠那迫人的蓬勃氣象了。一九六五年時的青年，已經負起了十年的統治工作。在這個時期中他們已經接觸過很多急激需要的詳細事情，他們不得不把特溫得的廣泛的計劃予以修改，以盡其詳，而整個計劃的光榮已經在他們的腦海內失去原有的大勢力了。他們已經漸漸地失去一種同人的「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一種密切的互相信賴的心理，這在原始時是促進新式國家偉大冒險的最大動機。他們之中，很多已與舊制度的女子結婚，構成了新的滿足與友誼。他們已經不是熱血的青年，而是飽經世故的人了。在開會之初，便很明顯地見到不得要領的景象。

在第一次巴士拉會議中，是純然籠罩着新式國家的空氣。除了俄國的政治代表之外，是沒有人反對牠的大體宗旨的，而且當時列會的人，很少不是新式國家的會友或和他表示密切同情的人物。但現在，那些復蘇的國家主義，那些再現的舊制度的社會與商業的利益，都很注意於巴士拉

的嚴重事實，那兒有着很多的代表、新聞記者、冒險家、各項的人員，其數目尙遠超過真的會友之上。他們擁擠在飛機場旁邊的管理室，他們佔住管理部的機關及住宅，他們使個人營業的旅館茶樓在濃樹禾田之間紛然設立，屋宇櫛比，擁擠不堪。他們有許多還要寄居在帳幕之內船隻之上的。當我們想像這些魚貫而來的不速之客，甚至有舊式巴格達城 (Bagdad) 的氈商，亞拉伯的游牧民族瀾雜其中，我們便要迴想普遍繁榮初期的游旅情形，冠蓋相接，盛況何若了。

如果運輸管理部門當時沒有見到人多擁擠有礙安寧與衛生，沒有予以限制，不許通過，到巴士拉來的人們，人數之多恐怕還不止此數。因為有了限制，世界上很多團體，便祇有望洋興嘆了。

參加會議中最嚴重的分子，就是那些復活的舊制度的主權國家的代表。這班人是半外交式與半官式的專門團體，懷了很明顯的目的想和管理部的活動力挑戰。他們提議去限制與用法律來管轄那些管理部門，他們在會議中並沒有正式的地位，他們是不請自來的，祇於事前通知會議的辦事人。「不如讓他們早一點來罷，」新式國家的人員這樣地說：便爲他們預備了居住款待的地方。在威廉·卡北 (Williams Kappek) 寫給伊薩伯爾·加頓 (Isabel Garden) 的函件中，裏頭

也有這麼一句說：『我們有些事情還得和他們解決呢。』（此信名爲卡北加頓函牘（The Kapak Garden Letters）見歷史文件集中巴士拉（Basra II）九三七六。）

除了這班舊政府的代表外，還有各種新立的公然與管理部的專利權競爭的營業也紛紛派代表參加。此外又有許多絕端仇視新美國派的青年律師的舊式律師加入。據卡北所說，兩種人的比較，前者迂腐陳舊，後者明敏與科學化。

這次會議也與前次會議相同是一個科學與海運交通問題的會議；凡是參加的代表們，都收到這麼一張通知：『本會議的討論是祇爲新式國家會的會友們而設的，不是公衆的討論，所有的報告祇爲會友所採用。但如果否認所作的議案是對於普通人類沒有深重的影響的，那也是假話。諸君既然來此貢獻批評及提議，會議的組織委員會將盡力地使分團體有集會的便利。現因本會議自身的各項需要，使分配其他的會議時間感覺困難，至不能令所有參加的各種團體都有集會，其他起居款待不週到的地方尤屬憾事。委員會很抱歉不能採用巴格達城市民委員會，代表伊刺克（Iraq）政府所作的提議，以三百名亞拉伯警察及七十九人與六枝機關槍的駱駝隊來維持這

個世界集會 (World Fair) 的秩序，且認此爲不能實施的。這個團體已經毫無損害地移駐於奧馬茲島 (Island of Ormuz)，祇有空海警察負維持巴索拉 (Bassorah) 古城治安的責任。」

繼着便是說些情報處、醫院、供給與應用的各種設備等事。

在應付這些出其不意，破圍而出的舊制度，中央管理部除了這樣做法，簡直難於找出旁的方了，但是各方的代表都認爲招待不週，嫌其簡慢。牠們的使命又是這樣地不同與不平衡，使合作的行爲成爲絕對不可能性。因爲牠們把新式國家組織視作一個世界的合作社，牠們便不能當作一個外交使節的對付一個主權國那種樣子，而且牠們自己相互間也不肯承認是外交的使節。牠們的權力與委任是很不確定的。會議的當局不許牠們使用開會的地方，而祇准牠們有有限的借用電訊交通，這使牠們絕端的感覺不便。

威廉·卡北這樣寫道：「我在路上遇見英國皇室代表 哈里修普蒂斯爵士 (Sir Horatio Porteous)。他很急切地想由我方面知道一些關於成規的事情。似乎我們由伊刺克政府手中把巴索拉省奪了過來，而幽囚了該地的警察——上次我告訴你的那五十匹駝駱——而且伊刺克

是英國的統治保護國。他想提出抗議。「但向那裏抗議呢？」他說。

「我向他表示同情心，他又繼續地說：『你知道啦，你們這個中央管理部門絕不是無價值的東西，如果牠是一個臨時政府或是甚麼東西……』」

「我勸他通知空海警察。

「但他們是受命而行的。誰施行命令呢？甚麼都是這樣沒有規則……」」

代表們很騷動地彼此相商，嚴密談話，而且草成了些沒有甚麼效用的報告與抗議書。天氣特別的炎熱和乾燥，而所有運動遊戲的地方與物件又都為比較有精力的參加會議的會友們獨霸着享用。維持涼爽已難，維持安靜也難，維持健康與希望更難。有些代表大量地喝酒，但酒的供給是受到嚴格的限制的，而警察又把那些以娛樂為營業的人們驅逐出境。在另一方面，那運輸管理部門為友誼的待遇起見，發起來往那不在警察管轄之下的巴比園（Babiyar）的遊覽船隻，還有很多水上遊藝地方，酒館、茶樓、音樂、戲劇等類，很快地如雨後春筍般開設起來，為非官方的代表們的娛樂場所。

『巴比園是一個很賞心悅目的地方，』卡北這樣地寫：『而且他們說，在巴格達與巴比倫，不論人畜都得到很好的款待。英國舊式的星期長假又復盛行，巴比倫便也一天一天地更像巴比倫了。』

但留在巴士拉而忙碌於工作的人們仍舊不少。此時會議在關防嚴密之中進行着。會議中人已很清晰地看到這些奇特的代表人員是一種紛亂的仇視的集合力，向新制度反對的第一次表示。這種託言交通與相關問題的會議的藉口，不能不放棄了。此時時機已到，新式國家應該很清晰地與肯定地宣佈與舊世界及一切陳腐的制度脫離關係了。

亞頓·愛森登，他是主持第一次預備會的，這樣地說：『我們不得不接見有些代表，傾聽他們的主張而且給予他們以答覆。但首先我們必得明白了自己的心理纔可。我們現在做甚麼，我們想做些甚麼呢？在我們前面的日子是開展着一章新的人類歷史。現在是我們揀擇題目與計劃這一章的內容的時候了。』

九 三路進行方法

在第二次巴士拉會議中並沒有偉大勢力的人物像特溫得的人格和性質的。也沒有預言式的指揮發言方法。但領袖人才並不缺乏，很多有趣的人物，如政治頭腦的胡佛·哈密爾敦（Hooper Hamilton）；坦白而沈著的威廉·萊安（William Ryan）；陰謀的史隆堂（Shilington）；東非生物學家班哥（M'bangoi）；社會心理學家林凱（Rin Kay）——或者是此次會議中最出色的人物；——此外太戈爾（Mohini T. Togoro）及那神祕的人道主義者馬勞威；那急激的實行家愛森登，貢獻各種不同的意見而加以肯定。

他們是有趣的人物，而不是怎樣出類拔萃的人物，因為在這個會議中，平均的智力都是很高的。會議具有牠獨有的個性，決意搜羅知識權衡輕重，而又非常地堅決的。那些包圍着會議的四方八面的代表，表演着世界的情勢，更非急于決定不可。威廉·卡北寫道：『我覺得有點像舊式的陪審員，常被關鎖起來直等到他們定了一個判案為止。你真不能幻想到巴士拉有些時候是多麼的

枯燥無味啊！』

特溫得和他一派的作者已經把新世界的大綱舉了出來，而且說明由何種的社會元子來做基礎建設的工夫，但他對於如何地廓除舊制的方法卻很少說及。早在一九六五年間，新式國家的人們已經很清楚地看見我們今日的制度。但他們之中，很少預知舊制度會這樣地有韌性與反革命能力的。這種現象到了一九七五年已經非常地明顯了。

關於大概情形的報告，已經仔細地準備。牠們是應付各處反對勢力組織的中樞的。最嚴重的便是那些舊式的主權國家與法律制度，曾經在災荒薦臻、癘疫頻仍的五十年間衰頹崩潰的。在一九六五年時唯一有力的反對管理部的敵人，就是俄國的蘇維埃政府。這種仇視，很出奇的說，並不像初期這樣地大。蘇維埃化的地方的技術人員，到處排斥政客，現在，俄國的運輸交通及生產已經與在管理部統制之下的世界制度合作，很有絕對融洽的趨向。並不反對人們加入共產黨而又同時做新式國家的會友，而有許多俄國的科學與技術人員是新式國家的會友而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的。那些報告，很有希望地與分析地來討論美洲及遠東方面所取同一步驟的事實。那裏也有政

治與法律的組織不是堅決地拒絕融洽的。美洲的虛偽制度的失敗乃使西方民族的根本創造能力發生出來。但其他各處，不絕地在顯現主權國家制度與個人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根本上和新的觀念南轅而北轍的。

那些報告所載的消息，有許多是爲出席的會友們所不及料的，就是那些在德、法、英、意各國的復活的政府，竭力在重新製造飛機與戰爭利器。是否牠們之中成立了甚麼妥協是很可疑的。不過牠們想建立空軍組織機場，漠視空海管理部的法規與不接受牠的幫助的心理是十分明顯的。雖然牠們對於羅致勝任的工程師、機械員與飛機師是非常地困難，但是仍把事情進展着。那些在管理部的技術學校落第的學生，或因品行不端被開除會友資格的人們，都做了這些政府的專門人才。這些政府又在那裏建設牠們自己的國立技術學校，與謀把管理部統制下的學校與試驗室作爲「國立的」(National)教育機關。不單是想設立與管理部制度相競爭的機關，而且有併吞恰巧隸於那個政府主權的統治地域內的那些屬於管理部的組織、道路、工廠、鑛產、機場、學校、試驗室與人才的趨勢，那新的巴威利亞政府 (Bavarian Government)、那溫座爾國會 (Windsor

Parliament) 以及羅馬的政府，都在預備把在牠們領土內的這種組織接收過來。年復一年，牠們的用意更爲明顯。牠們的堅執着這些互相聯絡的管理部是一個危險的國際托辣斯。

這些便是在會議的門外所滿佈着的國家的使命，威廉·卡北所謂「在劍拔弩張的情形之下」就是指此。

那些次等的代表，代表佔有者及有組織的爲局部利益的團體的，也與國家的使命有共同的要求，他們比較坦白地提議把管理部沒收的財產發還，或是徵收苛重的稅項。他們的分別，有如動物園中的獸類，大小勢力不同，但他們是有一個共同的特質的，那便是一個障礙的好爭心。

在嚴密關防之下，會議中也很公開地來討論應付這種反對仇視的方法「祇有三個待遇的方法」萊安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可以和他們開談判，或者賄賂他們，或者統治他們，我是主張光明正大的統治的。」

「或者把三者兼而用之」哈密爾敦說。

訂立條約與臨時辦法的方法，在對付俄國之時早已利用牠了。我們很難說到底是共產黨，還

是新式國家運動在那裏統治着，因為兩者已交相融洽不可分辨了。新的精神在舊的美洲如今是這樣地『摩登』，而致對於華盛頓與各邦統治者反對管理部的抗議，不以為然。由狄爾朋 (Dierborn) 度般機場飛來的飛機，在首都及白宮上面，播散假傳總統命令解散美國航空食物托辣斯 (Air and Food Trust of America) 的文件。在這整個真實主義的陸地上，管理部發展到成為獨立的營業，不受政治的干涉。但在歐洲方面的情勢便複雜得多了。

『大多數歐洲的主權國家無異一個紙老虎，』萊安說：『在牠們的背後，不復再有生人了。就使有生人，也沒有甚麼關係。拆穿了牠們的紙老虎，便甚麼都會煙消雲散。』

祇有史隆堂是極力主張用賄賂的方法。據他的意思，賄賂而加以條約及手段，便成了一個直接舉動的道德上的改善方法。他請會議注意這種新的前進的心理，仍是稀有與專門的。把所有的宣傳與學校的工作算起來，到底人類之中，有多少是能接受及能明白那些受創造訓練的心理，與在自衛佔有積累財產的空氣中所養成的心理有何區別的？想把世界造成了向前進的態度，恐非三四代的工夫不可。如果新式國家運動現在不公然的奪取權力，與成立一個專制制度足以維

持到把大多數的人類引導向新的方面走之時，便應與外面的羣衆謀妥協，按了他們自己的方法進行了。

「這等人的見解永遠不會和我們相像的，」他堅持着說，而且做了各種奇異的姿勢，反復說着，以表示牠們的重要性。「他們是死活不肯捨棄他們自己的習慣的。過分的處置他們是不公平的。祇有等到他們死亡之後，新式國家的思想，纔可成爲大多數人的思想。他們的精神上的罪惡是不可療治的。把事情通融一點吧，你將把世界由三代的痛苦與衝突拯救出來。」

他表明了他那馬克維尼 (Maclivelli) 派的計劃，以爲每個有能力的舊制度人物，都是一種貪婪的佔有慾的。他們的不可療治有如惡犬。但是我們往往又可以獲得犬的幫助。他們的忠誠是狹義的團體的忠誠，他們仍是一樣的貪婪的，因爲他們成羣結隊地去獵食。但他們本上並不反對新式國家。直到新式國家把他們的習慣行爲挫折過度，他們纔來反噬而生恐怖之心。他們永遠不能成其一道堅固的防線去對付新式國家。他們往往會爲人所播弄而自相爲敵，他們也可以中和。俄國在一九二三十年間對於布爾喬亞與職業階級的嚴酷壓迫，是一個前車之鑒，使人們

明白急激地想把行爲的思想改變，是有甚的麼不幸與損害的結果。讓新式國家的前進和緩一點罷。

他繼續着作詳細的提議。對於俄國、西班牙與美國，所需於賄賂者甚少。在這些國家內的統治者的心理既是這樣，所以用目前的妥協方法，不久便可使互相融洽的。在旁的地方，就使承認舊式的主權與財產權，也不會有永久的禍害的，可以與統治者立約，管理部給予他們以相當的利益，他們便不能干涉新式國家的宣傳與學校。這種消耗，比較戰爭的代價爲廉。『如果他們自己之中有時想有戰爭……』

雖然史隆堂是戴着笑臉說的，但他的主張大爲衆人所不贊成。

等他說完之後，林凱便起而反對，把史氏的話攻擊得體無完膚。『如果我們的道德是超人的，或者我們敢於做這樣不誠實的事情，』他說。但是史隆堂先生竟忘記了每一個新式國家的會友是有兩個敵人的：那便是外面的謀利之人，與裏面的謀利之人。那位中國朋友觀察錯誤之處便是，他認爲採納舊的方式比較採納新式國家的爲自然一點。舊的制度是已經存在的；新的制度是要

創造與維持的。一個新式國家會友的内生活是一種努力維持的簡樸生活與服務。這些已經可以佔據他整部的時間，使他沒有餘暇去做陰謀與狡獪的事情。『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足夠困難的工作在前面，祇要很明白與很忠實地做我們本分內的事情便可。我們不能口是心非的故弄玄虛啊！』萊安極力贊成林凱的說話，哈密爾敦卻長篇大論地爲史隆堂反復申說。但會中的精神是和林凱一致的。

那個經濟的植物學家太戈爾，引進了一個新的思想，或者也可以說，他恢復了十九世紀的神祕的自由主義。他說，他對於賄賂、不誠實的條約與任何武力壓迫，都同樣地表示反對。他自認他是一個很陳腐的民主黨，一個相信純樸者自有其內在的智慧的信徒。而且他絕端相信真誠與不侵犯，是最崇高的美德。我們萬不能侵犯人的權利思想，那怕牠們要使我們把目標放棄。我們應該用誘導的方法。我們不能說因爲他們的觀念和我們不同，就認牠是不對。讓新式國家會進行世界科學化的組織，讓我們把牠的學說宣傳到各地去，但不要加以強迫，不要拒絕罪惡。他引證初期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成功是精神的勸導與體力的被動的實際成功。他充滿了宗教的熱誠，並不以那些

對他肆行攻擊的社會心理學家的譏評爲念。

這些演說詞都見於巴士拉會議報告第三七一及三七二卷中，代表三種不同的意見。大多數的會員都是贊成公開與統治的活動方法。在哈密爾敦領導之下，也有不少模稜兩可，不能決定的。他們感覺得有些寬大與優美之點是不能由侵略性的演說詞中可以找得出來的，而認爲施用武力應該用手段去調劑，向一個目標明顯進行，是應該輔以仁慈與讓步的。

在很多的演說詞中，表露了妥協的意旨，有些人沒有演說的天才，便趨於極端，就大體來說，他們驅策着這個運動向一個比較嚴酷的方向走，是失了牠原來所欲表示的意旨。俄美制度的問題，也大量地加以討論。代表俄國的祇是技術人員，顯明她的政治的勢力是漸趨消失。依凡·安格魯赫這次又是一個中堅的人物。他向會議宣稱，莫斯科方面是不會發生甚麼困難問題的。『俄羅斯』他說：『是準備着融化。是渴望着融化了。』

亞頓·愛森登很遲纔參加討論，他說話時充滿了粗豪的熱誠與熱烈的信心，他獲得所有年青一點的人，以及大部分年長的人的贊許，決定了最後的議決案的便是他。

他的演說詞中，有幾句說話是很有歷史的價值的。他說：『世界國家並不是一件未來的事情。牠是目前的事情。牠一向都在目前，自從人類承認在他們之上有一個共同的上帝，或是很微弱地發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呼聲的時候，牠便存在了。誰甘心爲個別的國家與企業效力而不顧念人類共同的幸福的，便是一個叛徒。做這種事的人永遠都是叛徒，容忍這種事實的人便是醞釀叛謀在他們的心裏。在往昔，世界國家已經爲千百個無政府，無數的企業家與債權者所瓜分，而社會主義者與大同主義者，那些人類的正統，卻像罪犯般或被逮捕，或受壓迫，或喪失生命了。』

『現在那些強盜已經一敗塗地不能自己維持他們的社會制度，彼此相容。世界的時候，使人於我們掌握之中。權勢已經離棄了他們，而我們現在便抓住了權勢了。如果我們不利用牠，或不能充分地利用牠，我們便是叛逆之徒了。我們能够聽任舊式制度作暫時的復活嗎？就理智上說來，何以故呢？如果他們的腦子走入了歧道，好罷，我們可以創造新的腦子。我們是否優容門外叫囂嘈雜的呼聲呢？打開了大門看看他們罷，看着他們虛偽的面孔罷！看着他們鬼祟的舉動罷！權衡他們說話的輕重，計較一下他們將向你貢獻一些甚麼罷！』

照我們今日的目光看來，這種言詞，不免太平庸而說得過於着重了一點。但牠卻表明了會議的用意，與直接地引到議程的最終決斷。最昭著的，便是空海警察的增進百萬人，以及增進大部分的能力去改良他們的設備。對於新式國家的教育與宣傳也大大地雷厲風行。而且徵選附庸的軍力以爲保持秩序的不時之需，這種的附庸兵是祇效忠於運輸管理部或其他的管理部的。所有的管理部都重新組織過了，一個叫做『世界議會』（World Council）的中央委員會已爲他們用做整個制度發言的中樞。凡與外界的統治機關訂立條約合同及與那些反對者的外交往還，都放棄了。決議由那中央委員會，那世界議會，公開宣佈做世界唯一的政府，而去進行把所有的管理部來做地球上的統治組織。

照例把一個宣言廣播地傳遍各地。或由播音，或用印刷，這個宣言便佔據了整個無線電交通的應用。此時無線電已恢復一九三〇年初期的繁盛。所以在一個時間內，整個世界都可接到這個宣言的消息。牠把巴士拉會議的消息激起全世界的注目。整個世界內的市民，於消息傳來之下，都不勝驚訝。在開始，甚少作何討論，因爲這個影響，如迅雷不及掩耳地使他們震懾，有些茫然不知所

云過了一兩天，人們始談論起來。

我們把牠的原文抄錄下來，文詞雖然欠佳，但牠所具的使命卻是非常地重要。似乎是出於愛森登的手筆，藉了哈密爾敦的協助，而為議會所修改而成的。

「世界議會，為空海管理部及其他附庸機關組合而成的，茲宣言如下：

「概自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五年以來，整個地球為強項無能的統治者，唯利是圖的地主所把持，以至不能保持和平，限制生產分配，領導人類的生活，而使社會瀕於崩潰；這種混亂狀況繼續着，於是在劫灰之中重新建設一個世界統治，便成不可須臾緩的事實。空海管理部便擔任此事。這個統治機關現方組織一個世界議會，使向大眾發言。

「牠是地球上唯一的主權。現在世界上，除此以外，不再有其他權威的存在了。所有其他的主權與財產權，不論是否有關人類公衆的幸福，而在混亂時期已經消滅的，以後不得恢復。

「這個世界議會有牠的航線海線、空港船港、工廠鑛場、植物場與試驗室、中學與大學建立於全世界。以牠的職員管轄其事，以牠的警察任保護之責，當這些組織為侵犯與不正式的人們施以

攻擊的時候，警察就將起而防衛。

『在每一個人口的中樞，都有新式國家的核心與管理部的辦事人指揮議會的教育工作，求與當地的經濟生活，當地的企業，以及那些尙未歸順於新式國家組織的當地的當局與個人作合理的接觸。現在已經是這種準獨立的 (Pasi-independent) 營業機關與統治機關去與新的世界政府作有秩序的關係的時候了。

『我們方在組織一個轉換局 (Bureau of Transition)，來簡單化與新式化所有的營業活動，教育與衛生服務，生產分配及維持我們唯一的家庭與樂園的安寧與秩序，這就是我們所視為享樂之地，財富之源的地球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啊！

『既不鹵莽失正，亦不久事延擱，絕對以你們的安舒與幸福為前題，這個轉換局將使你們的生活與這個人類唯一的共同組織發生堅固的與永久的關係。』

『這簡直是篡奪啊！』當這個宣言提出總投票的時候，有一個聲音這樣地說。

『你決定了用武力，』史隆堂說：『我已盡了我的力量……』

「但這是戰爭啊！」太戈爾大聲地說。

「不！」愛森登說：「此後不再有戰爭了。這不是戰爭，也不是革命。這乃是重新去承認革命與政府。」

十 一生的計劃

到底那個巴士拉的社會主義世界國家所作的肯定宣言，是否早熟，仍是一個可資辯論的問題。有些人認牠是最合時的舉動，有些人更以為早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一次會議便應該提出了。討論並包含在航空獨制下的智力與道德的衝突問題。牠和今日的糾紛混雜起來。但毫無疑義的，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新式國家運動的確失去了牠的蓬勃精神，失去了坦白，失去了很多曾經使運輸與貿易的網很敏捷地便傳遍於世界的那些不負責任的冒險性。「我們已經把世界吞下了，現在便不得不消化牠。」愛森登說。嚴厲地廢除了舊的制度，便易以堅決的，比較嚴肅的將來制度。

世界政府的宣言並沒有獲得即時的響應。雖然牠的由來也漸，雖然牠曾經不絕地被認為有

恐怖性質，及受到微聲的反抗，但並沒有甚麼有組織的反對在等候着牠。十三年來，蘇俄已有很大的變遷，而大部分與莫斯科有關的中國領土也起很大的變化。實際上把蘇俄的運輸與交通合併，是已經默認了。至於詳細的合併手續便交由委員會飛行於莫斯科與巴士拉之間者來主持。在整個世界裏，無論那裏的統治或管理的團體，未經與新式國家合併的，便發言爭辯，到底應該如何地去合併牠，或如何地纔可拒絕合併。到處都有那準備着參加會議與充分明瞭當地的情形的新式國家的核心。需要一個有秩序的重新整理的世界，已成爲不可少的事實。那個訓練與廣告組，早已爲新舊制度草成了一個臨時辦法 (*Modus vivendi*) 的寬泛大綱。

那個臨時辦法的名稱各別，有叫牠一生的計劃 (*The life time plan*) 的，有仿俄國獨裁的五年計劃的陳迹，而叫牠做三十年計劃 (*The thirty years plan*) 的，獨立的營業，尊重某種工人待遇的標準，情願接受相當的外界技術與財政的管理，而又維持相當的實力的，不特應予以優容，且當給以合理的保護。甚至牠們的方法爲新計劃所取代的時候，也將任其慢慢地結束，牠們的生產仍舊爲管理部沒收。這種待遇，比較競爭制度的強行摧毀生產人的待遇，優勝許多。當小農與

佃農的財產未沒收的時候，便爲他的生產立一固定的價格，對於改良方法，亦予以商量及指導，使他漸成爲農業工人的階級。據當時的作者波定尼斯哥（Rupert Rordinesco）在他所作的那本簡略解釋（Brief Explanation 歷史文件集一九六九）所說是給予他們時候去自然消滅。因爲在一生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去把新時代的人加以訓練，使他們有服務的心理，而無佔有財產的心理。在一九八〇年沒有二十歲以下的獨立的商人與耕種者，在一九九〇年沒有三十歲以下的，而在二〇〇〇年沒有四十歲以下的。這不獨給予舊的制度去自然消滅的時間，而且使新的制度有充分時間去發展比較複雜的指導制度、機械與轉運。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措施不適宜，其可畏可悲，有如無計畫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制度的肥腫與瘦削，已經是作爲殷鑒，知所警惕了。

世界議會並不以爲保留千百萬的小商人與小佃戶是減低生產能力的。「這些舊式的人物是應該給予生活與工作的，」波定尼斯哥這樣地寫：「現在他們永遠不能習慣於一種新的生活幫助他們把工作改良一點。防止那些狡猾的人們如放債者、質主及宗教的與世俗的威迫者等去魚肉他們，最後，讓他們安靜地生活，不要煩擾他們。」

那本簡略解釋，由一九二十餘年中的『膨脹時期』(Period of Glut)，正當世界崩潰的前夕，到處充滿了積貨與失業的時候，找出了一個解釋。波定尼斯哥指出這是一個沒有規則的個人企業進步制度下所不能免的結果。『無論一個怎樣的舊式的人，除非有了新的職位給他，是不能迫他放棄他原有的職業的。人們不能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來除非是有教育、訓練與有用的工作給他們去做。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時代所以異於舊時代的地方，是訓練與目標的數目上的不同。俄人在他們大試驗中，已經知道了這個必要。我們既趨向科學化的生產，當然農業工人、鑛工、伐樹者、漁人等等的數目會低減。所以普通的工業人員的數目也必然低減。那些重工業必然比較輕工業先低落。逐漸增高的生活程度，尤其是特溫得所稱爲『重新建設世界』的，新城、新路、新屋等等便成了相當的抵償。(這在法國的計劃，以及一九二〇餘年末德國的建屋計劃內已有預算，這些計劃最後爲力主平衡預算者所遏住。)但甚至由生產根本原料，與有限的貨物，以至於偉大的建築中，來使能力得到一個外發之源，也不能全部吸收社會上的人力。在這一點，便露出了波定尼斯哥所稱爲『加大的數目』牠的消費比較供給者還要多。人類的數目在教育事業上，在發展知識

上，在試驗科學上，在文藝的生產上，在使生活得到豐厚的方面，自然要大量地增加。這種的增加是無止境的。

「人們佔用這個地球已經有幾百萬年了，」在簡略解釋中這樣寫着：「不去追求一個較好的生活是愚蠢的，而急激地與殘忍地去追求，是更愚蠢的。二百年來的歷史都是不絕地警告不可使那些不能做旁的事情的男女失業。在我們教導之前，我們的教師必須學習，在我們指揮一切自如之前我們必先有指揮的經驗。我們時時都要試做一點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但我們切不可試做絕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必須不延擱地前進，但不可過速、耗費與殘忍。對於新的情形的進展不必恐懼，也不要妬忌。沒有一個忠實的工作人員，不論是男是女，對於新式國家的降臨會生恐怖之心的。」

十一 政府的真實奮鬥開始

雖然空海警察的勢力擴張，而世界國家的統治者並不玄想着新的制度是可以由宣言與簡

略解釋而建立於世界的，在提議召集會議與實行合併工作之後，便有地方警團與法規的組織，使各地重新改組的核心成爲地方當局，營業及個人與中央的管理部互相交通的唯一媒介。在世界各處，核心已經按了當地的環境，在會友以外，準備了很多的同情者與附庸者。當時道路上的警察都穿了同式的制服，而在所有飛機、郵局、電訊桿、路標、車輪與公共建築物之上，都有翼的標誌。此時與俄國仍甚和諧；新的翼與舊的鎚子與鐮刀依然是並立着。

在起初，沒有一個地方是有武裝的反叛運動的。由此我們知道那些世界戰爭時代的國家，是如何地完全崩潰了。牠們沒有國家的報紙，沒有外交家，沒有外交部了。前者沒有報紙，後者沒有薪金。失去了輿論機關，國家主義的聲浪便歸沈寂了。雖然不時有些很微弱的抗議是由地方自己組織的團體而作的，但大多數是無力的反抗而終歸失敗的。甚至連移去翼的標誌也不是常見的事情，往往即使有這等事情發生，也不會把亂事擴大，因爲在不久之間空中警察即自天而降，把牠重復樹立起來了。

這種沈寂的現象是暫時性的，等到反對者集合權來形成新的形式與局面，並找出了組織的

方法時，情形便不同了。反對的分子是非常地多。羅馬的法西斯蒂大本營，自稱爲全意大利的政府，是最先挑戰的一個。牠有很多飛行人員，都是爲運輸管理部所拒絕發給執照的。現在牠出發一隊黑衣黨(Black Shirts)去佔領舊羅馬城外的新飛機廠，以及奪取奧斯替亞(Ostia)地方的小機場和航空器具。在這兩處地方的翼的標誌，已經爲國家的標幟所取而代了。作了一個宣言，由有限的印刷品盡力地廣播開去，主張重新召集舊的國際聯盟，與恢復威爾遜總統的一句陳腐之語「民族的自決」以爲標榜。意大利之王，經仔細搜尋之後，纔發現他是在皮德蒙特(Piedmont)地方種田的，於是把久已封鎖的魁連諾(Quirinal)皇宮掃除塵埃爲他住所。

新的空中警察很不耐地候着這種的挑釁。牠具有一種新的瓦斯叫做靖亂氣(Pacificin)，可以使受害者三十六小時之內，喪失知覺，而不發生其他致命的傷害的。牠現在利用這個去制治溫蒂米格里亞(Ventimiglia)的久不就範的稅關，以及紛爭的工廠與機場。

在奧斯替亞地方，警察機觀察到情形非常的複雜。在機場內一個特別的典禮方在進行着。三架新的飛機方由吐林(Turin)機廠運來，受教皇亞爾班第三(Alban III)的祓除。

當時尚有餘威的天主教會，仍然時時爲器具、商店、船隻、橋梁、汽車、旗幟、大礮、戰船、新的建築物等祓除不祥。這是一種爲教會作廣告，使忠誠者滿意，以及對於受祓除的物件沒有甚麼害處的事情。這次的典禮是特別向世界議會作示威的表示。教皇親自駕到，意王與統治團體也完全出席。在空中警察未到之前，攝製有聲電影，制服法衣，炫赫耀目，盛狀不下世界大戰之前。歌詩班衣長袍，垂領帶，侍僧搖曳香爐，年高的聖父高坐於華蓋之下，紫色的講臺之上。過圍侍立者有黑衣黨不下三千人。

議會的統領官，魯奇·洛西利 (Luigi Roselli) 的舉動是開釁之源。

以下的事實，是表明他是反宗教的。他的被選擔任這件工作是因為他自己有意人，人們都以爲他不會刺激深藏的國家情感（很有趣的事情便是當時法西斯蒂的統領是他的異母兄馬利奧·洛西利 Mario Roselli）。他是受命去奪取機場與飛機，但在可能內不可用強暴手段，靖亂氣，祇是應用於武力抵抗之時。但當他看見法衣方帽，華蓋長袍，以及聽見誦經之音，這種宗教的儀式空氣，使這個青年生厭惡之心。他的飛機隊列了隊環繞機場高低翱翔着。雖聞機聲軋軋，典禮仍

復肅穆地進行，因為誰都不相信有這樣大膽的人，敢去向教皇施放瓦斯啊！

「放啊！」魯植·洛西利說，完全不知道這種侵犯是過於殘酷的。

裝載瓦斯的罐子鏗然地由空中碎擲下來。

參加此事的一個飛機師，後來在他的一封迴憶的信內，這樣地寫着：「頃刻之間，誦經之聲越發響亮。這些牧師們倒顯得很鎮定呢。幾乎沒有一個人離隊而走的。不久他們便縮伏在原来的地方，大多數是慢慢地把膝屈起來。看着瓦斯在他們當中傳播，的確是一個奇觀；有如一個花牀的花的將死，死亡是由很多個中心點傳播出來的。那個高據皇座的老孩子連頭髮都沒有動一根。他把手合攏來，俯首如作祈禱狀。很難說他在甚麼時候中了毒的。法西斯蒂的守衛隊與意王的扈從使沒有這樣莊嚴了。他們東指西劃，狂呼怒號。有些跑了幾步，纔中毒的。

「自然他們都以爲是被害了的。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新瓦斯的作用。甚至，我們也是兩星期之前，纔知道的。

「在我的飛機上沒有裝載防毒面具，所以我沒有參加下降的隊伍去奪取新的飛機。

「我最後對於飛機場的一瞥，看牠很像一張舊的土耳其地氈，有些地方是破裂露縫了的，有些地方是補着很鮮明的補釘的。這是一個多麼酣睡的樂園啊！我希望沒有人會向他們行劫。但我相信洛西利已經把羅馬這種劫奪飛機場的訓令完全制止了。」

不幸得很，此次的襲擊，並不能如那個青年的想像中，那樣的完全不流血。一個少年牧師，叫做奧德·般那勞蒂 (Odet Bannarotti) 的，爲裝載瓦斯的罐子擊中頭部，登時致命。其後，他是被視爲最後的聖徒與殉道者，他的名字是被刻於拉丁的聖徒列傳中了。

(到這兒雷汾的稿子忽然中斷。)

第四集 新式國家的軍事

一 稿本的缺遺

我已經不事修改，把雷汾的夢書謄錄出來。但到了這一點，這本歷史的完全紀載忽然中斷。以後七八十年間的歷史，是爲雷汾的一大堆不整潔與完全自創的一種縮寫所紀載出來的。但在終結一章又復重新詳細地寫出來了。

我不能肯定地說，何以雷汾把這一部分要緊的歷史弄得模糊紛亂，而一直去寫最後的一部分。但我明白他的腦子內的經過情形。第一點，他有着一種很自然的人類動機，知道在這些紀錄所載的世界革命的重要性，如果他先把較後的一部分寫出來，便會更加引人注意了。第二點，這些錯綜的事情，有如千頭萬緒，一時很難得其要領。我還認爲牠是很困難地與克服了障礙，纔通過他的

腦子的。他的大意是已經準備了新的戰爭，戰後的崩潰與成立一個空軍勢力的世界統治，而且也計劃到最後逐漸進展的世界國家。但他的理想，卻沒有預備有七八十年的深沈複雜的心智與精神的交戰，來建設這個新的世界。

不論這是他對於真的將來歷史有先見之明，抑或這是他潛意識的活動，都不能影響這個事實，這一部分的紀載是出於不自願的。

其中一個最有力的辯駁，說這未來的大綱是由雷汾內心的直覺所發出的，就是因為有幾處地方他自己似乎和自己辯駁，並且他在寫初集與後集時那種從容不迫，明白表示的態度，在這中集之內更不能維持。

我不以為當他恰巧寫到教皇中毒及聖奧德(Saint Odet)的殉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以為這個事件使他知道是至要的，昭示着人道的一個大轉機。牠是一件必須發生的事情，而又是一件他從不注意的事情。牠結束了一個在道德教訓方面，在動機組織方面，在當時所認為宗教的方面，已經維持過三百年的。實際的停戰條約，牠是在新的宗教的衝突中第一次的流血。這個新政府，

不獨志在統治這個地球而且想統治人類的意志。這是二而一的事情。牠很訝異地做到這一點。而雷汾也同樣地訝異，知道這是必然之理。

先是一年前在巴士拉已經有一個世界國家的宣言，而且已經很明白表示一個新的制度必須根據牠自己特具的教育，而不能容許其他任何的訓練與牠抗衡。但是只說這樣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表明牠的命意所在的。像這樣的事情以前已經有人說過，而且像過眼煙雲一樣，瞬即由人類的腦海中飛逝。這個新的政府尚未曾完滿地準備牠的計劃，直至這個偶然的瀆聖舉動，強迫着牠，乃不能不決定着一切。現在牠已打倒了天主教的教皇，而且殺戮了一個在執行教務的牧師。牠已緊扼着那個廣大的世界組織——天主教會——的咽喉，而且實際上教牠永久的靜止不動。牠現在已經覺悟到自己的使命。牠本來可以退讓與妥協的。牠卻決定了向前去。

十日之後，航空守衛降落麥加（Mecca）地方，而且把聖潔之地都關閉了。很多宗教的儀式在印度的都被取締，整個世界內的屠場以舊式的惡劣的狀態，爲正教的猶太人預備肉食的，都被查封了。一個統一的法令已經施行於各處。現在世界上祇有一個信仰，一個世界社會的道德表示。

雷汾對於此事的不及預料正如一九七八年的世界一樣，誰都不能預料一個運輸的專利組織會急激地變成一個政府，一個社會制度與一個普天下的信仰。然而蘇俄的試驗，除了共產主義之外，取締其他所有的宗教，或者使雷氏明白任何一個新的制度，必須有賴於一個新的教育，使人們很自願的興樂於相助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生活，而一個教育的核心便是一個宗教。很明顯地他尚未想出這樣的一句句詞的立論命意何在。和今日大多數的解放人們一樣，他不信任何的宗教，但他也能容許牠們。他以爲人心是可以做照任何的生活模型與見解，但這些對於他們的社會與政治的反響是沒有多大的關係的。這種對於生活矛盾的觀念，如何能够並立於我們今日的世界，的確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很明顯地，牠是不能爲未來的時代所能接受的了。他們將認清楚了普通的人類祇有一條正路去觀察世界，也祇有一個正當的社會反響的觀念，其他的，都是錯誤及含有破壞性的行爲上的乖僻。

雷氏的夢書，當牠開展着人類最後的大革命在他的面前，把他心目中掩飾的樂觀，仁惠的危險的優容，以及對於人羣的好意，都打破了。如果地球上再想得到和平，人類再想有幸福，如果要消

除了戰爭暴行，貧乏與普遍的衰敗，不特人類的集體組織必須重新建設，而每一個人的道德訓練，都非重新開始不可。那正式的革命不過是真實革命的楔子；牠祇具備了一個骨幹，一個臨時的政府；在牠的裏邊，那最要的事情——心理的改革——是應該現在便開始。

那個不確實的第一個世界政府，祇有着幾百萬尚未完全溶化的信徒，現在抓住了這個地球，要去摧毀每一個錯誤的制度，訛傳的解釋，抵償與自慰等，一切仍舊遺留下來足以擾亂人心的東西；牠要向世界上每一個人所有的恐慌、懶惰、嫉忌、貪婪宣戰，而且還要獲得勝利。否則牠便會趨於墮落的。牠必須在一個限定的期間內進行一切。如果牠不能在這個限定的時期操勝券，那末，分崩與覆沒的慘劇是不能避免的，人類備受痛苦的紀載又將添載一世紀的禍亂與失敗了。這個新的制度一定要廓除人類的心理，否則必歸於失敗，如果牠失敗，牠必將使人類重復回到禽獸的個人主義裏去，而且一直至於消滅。以往的失敗，可以不至於有普遍的禍害，便因為牠們是局部的與地方的，但這一次是決定整個世界的命運的事情啊！

二 驚心動魄的戲劇楔子

我已經說過，二〇〇六年的歷史比較我們現在的歷史是不注重人治的。政客與政治家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王室的尊榮，頃刻之間亦化為烏有。這本歷史，間或亦列舉特出的人物如福特、特溫得、裘吉爾或威爾遜等，但並不是把他們當作英雄及領袖，而是使他們代表這種人物與作證人。他們對於人類思想都有很有力的影響的。

但忽然間，到了這一點，歷史便急激地變成驚心動魄的戲劇。有一個時期，人治忽然躍為最重到的地位，似乎控制了世界的大事，如愷撒、克利奧佩特刺（Cleopatra）或是彌拉波（Mirabeau）與馬利·安多阿納（Marie Antoinette）之所為一樣。我想這裏一定遺漏了些互相連貫的線索，一定有些評論可以證明引到航空獨裁的動機的經過詳情的。以後凡有相關的，都要說到。

空海管理部以及其他附庸的管理部都是一班精明強悍的青年們一手所經營，他們為生活的不靜所影響，尤其是直接地受了特溫得及他那一派的作者的學說所鼓動。他們是充滿了大度、

熱誠與信心。一九七八年所選的第一個世界議會，便包含了很多一九六五年時的青年領袖，而現在已到中年的人，此外還有兩個年紀較老的人並一兩個年青的人。具有創造力的愛森登，不祇是主席而且是第一個世界議會的實際領袖人物。祇有依凡·安格魯赫的個性，可以和他相比。參加會議，不少比較他優秀而崇高的人，但沒有一個像他這樣富於魄力得人景仰的。

愛森登的確是轟動一時的人物；他的聲名比他的同僚尤為昭著；他的照片，雖然深不肯示人，但是一等到報紙恢復流通以後，便佔了前頁，流播遐邇了。新的世界政府的方法，是不用總統或祕書的署名來公佈任何文件的；牠祇很簡單地注明是「管理部」或是議會所提議立論的，或是已經議決了的，祇用世界國家的翼印蓋上，公文便發生效力。但人們觀念上都知道愛森登在第二次巴士拉會議中曾經作有力的演說，決定了世界政府，無論什麼時候見着所蓋的翼印，觀念上都以為他已經簽上了他的名字了。他的聲望日隆，如雷貫耳。無疑地，這種外界的擁護，影響他對於同僚及其共同的工作所取的態度。

我們的歷史課本編者，縱論其文句如何艱深，只就可以解釋的難句看來，他們對於愛森登這

個生力軍，愛氏這種自然的、直截了當的決斷力，都在估量其結果的優劣。他們列舉其他的獨裁者和愛氏相比較。無疑地在人事危急之秋，往往不能計較好的意思與深長思慮，而祇求從速施行以解危局的。我們的時代的批評家，研究關於墨索里尼、史他林、愷末爾、希特勒與其他在西方經濟恐慌時代的獨裁者的事迹，且揆度當時的情勢，而對他們的行為加以諒解。我覺得後代的審斷，與我的絕對自由及盎格魯·撒克遜的觀念大相徑庭。他們對於曩昔的國會制度的游移不決的弊病，大肆抨擊，較我為甚。

他們並不把對待以前獨裁者的寬恕態度拿來對待愛森登。他做獨裁的時候已經遲了半個世紀了。他們認為發展的方式已經為特溫得與他的一派的學者很充分地具備着。愛森登並不能算是第一個發表這個意見的人，而且當一般的決議行將迫近的時候，他的匆忙是無須的。他使委員會向那障礙新式國家的舊式宗教與政治的習慣，攻擊得太急促而且太殘酷。他感覺得同僚之中，有些思想遲鈍，見事不明，遠不及他。他是非常的燥急與無忍耐的。

在宣言世界主權不久之後，在委員會的議席上，愛森登往往與萊安及哈密爾敦大開爭論。

隆堂，那位陰謀家，也和他作對，諸事掣肘。林凱對於這些辯論很柔和而又有力地加以干涉，安格魯赫對於他們的不協調感覺非常地憤怒。

我們必須明白，這個新的世界政府，是處於爲感情所推動的情勢之下的。牠的前途，仍在風雨飄搖之中，或者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有冒險性與浪漫色彩的人物加入。那世界議會名義上是佔有整個世界的權威，但並不是沒有反抗的。甚至在二〇〇〇年，人類中二十分之十九仍舊沒有融化於這個組織之中。如果這個世界不是大亂，也是叛變，而且反對的團體中，有着無數的精明強悍之士，以及思想絕對不能與新式國家相和諧的人物。

很明顯地，中樞之中，領袖人物的不和諧，以及各處的會友的團結，爲各項的陰私與弱點所破壞，自然在這個組織之外，更要發現無數的回響與誤解了。外面的世界，仍舊準備着英雄與惡人的互相雄長，盲目的參加與風雲的變幻。牠希望牠的政府戲劇化。傳說有謂愛森登對於各種管理部的淺狹專制，曾經表示缺乏同情心的。他是被認爲比較崇高的人才。他是被視爲一心想握着大權，而以比較大度與和平的精神來統治這個世界的。卽如歷史所謂：『獨裁往往是羣衆避免嚴酷與

有權力的貴族階級的幻想中的逃遁數。』

愛森登是否曾經計劃着來完成這個夢想，至今無可稽考。在紀載中，我們找不到一句說話或一件事情足以表明他是不忠於新式國家的。但無疑地他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是世界共和國所不能缺乏的一個人物。他像史他林以前一樣，感覺得人們是不能缺乏他的。

但陡然地這個歷史的舞臺，重新有女角扮演。我們可以看見在歷史的奔流中，忽然湧現了一段戀愛的狂潮。讀史至此，我纔注意到自世界大戰以後，女性在政治的舞臺上，是很少露面的了。在大戰前，很多國家中，女性已經獲得解放與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力。達到這一點以後，她們便在四十年的強暴時代中銷聲匿跡。雖然在俄國的初期革命中，女性曾經活躍參加，但她們並沒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在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八〇間，女子的領袖才，祇限於閫內的事情或醫院裏的事情。當王后的名稱成了過去的陳迹時，女子便完全失去了政治的重要性。新式國家會友中雖有一部分女會員，但沒有女子可以執行權力的。世界議會中便沒有一個女子。她們雖然任着很重要的工作如教育、祕書與執行工作種種，但這些都是受命於人的工作，而不能發展個人所長及獲得

聲譽的。

但到了二一〇六年歷史家竟破例而使兩位女性的名字顯現。她們是伊利莎白·何熙 (Elizabeth Horthy) 與約翰·愛森登 (Jean Essenden)，由這裏我們可以重復看見人類定命由一個狂熱的戀愛與熱烈的敗行中交織出來。

伊利莎白·何熙她使亞頓·愛森登傾覆與喪生的，很明顯地是一個相貌端麗與行爲勇敢的女人。她是一個飛機師，她似乎有她自己的特別嗜好。在旁的女人喜歡穿袍子的時候，她卻穿起她的制服。她知道那一樣是適合她的。她有修長的身材，嬌好的容貌。由愛森登的情書中，我們可以想像她的樣子，她「仰着小腮兒，」她有「一個豐滿的美額，」與及一個「溫和」的面龐。但書信中並沒有告訴我們她的皮膚白皙與否，美額下的一雙媚目是甚麼的顏色，以及她的聲音是怎樣的，她的情書是顯得非常地有精神與不審慎的。她的令人可愛與出類拔萃是無可疑義的。她是屬於那種使男性歡悅的女人。「她像日光的明耀，」「她像動人心曲的音樂，」愛森登的信內這樣地寫。她和男子有很好的友誼，除了哈密爾敦是向她蘊藏着怨恨之心的。

這個年輕的女人，具着她特有的「勇敢」與一個強有力的浪漫性情，似乎是和威廉·萊安一起來巴士拉的。說他是他的情婦，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表面上看來，她似乎對於這個世界革命的偉大工作並不感覺甚麼興趣，而她之來，是揀了這個地方來做她的個人冒險事業的背景的。她與愛森登似乎是一見而互相鍾情的。或者她到巴士拉是懷了這個目的而來的吧？他的戲劇化的舉動對於她並不見得太過戲劇化。他們倆都是戲劇化。她喜歡聲威顯赫的，或者她的對於聲威顯赫的嗜好，勝過她的評判力哩！

她似乎毫不遲疑，絕無條件，與沒有一絲隱藏地把她自己交給愛森登。這兒我再引證他的情書的句語說他們的戀愛是：「一種像旗幟一樣，自己飄揚震動的戀愛。」

但在這齣戲劇內還有一個重要的主角，那便是愛森登的妻約翰，一個富於魄力，有自主權與很好的內助的人物。是她的奢望去鼓勵愛森登成名的。還有幾個配角，萊安深切地怨恨愛森登竊取了他的「空中戀人」，哈密爾敦是好久便對伊利莎白存了宿怨的。這齣戲劇的詳情，我們可以想像而得，牠是一個千篇一律的戀愛故事，不過是在世界的舞臺扮演而已。這齣劇的緊張處是約

翰向世界議會去告發她的丈夫有參加反動與新式國家爲敵的行爲。她說她有截取的函件，但並沒有交出作證。其後二一〇六年間的歷史家把這個案件的詳情加以研究，宣稱並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可以證明伊利莎白·何熙及愛森登是和當時勢力四播的王黨與個人主義的反動運動有關係的，但在當時評議是很有可能性的，在伊利莎白寄給愛森登的潦草的信內，似乎她稱呼他做「我的王。」

她還把她和丈夫所作的令人不可置信的談話復述出來：即如對於未來的光榮的誇耀，對於他的同僚的陰沈的恫嚇，對於她的規勸的奇異的答覆等等。她至少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新式共和黨人。後來，在極端懊悔之中，她收回所有的證據，但已經太遲了！很顯然地牠是一半真的。很顯然地是經過她心目中斟酌的事實。

封鎖了愛森登的命運的卻是哈密爾敦。他在那組織來審判這件案子的特別法庭居了首席。「有些證據是動機的，」他說，眼望着那樣面無人色的控告的妻子。「但愛森登是否參加反動，到是一件小事情。他的真的罪卻是他聽任這件事情發生，私把他的精神由共和國的服務而移注於

個人的滿足與光榮。至少他已犯了自私自利的罪了。他已經把包圍着他的世界的福利爲他個人的戲劇而犧牲了。對於他的特別的罪狀的問題到是輕的。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愛森登做了些甚麼？」而是「我們將如何的去處置愛森登？」內戰與流血的慘劇，快要開展在面前了，不能不事先遏制。此時已經不是情人們的時候了。愛森登已經成了曖昧的人物。他不能再領導我們，沒有了他，我們如何辦呢？事已至此，愛森登，你是很不方便的。除了兩個女人的爭鬪之外，你是有礙賢路的。」

這些紀載，是由當時審判進行中所灌的留聲機片遺留下來的。似乎二一〇六年的歷史家，可以坐在他書桌之前，靜聆着那片子的轉動而知道牠的進展情形，注意於那些演說詞，而分別聲音的轉變。

停了一會，愛森登微咳了幾聲，清順了他的喉嚨說：

「我知道我是擋着賢路。」

法庭決定了不必公開審判也無須公明地判罪。因爲這樣會引起革命。給了愛森登一顆藥丸，

讓他暗地裏去服毒，『他可以坐在春明陽光之下，繁花茂草之中，』去服食了牠。

那張片子忽然傳出了一個尖銳的呼聲，約翰的慘厲的呼聲，抗言那最後的半小時，不能使兩個情人一齊的同度。經過許多年，那些片子仍然傳載着那淒涼片刻中所發出的尖銳的聲音。『我不能忍受啊！』約翰大聲的叫喊着——一直的到時間的終結。

『不，』伊利莎白的聲音在說：『你用不着再傷心了，約翰，不必了。現在甚麼都完了。永遠地完了！我現在便要走，離開法庭。我永沒存心這樣地傷害亞頓。我怎能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呢？我倆用不着再相見道別了！約翰！你不能自主地這樣做法。你不能不這樣做法。但我永無傷害你的心，也不欲傷害他啊！』

這些說話是由縮寫中表示出來的，但我們永遠不能聽見牠們的聲音。而那個百年之後把牠們紀錄下來的人，是一邊寫，一邊聽着的，她的聲音漸漸地微弱了。她是在那裏說話，抑或是作着演說呢？我們祇可猜度這些語句中有多少是表現她的戲劇化的性質或者是她的簡樸真誠的自然流露呢？

關於這個草創宣言，建設新式國家的英雄愛森登的最後幾分鐘的描寫，是無可稽考。或者他真的坐在陽光照着的花園裏，靜悄悄地把藥丸咽下去。他或者追懷他那奮鬥的生命，他那在崩潰時期的少年時代，與他那堅決不撓地爲新式國家而作的長久戰爭。或者照了浪漫的天例，他是祇在想念着伊利莎白。或者竟是他感覺異常的疲倦，而不能首尾一貫的來想起前事，祇頹然的坐在陽光之下，悵望着鮮明的花朵而已。這本書便從此不提他了。他死於法國的北部，但那些縮寫的稿本並沒有說明在那裏。

對於伊利莎白·何熙的命運是比較說得詳晰一點。她在那天便自殺了。她沒有甚麼藥丸。她採了一個最直接了當的方法，把她的飛機駛到最高度由空中自投下來。她斜傾的向上飛，似乎想快點離開這個沒有了浪漫愛情的世界。『那架飛機停着不向上爬了，牠不動地懸掛在那裏，在空中露着一個搖動的點子，忽然開始飄蕩，像一片枯葉的墜地。天空距離太高，人們不能看見那個駕駛人由機內跳躍出來，也是自空中墜落。在淺蒂里橡樹林中的枝幹上，有人看見一個破碎支離的肢體。』

兩星期之後，哈密爾敦也犯了「自私自利」的毛病，在他的避暑別墅中服安眠藥自殺了。

這便終結了這個小說式的楔子。牠是很淺薄的。牠與前後一切的事實都不諧合。我們知道還有其他的故事是關於第一次議會中的人物的，但此等相類似的事實我們可以想像得來，毋庸贅述。牠那種無量數的不連貫的地方，殊不適合於我們歷史的體裁。但由這裏我們可以想像人類的個人慾望是多麼的強盛啊！

當那個年輕的女人從雲端下墜之時，是否感覺她的生命是有價值的呢？歷史稱她做「最後的浪漫者。」

三 反叛的無功

二一〇六年間的歷史家深信伊利莎白·何熙和現在公開反叛的聯邦國家主義者們是沒有關係的。照留聲機片留傳下來的印象，她的言語與行爲，都證明她的人格，如果她的確是一個革命者，她便會棄掉她那叛逆的情人，便不會因為愛森登的被判死刑而爲戲劇化的自殺。她會駕機

飛去德國反動的大本營，盡她的能力去謀報仇雪恥了。但很明顯地，她對於復辟的叛謀漠然不稍關懷，所以說她連有這麼一事情發生都昧然不知，也是可能的。她和愛森登無疑地，是自始自終，忠於新式國家的。

但革命卻以她的慘劇爲藉口，利用她的名字來號召，而且很久人們便相信愛森登已經翻改巴士拉會議中的社會大同主義而贊同聯邦國家主義。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便是傳說那個老敵的國聯，居然超過了牠的實力而強盛起來，而很可笑的，便是牠竟提議把這個世界重新爲主權國所瓜分。巴威利亞的曼弗勒（Manfred）王子所作的宣言，把國聯擡上最高的地位。他稱牠爲「自由人民的世界聯邦」（World Federation of Free Peoples），而允許有思想、教育、營商、企業與宗教的自由，並且到處可以不受基本英語與外來勢力的限制。爲了預嘗這種好東西的滋味，他在那猶太人仍然停留着的法蘭克福區，免除了些殺戮的事情。（從這兒起到其他我講到時要說的地方，我能以極可靠的轉述示與讀者——編者。）

在這個擾亂時期中，並沒有真正的戰爭發生，簡直不能說是打仗。世界議會有着所有的交通

在牠的掌握之中，而照陸海軍專家的兵法成例，沒有交通是不能作戰的。在曼弗勒王子未服藥丸以前，他向世界作有力的宣言，但因為基本英語已為他的運動所廢除，祇可以用幾處地方的方言譯出，而以隱藏的手印器印在祕密的紙張上，至今尚為搜藏家所珍視。把無線電的交通截斷，是惡作劇而不是反叛的事情。在開始的時候為叛軍所奪取的工廠，都重新從事於製造軍器，但幾個星期之後，為靖亂瓦斯所威脅，便停止生產。在國家主義黨人的手裏也有些由空中警察逃伍的飛行人員以及很少數的私人飛機供其驅使；但因註冊法網的嚴密，警察巡查的精明，以及缺乏獨立的機場，不久便把反叛者由空中掃除了。

所餘的，祇是炸彈、禁用的槍枝、匕首與埋伏等等。也是藉了這些，而使反叛令人生畏，強迫偵探大行搜捕，限制私人行動與向世界統制作暴力的反抗，造成了人類歷史最後的殘酷的一頁。在街頭巷尾，在羣衆會議，在統治機關中，都蜂擁了那些不怕死的愛國之士。他們毫無知覺地與那些作奸犯科的不合法的組織混合。

是這個暗殺的戰爭，曼弗勒王子所稱爲『沈默與無軍備的戰爭』使新式國家翻了面孔變

成鐵石心腸。牠採取防範的步驟，牠開始疑忌與試驗；那個可畏的人物——行刑者——已經於二〇〇〇年前再度忙碌起來。他還要再忙十年；甚至在二〇五九年間麥幾夫宣言(Declaration of Megève)前，他尚未完全由世界消滅。但二〇三〇年之後，對於他的紀載，便無可稽考了。那個政府，自殺戮亞頓·愛森登與曼弗勒王子以後，便明白毒質藥丸的功用是多麼的有力而便利。這個禮貌的方法，已經取了嚴刑酷法的地位而代之，每一個被判決的人，都是做照蘇格拉底(Socrates)的死亡方法，可以任他的意旨，召集親朋，或游覽名勝區域，或深處於辦事機關以內，以終其生命。

年老的林凱在委員會內抗議無功，即如他曩者辯言人們沒有資格去實行馬克維尼的政策，他現在宣稱人們也沒有資格去向同樣的人類施行生殺之權。『當你殺戮的時候你便暗殺自己』，他這樣地說。

反叛者的殺戮方法是比較強暴與固執，他們的被害者，在臨終之時，是沒有這樣安靜與莊嚴。他們是被刀刺死、槍斃與毒打致命的。

「爲了恐怖，死亡必須爲恐怖的，」克拉馬這樣地寫。

「爲了暗殺，死亡一定不可避免的，」安多阿納·亞伊拉這樣地說。

到末了，刑法似乎已經達到牠的目的。在二〇〇五年有政治暗殺案五千七百零三起，在二〇〇七年有一千一百一十四起。最後的紀載是在二〇三四年。總數是十二萬起。但在此二十九年之間，政治的死刑卻有四萬七千零六十六起！據李漢尼的調查，其中有百分之七是爲不分皂白的，環境可疑的，或其他不充足的證據而定罪的。大多數是用軍法從事。千年的幸福降臨了，但沒有甚麼幸福的象徵挾以俱來啊！

四 訓練人類

到了這一點，雷汾的縮寫又顯得非常地零亂，幾乎不能閱讀，字裏行間表現着雷芬反抗的心情與這本書相混合。

在紀載中流露着久未解決的相信強迫與相信好意的兩重思想。當我一邊抄錄的時候，受到很大的感觸；當然牠不會使同時的作者與讀者漠然無動於中。在那歷史家的貢獻中，我得了一個

印象，除了叫牠做不人道，還有甚麼呢？這裏我們所描寫的人是各有着他們根本不同的思想的。這一百七十年間短短的過渡時期，是很顯著地表明人心銳敏的轉變。我懷疑，如果把十八世紀的人心，與我們今日的思想比較，有沒有表示同樣的區別哩。這樣的心理，會不會使我們現在對於他們所尊重的事物，覺得太為難解與懷疑，對於生物學上的事物覺得太為粗糙明顯，而情感方面，太過殘缺呢？

把約翰生 (Johnson) 和愛迪生 (Addison) 這兩位古文豪弄到復活起來和我們討論當世的問題，實是一件陳腐的滑稽之談吧？但普通地說起來，這個滑稽之談，並不祇是說把新式的反動藏在舊式的言詞裏之謂。這些二一〇六年間的作者對於我們現在的抵抗力所表示的過於明顯，冷酷與輕視的批評，就我個人的感想，我感覺我自己又在溫習那些陳腐之談。我以為如果我們確能使約翰生復活，我們所看見的一定是一個沒有禮貌，討人厭惡，不合時宜，形容不整，行為怪誕的老頭子，他對於事物的品評，必定深染着古時的色彩，而他與我們相接觸，我們的行徑，我們的奇異的特殊價值，對於我們的這種，或者他的心目中所認為的，不合人道的人道主義 (Inhumanism)

humanitarianism) 以及我們的殘酷的理智，都必定都會使他發生不可救治的煩惱的。一個處在公認的及可以公認的制度，風俗與見解的背景之下的人，一旦，到他的背景幻滅的時候，他便會感覺得像一個殉道者，四方八面都爲人們目灼灼所逼視。自然他會爲人擁着去與哲斯脫敦 (G. K. Chesterton) 先生相晤，這種晤會是他感覺最痛苦的。因爲一向爲人所視爲這老博士的化身的哲斯脫敦先生，是不受時代環境支配的人，正如我們中的極端未來主義者一樣。

我個人對於目前的現象是一個對敵的批評家，而且在大體上是革命的。雖然如此，我卻能與週圍的人安然相處，原因便是縱使我所作的歌曲是革命的歌曲，但音調是和他們的和諧的。我可以測度到，如果把我移植在雷汾的歷史中所表示的那麼一個比較快樂與有生氣的世界裏，我便會感覺，不論在大事上或小事上，我都是格格不相入的。我將找不到有人和我的智力觀察一樣的，我會不得要領地發笑，絕不會明白那使得這些偉大與有魄力的人們愉快的事情是甚麼，一切生活的事物，便會很快地在我的面前疾飛而過，使我惘然了。我平日所希望與預言的事情或者都可以由那裏找得到，但是在大體上，卻是非常地生疎與不同了。

我由雷汾的稿本內，得了一個教訓，那便是一個人的心理，一個成年人的心理，是不大容易移植於新的時代與空氣之中，像我以前所想像的一般。對於我，那段關於亞頓·愛森登的勇敢的領袖才，他的自負的觀念，以及他對於伊利莎白的不能節制的愛，有如一件悲喜的劇情；而二一〇六年間的歷史家卻把他倆的事情來做分析反叛的自私自利情感的原料。我對於這，內心裏發生一種反感，即如反對那假設世界大戰是一個耗廢的過程，牠的英雄主義與犧牲是盲目的暴動，牠的重要性，是少於引起戰爭的社會與經濟的崩潰的那個見解一樣。

當我看到這些不相連貫的記載，表示在航空獨裁之下如何地冷酷的去管束人類的動機，甚至雷汾都不喜歡把牠抄錄的記載，我對於牠的厭惡是不可磨滅的。我感覺得，如果不是「時間與空間的事實，」我也會成爲一個活躍的反抗的人，在航空獨裁無情的巨靈掌中，扭動着了。但是，不論牠合於我自己的性情與否，這個故事，是由雷汾交給我的，我不能不把牠重述出來。

那些創造偉大革命與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八年間統一世界的人物的知識觀念是和我們一樣的。他們是與我們現在的智力與道德思想有直接的連貫。當讀者一頁一頁翻閱的時候，如果

這本歷史是有一些真實的，此時，那尚未聞名的特溫得，必定在柏林或倫敦專心致意於他那「構成新式國家核心的學說」(Theory of the Nucleated Modern State)，那便是最後鞏固的計劃，出版者此時必定已經讀到，而且拒絕了這個偉大工作的預備計劃；一兩年後，必有些愛森登夫人會把她的孩子取上「亞頓」的名字。這件事情是和我們這樣地密邇的。所以在第一次世界議會中的人物，是把事情的兩方面都看見的，他們的感情是徘徊於我們的傳統習慣與他們創造中的新制度之間，而不能自決。但以後組織了航空獨裁的那一代，自始便在新式國家的核心所設的富於進取性與活潑性的新式學校所陶養出來的，他們飽讀着新的文學，有着新鮮的目光，而他們的思想是為社會心理學家與美國的新派律師的影響所決定了的。他們是具有很大的建設能力的。對於他們，度數的相差是曖昧的，和人妥協是懦弱的。

關於未來的事情，很明顯地，那個有着敵人的攻擊及政治的糾紛的第一次世界議會的效力是比不上那個毫無障礙的教育管理部牠在議會統治之下工作着，漸漸地把警察、衛生、學校與文學集而為一個強有力的總指導處。當世界議會方在戰爭，指導與推進着那個統一的新式國家時，

那教育管理部便在那裏重新創造人類的典型。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初年，以前的革命領袖，已經淪為次要的地位，由世界舞臺的燦爛光輝之下消失，而另外有一班比較單純、比較決斷的統治者取而代之了。

（由此處我繼續錄寫下去——編者識。）

「這個世界沒有人工的異點，已經够複雜的了，」這便是那創造航空獨裁人物的教育管理部所說的一句格言；而這句格言的命意便是：「牠並不增加人類集會的利益去受可避免的智力上的殘廢與缺點的痛苦。」所以這一班的教師，便聚精會神於保障新生命的工作，甚至未誕生之前的環境也注意到，他們認這個對於體力上與智力上都有很大的影響的。對於這個教育管理部是沒有一絲一毫的疑懼的陰影。每一個可能的人類都要被帶到這個新的社會裏來。每一個人都得新式化。每一年都增進新式國家會友的權威；在二〇〇〇年時，牠的人數是五百萬，到二〇一〇年加增至十三萬。每一度的增加，使教育管理部漸漸地把牠的調查與強迫的手段伸入人類生活的內部裏來。牠已經用牠的方式造就了許多的男女工作人員，並且牠還有大批可以信託的教師

與調查員。

立刻顯現的優良的體力結果是無可否認的。由歷史圖畫百卷中所表示的，自一九九〇年以來，不單是製造圖畫的技術大有進步，與圖畫的豐富，而且是恢復了體格的健全。當讀者們閱覽一頁一頁的圖畫時，他便看見，畫中的人又整作起來了，體力又發展起來了，而且更加活潑了。那些垂頭曲背，步履遲滯的男人女人，沒有志趣的神情，因為滋養不適宜而過度瘦削與肥腫的身軀，第二次世界經濟崩潰時代衣衫襤褸者，都消滅了；自一九九〇年以後，衣着是清潔而樸素的，到了二〇一〇年後，便顯得很華麗了。

這些事情所以得到奏效，大半由於十九世紀自由思想所認為『迫害』(Persecution)工作之力。初期的世界議會因為創立之始，百事殷繁，所以不能把牠的勢力伸到地球的每一部分裏去。這個新的世界議會，也便是稱為航空獨裁的，便不如是了。牠開始向那些窮鄉僻壤作有秩序的攻擊。政府自二〇〇六年起很注意於馴服那些仍然未開化的農民在海地的，在愛爾蘭的，在非洲西部及中部的，在意大利南部的，在美洲的佐治亞與鄰近的省分，在高加索的佐治亞，在孟加拉東

境，以及那些地方有着傳統的迷信，祕密結社，巫術的宗教，或以人作犧牲的習慣的。大加搜捕賣藥人、巫術客、牧師、宗教的教師以及叛亂的組織者；他們不是被罰便是放逐，妨礙子女入大同主義的學校受教育的父母亦受譴罰。

很多批評航空獨裁的人的意見是以爲向這些行將自歸淘汰的風俗信仰加以壓迫是不必要的，儘可以讓牠們自行消滅。但是新時代的統治者是把事情看得很嚴重。這是一件紛爭難決的問題，因爲吾人所知道的，祇是已經實現的事情。

那個舊的天主教會似乎此時仍然存在，牠是最後殘餘的基督教組織，但已經凋敝不堪，內部的分裂，使牠大受苦痛，顯然的，這種教會的存在是在黑暗的數十年中沒有完善交通的結果。教皇有三位，一在都伯林 (Dublin)，一在羅馬，一在伯南布哥 (Pernambuco 是有色人種的教皇) 就合法的觀點上看來，愛爾蘭的教皇纔是聖彼得 (St. Peter) 最合法的承繼者。他是由教王選舉會 (Conclave) 正式選舉出來的，但是法西斯蒂的組織反對他，說他不是意籍的人，他的原來名字是阿多 (O'Dowd)，他的發音亦不是意大利人的口音，所以長老們又預備重新選舉。在美國方面，似

乎有些不合法的組織是與此事有關的，但詳情是很晦昧，實無須費讀者的時間去研究。後來，在法國方面的天主教徒便分爲都伯林與羅馬兩派，這種分裂便引起無數的械鬪、暴動與小的地方戰爭。「打倒僞教皇」愛爾蘭人這樣地說。由這件事情，可與我們所追憶的曩者法國專制與中歐的帝制的競爭，以致教會的分裂，而設立一個相敵的教皇在亞威農（Avignon）的前事，後先輝映。

愛爾蘭是基督教最後的壁壘。由一九四四年起以迄於一九八〇年，在南方是強迫信天主教的，而且愛爾蘭的土語，雖然涵雜了英語在內的，也成爲必須。公然節制生育的知識已經被禁制，雖然牠對於人口的低減並沒有甚麼的影響。在這裏，新式國家的核心所受抵制，比較在任何地方爲甚。航空獨裁，覺得牠自己是在從事於牠那爲權力而曾經過的苦戰，來對付那些頑強的人民。整個世界上的愛爾蘭人都起而反抗。在愛爾蘭本地，自從大疫以後，她的人口永不能超過二百萬，但在英國方言的地方，愛爾蘭人的傳統思想習慣，卻廣播地流傳。就中反對約束訓練人類的那幾個比較明敏可畏的人物，如林因（Paidrick Lynd）、費茲齊那爾（Arthur Fitzgerald）及奧度耶（Bernard O' Dwyer）等，都是愛爾蘭人。最可異的便是三人都不是天主教徒，而費茲齊那爾且會

經以詆毀教會而被監禁過的。但他們的反叛精神不是天性生就的，便是天性上受了這種惡習的渲染。

在前段末尾所說的兩點，孰是孰非只有任讀者去觀察，關於這，發生了一個至今未能解決的問題，牠是解決我們當代的道德問題的癥結。航空獨裁祇有着一個未能充分發展的社會心理科學，而要負起一個最晦昧最紛紜的教育問題，去應付各種不同的天生反對合作世界的思想。特溫得，祇知把他的全副精神注於世界組織的偉大計劃，而視這些「反對的精神」為一種罪惡，是應該防備，與完全剷除，不至有礙於政府的實行的。航空獨裁，的確依照了這些主張去處置世界的問題。人們會以為除了這個方法，是不能使整個世界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永久的世界和平的。然而這些假設都是錯誤的，到了終局，他們不得不放棄原有的主張，而另外採行比較沈靜與較佳的方法。每一個有經驗的教師都知道抵抗是教育中不可少的原質。軟性的沒有抵抗的資料，容易接受，也容易消失。容易接受的學生，必把教訓瞬即忘懷。學生的反響愈大，教師的指導愈感困難，但收效也會好。而且抵抗不免有某種合作的要素在內，所學到的，用於鬭爭上便成為一個合成的，團結

的要素。說一個譬喻吧。在一塊乳餅上雕刻是比較在一方木頭上雕刻來得容易；每一方木頭有牠的偏重力，必須依了牠的條件然後可以動手工作，但到終結，乳餅上的雕刻與木頭上的雕刻，無論在質地上，在興趣上，都是不可以相比擬的。這是教育家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爲教育管理部的工作所持的辯護便是，牠的壓迫的步驟目的，並不在意於內心的抵抗，而在於那些由革命以前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人工的抵抗。

在十八世紀的時代會有很簡陋的分析，所稱爲「種族」的特質的。曾經很武斷地把混雜的人種加以分類，即如西班牙或「西方」，「俄羅斯」或「猶太人」；這種的分類是很不公平與不正確的，而且往往絕端的惡作劇。現在我們不再談種族，但承認團體的特質，是由遺傳得來的，考古家現方從事於把人的種類作科學的分類。有些地方表明人類的頑抗性質的強弱是不一致的。怎麼會有些人是比較其他的人來得強頑，並不是容易明瞭的事情。對於這一點，人的生命循環中是有着很大的差別。強頑的性質，因年齡及性別之差而有分別。和飲食也有關係。有些人在孩提時代非常強頑，但其後比較近情理起來。有些人在青春發育時期，是最難禁制的。普通的說起來與年齡

俱長的，是靜的抵抗，不可教誨與強頑難馴，而不是反叛的能力，而在有些人民之中，愛爾蘭人便是其中之一，男子經過了發育期便變成非常強頑，簡直是到了頑冥不化的最高度。

那些爲航空獨裁作辯護的人們說牠的傳道的教師已經準備着很同情地去訓誨世界各部和他們接觸的人類。如果抵抗是發生於教師與學生個人之間的，他們很歡迎牠。至少，他們口裏說歡迎牠。但如果有少年的有秩序的組織，把漠不關心的青年也吸收入來，作羣衆的抵抗，與世界制度反對，這樣，那教育管理部便有權去取締書籍、集會、教誨與暴動。牠既賦有這種權力，如不知道去利用牠，便是一種罪惡。「我們並不禁遏個性，我們並不摧殘自由；我們祇剷除障礙與摒絕誘惑。這個世界仍然充滿了邪說，危險的思想與奸謀的命意，把這一切掃蕩無存，便是政府的職責！」在二〇一七年教育議會曾作這麼一個備忘錄的宣言：「我們必須把一個共同生存的目光，一個辨別是非的共同觀念，急速地建設於整個世界人民之中。自然的本能，在一個人工所造的迷路是沒有多大的幫助的。必須以訓練來輔助牠。訓練愈優，反對愈不必須；剷除邪說暴動愈力，人類的生活便愈加自由與安寧。一切的事物，已經恢復繁榮的象徵了，我們不能以目前人類的品行去與豐富安

閒相見面。必須堅實起來，必須經過訓練，纔得整齊。」

在一九五五年，整個世界的人類都在禍亂、災饑與瘟疫之中痛苦顛連着；人口大為低減，頗有絕種的趨勢。否極泰來的轉變急速，是人們所不及料的。在二〇一七年間，我們所得的印象便是，當時的統治者對於豐富與過分的安閒深存着戒心，為之惴惴不安哩！

編者誌：

我想假使我把從一九六五年到二一〇六年間在發展中的世界政府的政治制度作一個概論，可使讀者們得到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在著雷汾這本書的歷史家，是為他的當世而寫的，所以很多組織制度都為讀者們所不及知的。幸而共產黨及法西斯蒂黨與政府的互相關係，使我們可藉以明瞭那個新式國家運動對於世界議會——一九六五年後實際的世界政府——的關係如何。牠是牠的動機與良知。

世界上政治的組織是這樣地發展的：

自從戰爭混亂之後（一九四〇—五〇）以及後來的瘟疫和社會的解體（一九五〇—六

○，在新興的團體之中，有一個大團體爲生還的飛行人員與交通事業人員所合組的運輸聯合會。在開始之時，牠並不知道牠自己的重要性，雖然特溫得已經預言了。

牠召集了各種技術人員的會議，其後在一九六五年，重新組織空海管理部及附設機關如供給管理、運輸管理、教育與廣告管理各部以及其他因時而異的管理部。

在一九七八年第二次巴士拉會議時候發起了世界議會，是空海管理部第一次正式宣言爲世界最高的政府的就是世界議會。那空海管理部於世界議會宣言之後便歸消失，而其他附庸的管理部有仍是存在的，有合併的，亦有新添出來的，隸屬於世界議會最高統治之下，有如現存政府的各部一樣。

在一九七八至二〇五九年間政治組織並無大的變動，但那最高政府的精神與方法卻大大地變遷了。一種新的統治者起而當政，比較兩次參加巴士拉會議的人物爲嚴肅、忠謹與有決心。這班比較年輕的人，組織了歷史家所稱爲第二次的議會，雖然實際上是第一次議會蟬聯而來的。雖然曾經發生一次權威的爭奪，及幾個元老的被誅，但政治制度並無更改，仍舊是一個組織世界

上最高政府的世界議會。這個第二次的議會，在初期又名爲航空獨裁，其後又稱作清教專制。這些並不是憲法上的名詞，而是描寫的語句。世界議會中的會員是由個人的進出爲變動，但牠的資格，是四十年都是一律的。漸漸地會員的年齡增加起來，到二〇四五年，牠的普通年齡是六十一歲。這個第二次世界議會繼續當政，一直到二〇五九年密幾夫的會議，纔把世界政府重新組織，詳情將見以下各章。

這裏且讓我們來談談這些統治的團體與世界國家運動的關係如何？

鼓勵這種變遷的思想，是由一班作者主動，就以特溫得爲最昭著的人物。他把世界國家的計劃大綱寫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那本社會核心內。這本書的本質幾乎爲牠的歷史重要性所完全遮蔽。牠是一部遲緩的苦心的構作。

爲空海管理部準備了計劃的，是新式國家運動的種子。新式國家運動未嘗成爲一個正式組織的政府也沒有甚麼執行公務的性質；牠是去宣傳與發展一個思想制度的，而這種思想制度便產生牠自己的政府制度。這個『運動』的動機是宣傳與研究，其後纔成了一個宣傳研究與教育

的組織。牠的全力活動的會員便叫做會友；牠有一種不活動的會員，他們對於活動會員的關係，是隨環境與時期而異的；牠還有一種學習人員，數目比較活動會友更多。牠差不多把成年的男女都吸收來做牠的會友。

牠永沒有分爲地方的團體。會友到了任何的地方中樞都是被容納的。牠的出發點雖然大體上是地方的核心，但這種的分區是祇爲宣傳、教訓以及地方事宜的利便而設的。會友的分組是研究會(Faculties)，而由這些再分爲組與系。研究會的種類，計有科學研究會、解釋與教育研究會、及衛生、社會狀況、農業、鑛產等研究會。牠的分裂與合組是往和管理部的離合有關係的，因爲很明顯地，一個學員社與一個或多個的管理部相接觸，是一種精神上的利便。

研究會和牠們的分設機關，牠們的組與系，佔有選舉的中央議會，但新式國家以後還不會有一個總指導機關，似乎在初期，有一個很簡單的宣傳與調查的核心的制度的。牠的核心幾乎自開始便很自然的類分爲研究會，每一個由牠自己的觀點上觀察事物；這個運動，整個說起來，並不需要一個連續性的指導議會；當各個不同的研究會有共同行事之時，祇召集會議便可以了。

一個男的或女的同時隸屬於兩個或多個的研究會，並不是困難的事情，而且這樣，還可以使研究會互相溶化。新式國家運動，是一個向社會組織作攻擊的公開制度；牠是一個融化體而不是一個模型。各種管理部纔是模型。

各種研究會和牠們的組與系是發展得很不平等的；有些漸趨衰替，而有些且大量地推廣，創設牠們自己的機關。科學研究會中的社會心理學組，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牠駢合了整個訓練與廣告的研究會的工作。這個社會心理組是教育管理部的合法與負責的指導者。

這個團體的社會心理學家與他們的共同工作人員成了一個大的批評與訓練的機關，和世界議會並立，其後且取而代之，詳情將見於以後數章中。

那時世界似乎已經沒有一個單獨的永久政府了。牠祇有各種的管理部相互間的關係，用會議法子來交換意見。牠們的種類為運輸，天然生產製造物品，人口（屋宇與增加建築），社會衛生（警察與醫藥），教育（此二者後來溶化合併為行為管理部 Behaviour Control）等管理部以及科學研究與創造工作的不絕推廣的活動。所以這個世界，在以前曾為土地的列強 (Territorial

(Great Powers) 所瓜分的，現在是為職能的列強 (Functional Great Powers) 所瓜分了。

其後，又似乎有一個和議與合作局 (Bureau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的設立，牠取決管理部相互間的會議的問題。牠的性質有如最高法院，而不像一個統治的議會。

大多數新式國家運動時的舊研究會，在這些管理部之下，溶化而為技術的組織，祇有一個例外，那便是，以前隸屬於科學研究會的社會心理學組，牠到了二一〇六年，已經成為整個世界上的文學、哲學與普通思想的中心。牠是由新式國家運動所遺留下來的重要的研究會，是人體上理智的靈魂。

到末了，牠便成了像十九世紀所慣常想到的，以輿論的名義而存在的整個世界的活動思想與幻想的主腦。到了二一〇六年，已經很明顯地看到這個理智的統治是一個無可匹敵的成功。牠是地球上君王、總統或最高政府所遺留下來唯一的東西了。

這種總敘與辨清那些支離破碎的書中大事體，或者不會使那些早已自己領會的讀者們發生厭倦吧？以下再將敘述書中的事實。

五 本文繼續——第二次議會的專制

航空獨裁，史家又名爲清教專制(Puritan Tyranny)。由這個觀點上，我們可以略爲敘述一下。『清教』是誤用的字眼。原來牠只是那些反對羅馬天主教聖經的新教徒中一種教義，注重一種嚴格的自修與訓練的生活，而以畏避惰怠與道德上的敗行爲主要。牠包含了一個很高尙的認識。『我將不做甚麼值得做的事情，而且沒有甚麼值得做的事情爲我所做，除非是我堅定地修養我自己的品行。』如果這個新的航空獨裁是想向世界加以嚴肅的訓練，牠便是一定把牠自己更加訓練起來。

世界國家的創始人的法律是很簡樸的。『說真話，維持技術的標準，管理金錢但不可保留着牠，把你的權力慷慨地貢獻於世界國家的役務，』他們這樣地堅持着。這似乎讓他們有很多自奉甚豐的機會。後來的確見諸事實。他們酒醉，食飽又享男女之樂，而且互相傾軋，爭權奪利，不能防範怨讎叢生。我們這本歷史已經對於愛森登的失敗與死亡作了一瞥，但此不過是第一次議會的人

物中個人生活描寫的片段。漸漸地有一個歷史學生團體再從而把詳情仔細地加以研究。除了已死的人，不能聽見判詞，他們所作的結論，其殘酷處，有如基督教徒幻想中的世界末日大審判的時候，紀錄罪惡，無可逃遁一樣。

他們都是顯出來很可憐的人。他們都是不期然而獲罪的。他們都是在疲勞的狀態中，不知不覺，爲怨憤、色情及阿諛所乘。女子仰慕他們的地位，便在他們不能自持的時候，向其表示愛慕。由許多案件中觀察，道德的墮落，是由於他們置身於世界事業，過於努力而無限制。他們只是工作沒有休息。於是他們便會感覺人生枯燥疲乏到不堪，而道德之方便爾崩潰。這完全是公衆的事業，與個人內心的慾望不平衡的結果。惡的品性，隨之發生，遂淪於惰怠與極度的放縱。對於會友的職務，既失其常度，外界誹謗，乃由是而生。「這些會友」批評家說，「實無愈於舊制度虛詐無賴之徒。林凱那個智慧的人，是對於他的小朋友濫施情好，亞達西爾(Armlasher)，那試驗的飛機師領袖，居然使他手下那一班青年去做危險的空中表演以取悅於女子。馬勞威是很無顧忌地收羅波斯的精神的畫像，而費度·加倫現在便把他一半的時間來經營他那座在巴比倫的花園。」

那些懷着奢望的青年人，當第一次巴士拉會議開幕的時候，不過是小孩子，他們的教師是非常地熱誠的，因為他們的工作繁重，沒有小朋友，沒有精緻畫像，沒有花園去娛樂他們。這些教師很明白他們領袖們的弱點，而且承認自己的道德高尚。在他們訓誨下的兒童，都是沈浸於建設的熱忱中，但他們也是被訓練去審判與懲罰那些過時與疲乏的先進者的錯過。他們知道這個為他們創造的光明新世界，現在是在創造者的手裏有覆沒的危險了。比較優良的技術訓練，使他們感覺自己的重要，與行為謹慎一點，有較大的才幹去處世。他們對於原則是簡單的，對於細情是着實的。他們對於飲食嗜好都有一個新式的智慧；他們認不合宜是一種罪惡。

這些不同之點，可以由歷史圖畫中，表示出來。我們可以看見長輩的人的服裝，倘非不修邊幅，便是衣着如畫，而且他們的姿勢是很不自然與沒有風度的。至於那些青年的男女，乃是衣著簡樸，體格趨健。嚴整已成了他們的第二本性，他們的任事專心與犧牲個人，已到了很高的程度，即如他們連照片的攝取都認為不可必；而在中央委員會裏，主席與主動提議的人的名字，都沒有留於紀錄。曾經用了特別的研究工夫，纔找出些這第二代的世界統治者的名字，他們建設了那個清教

專制而使社會主義的世界國家臻於鞏固。其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便是韓修 (Han Hsu) 與安多阿納·亞伊拉。

他們並不用武力去驅除前任的人員，但是由於他們高超的能力與工作力，便逐個地把那些人排斥了去。此時大革命已經完成了；世界國家已在創設中了。但牠尙未得到鞏固。這是一個需要精明強悍，飽受訓練的人才，去仔細地工作的時候。他們並不由選舉或政治的背景所推選去任議會的職位，他們是由自己的才幹、魄力而選擇出來的。那些比較溫和沈靜的人，不能追蹤而上，便佔了次要的地位。有些教師對於他們的影響是非常地大的。有三所學校——哥印柏拉 (Coimbra) 的恩那苗諾學校 (Unamuno Foundation)，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及東京社會學院 (Tokio Social College)——所出的人才，佔了二〇一七年世界議會中三分之一有多的職位。

四十年之久，這個新的議會，在新陳代謝之中，使整代的男女盡力於工作。赫斯里 (一八九四—二〇〇四)，反動作家中最聰明的一個，所作的預言說：「他們整理這個世界。」

在他們大刀闊斧地掃除之下，人類得到清潔整齊是無可諱言的。他們加緊新式國家會友的

訓練，但仍然會友的數目日漸增加，至佔了成年人的大部分。會友的思想習慣，行爲舉止，已經使全體人民受到薰陶了。據伏爾丁（Vordin）所說這個專制把人類的面容都改變了。牠閉了人們的口而使口脣很堅決地合攏來，眼光坦白而堅定，前額開曠，揚眉吐氣，消滅了許多皺紋及表情習慣。把前後兩代的照片兩相比較，便知道這種的形象是正確的。一種種的怪誕的人物，逐漸稀少，漸不見於人類的滑稽劇中，而終於完全消失。無賴與反抗之徒，年齒漸增，曝日而坐，游手好閒，然不久即歸幻滅。他們連很多不和諧與乖僻面容的人都溶化起來。賣淫的娼妓亦已停止，洗去女子的一個污點。商人沒有交易可做，便投效於供給管理部。賭博、跑馬、競技都不合時宜了。紙牌永遠退隱在博物院，不再出來了。每種幻滅的習尚，都被認爲「反動的制度」，而社會化的代之而興。人類也不再戴假面具了。

世界日趨安全與鞏固。忠誠坦白之人得以安然，而機詐狡獪之人漸滅。人道已經翻轉過來了。對於外物，不大介意，沈思苦慮的表情，亦已喪失。「每一個人都要知得很清楚，人們不必再懷疑不決了。」那些新的統治者說。舊的宗教不能影響新信仰的道德地位，甚至因奪取牠們的教育勢力

的壓迫，發生怨恨反抗，也不能保存牠們。經過四十年之久，這種新聖人的統治，這種堅決的使生活簡單化與和平化的政策繼續地進行着。

歷史乃成爲一種大量增加的工程工作、耕種及開發地球上的富源等事實的紀載。新的機器出現了，繁多了，不久又爲較好的機器所替代了。地球上的景象都改變了。科學化的分派人口工作開始。但是當時的景象和我們今日世界的樣子，又不相同。在人類歷史中，沒有一個時期曾經留下這樣的新異與不同的圖畫的。

這個時期的服裝，因爲簡樸的緣故，並不討人厭；人類的體格見諸於圖畫中的，也可以過得去，但是這班科學化的清教徒，亦產生了些粗笨的建築物，可怕而且粗笨的屋宇，陰鬱的森林，粗重難看的水塔電廠等等，都是這個地球以前所無的。雖然如此，他們使撒哈拉沙漠得到水的供給，而令北非成爲世界上濱海與最可愛的地方。人類的生產能力的增加，一日千里，雖有限制節省人力的機器的法令，也不受影響。然而這些清教徒對於安閒的生活，仍存恐懼之心。他們覺得道德上是應該使人人不停地前進的。他們替會友發明工作，而且爲整個世界找到工作。在他們統治之下，地球

竟變得像一個蟻塚，清潔有序，而且是非常地忙碌的。他們是這樣嚴肅地去改正他們前任人員的弱點，而又是這樣地不辭勞碌地去苦幹。

現在且讓我們審查一下，對於這種嚴酷遏抑的時期人類所能貢獻的好處是甚麼。雖然到了末年，不免有很輕微的淫暴的色彩滲入，而總括起來說，好處仍是比較壞處多。『掃除過時的道德』（這句說話是安多阿納·亞伊拉的）『完成一個強有力與自省的，使慣於服務的，使有創造活動的，使人們合作的，使公私方面都有好行為的，以及各種真誠的新法典，為後世所用。我們現在似乎感覺得很容易的生長在一個自由豐富與快樂的世界裏，而不知甚至在二〇〇〇年之間尚須費盡力量纔可以把世界一切推動，並不是像我們今日的這樣自然與簡單啊！我們覺得要幻想在二〇〇〇年前，那些沒有訓練，缺乏生活力，與毫無目的的人民，是如何地受誘惑去觀望不前，遇事尋覓，找尋娛樂，感覺厭倦而做些捱日子的工作的事情幾乎是不可能。更困難的，便是去認識這些誘惑力是如何地暗中散播於羣衆之中，以及他們是怎樣的難，纔去走上一條正路。我們不得不相信心理學家的研究所得了。』

新的清教徒的排斥舊文學，便是一個例子。這是現在看起來是不必須的事情。對於我們，這些舊的小說戲劇，似乎藏了很奇異與不清晰的動機，簡直不能幻想到人們會怎麼的受了牠們的影響的。照這樣說起來，他們是可以爲中國圖書與希臘的石像所誘惑而入於歧途的了！但在禁遏之前，這些書是被稱爲『傳染病』的。牠們是代表真實的生活。牠們是行爲與普通品格的典型。那些粗陋的侮辱的言詞，那些下流社會的假同情的譏諷語調，那些上流階級的滑稽的談吐，照我們看來不是庸昧的，便是陰險的。我們不能明白我們的祖先怎樣會在粗野之夫的錯誤的觀念中得到樂趣。但是他們卻向世界上殘廢之人作諷笑啊！同樣地不可解的，便是他們在愛情上所做的假做作，以及無謂的犧牲與失望。『浪漫，是孱弱的心靈對於不可克制的禁遏所發生的暴烈與慘淡的反響，』保羅·漢尼斯 (Paul Hennessey) 這樣地說。

我們感覺得那些書，都是向戰爭及屠殺歌功頌德，及對於種族不同的仇視，過分張大其詞，這樣的不合理，使人懷疑牠是否抓住了命意的所在。但牠們卻真的抓住了，而且強迫了。牠們驅逐無數的人去暗殺、濫刑與存心摧殘。牠們把最險毒與最殘忍的罪惡染着英雄的色彩。牠們必須打破

了這種傳統觀念纔可以給人家看。必須有航空獨制的英雄的誇大性質把舊的文學戲劇一時禁絕，把舊宗教與迷信所生的制度加以取締，把煽動仇視心理的男女監禁與隔離很嚴酷地禁絕未成年人的性的刺激，與普遍地施行性衛生的教育，去把人類的思想廓清，以組織今日文明的世界。除了這，沒有別的復興的方法了。

約瑟·柯蘭尼和夫斯基 (Joseph Koreniovsky) 稱這個清教專制爲「人類蘇醒後刺激精神的冷水浴」。他說：「人們在二十一世紀初年仍然是似醒非醒，睡意朦朧的，大有復現衰敗時期中紛亂的夢囈般的生活的危險。你可以稱牠爲專制，但實際牠是一種解放，牠並不禁遏人們而是防範。我們之中沒有一個可以完全認識脫離傳統觀念的包圍的價值，因爲我們現在都已脫離了。」

次於這種對於世界的「思想上的消毒」(Mental disinfection)，消毒還有一個和牠不可分離的，便是航空獨裁所做的人類物體上的消毒 (Physical disinfection)。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四〇之間，世界上每一間房屋如不是摧毀重建，便是再整與極度的廓除。在這種工作進行中，無

疑地是減去不少的風光，當吾人瀏覽圖畫時，使吾人打寒噤的，便是看見一片白地的街道，可以移動的鄉村小屋，荒涼的公衆建築物，及其冷氣逼人的，有鋼質傢具的內部，牠到處替代了茅房、草屋、斷瓦頹垣的市禮堂、市場、教堂、工廠與鐵道站等種種，我們那些發育不完全精神頹萎的先人混集着來做各種的生意的地方。

同是在這個時期，那些常見於以前的歷史，而爲今人所不及知的各種癘疫，都歸消滅；其中如涕膜炎、流行症、百日咳、睡眠症、霍亂、傷寒、假傷寒、鼠疫、疹子與其他二三十種的傳染症都蕩然無存了。（祇有黃色熱症在二〇五〇年之後，仍是非常利害，其後二〇七九年的特別工作纔剷除了牠。）所有的性病在兩代之間，竟已完全消除；關於這種性病的舊的記載是非常地可怕與使人厭惡的，這種的描寫，認爲不適合於普通的讀者去瀏覽。此外對於植物的病也大加攻擊，但讀者們可以由植物學歷史中，得到詳細經過的情形，不庸此處贅述。

那些重寫人類歷史的心理學家，仍然有許多關於這班統治者的訓練與初期影響的問題，不能決定，所以關於苛酷與退化的過程，說得仍不完全。他們承認專制是一種解放，但他們堅持着人

類重大的慾望，在這人造的環境裏是不能得到滿足。舊的傳統觀念與爲害的邪思是深伏在這種慾望之中的，而這個專制卻不以掃除舊的傳統觀念爲滿足。牠把所有的慾望都加以遏抑。牠連根帶土都拔了出來，牠認不竭地工作，爲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過分的工作與勞苦的奮鬥，是往昔人類統治者的共同特質。這種的例子，可由亞蘇加諭旨 (Edicts of Asoka)，尤其是在洛克第六諭 (Rock Edict VI 見 D. R. Bhandarkar 所著的 Asoka, 1922年，古典歷史研究 Classical Historical Studies 111——1180) 中窺見一斑。諭旨中說：「我永遠不能滿意於政務的處理，盡力的奮爲。全世界的幸福乃是我的天職。」大多數帝王與專制的君主自始皇帝以迄於希特勒都是有着同樣的奮鬥的，祇有亞歷山大是例外的，但是他的父親已經爲他完成了工作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創造者，當他與魯威格談話之中，他那隻手空拳獨力支持的志願以及不欲放棄責任的苦心也流露於言表。

所有航空獨裁的當政人物都顯現着有同樣的去做太多的事情的趨向。他們表示了一切疲乏的勝利者的特質，不能自己遏抑、思索與應付。當他們得勝之時，他們繼續地統治與奮鬥。他們已

經把世界整理了，而仍然繼續地去整理。在他們第一次真正成功之後，他們絕不願意有新的血滲入負責統治的工作。他們的團體得到掌握政權，是因為方在需用這種人才，對於世界國家最初的創造人，他們的效力是不可少的，其後因為時勢的需要，他們便奪取政權，取而代之了。據韓修的意見，一個統治者的美德有三，那便是敏捷、嚴謹與堅忍。而倍德力·林特 (Paideick Lynd) 的格言乃是「懦弱是組織之母。」他們沒有天賦的懦弱。當第一次世界革命所遺留給他們的工作已經告罄，由於他們的無能去組織一個直接的承繼勢力，又不能發明新的工作，遂有最後一次革命的必要。

最後的革命，是人類歷史中最巧妙的一個權勢交替。最巧妙，而也是最後的一次。航空獨裁可以禁遏彰明的反抗；可以由無數的命令與法律取得服從。但牠不能禁遏普通心理的發展，不能禁止人們用研究與批評的方法來察知牠的立法與行政的活動。

普通心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neral Psychology) 的發展非常迅速，不久即成爲新式國家會友的科學研究會的最有力的活動制度。在牠的準備時期中，牠代替了舊制度中各種文

藝與美術的課程。牠是人道主義的現代化。世界國家的創業者給予科學研究會中這特別的一部以指導及修改之權，使牠日後居於教育與法律管理部之上。甚至在當時，也正式承認在新式國家組織的學說中牠是負責的指導者。牠不祇使特溫得的意旨實現。牠已經成爲全人類的思想，猶之乎世界議會的爲全世界的意志一樣。世界國家的教育與法律的處置，是在於一個不絕地進展的科學研究部的指導之下，牠們的性質自然與舊制度的教育迥不相同了。

讀者們如不能分別新舊教育兩者不同的地方，將永遠不能明白歷史的過程。舊的教育是爲保存傳統習慣與制度而設的。前進的勢力是離開了牠的組織而自己建樹工作的。在十八、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時，教育往往是比較當時的思想落後，而學校教師是人類進步的障礙。但是新的教育，以敏捷擴展的科學關係爲基礎的，便不復是保存傳統的，而是解釋一個創作勢力對於當世的事物作最深刻透切的批評的了。新的教師指示着門徑，而新的教育便不絕地前進，走在當世社會思想狀況的前面。新法律與舊法律的不同是絕對平行的。如果一個在一九〇〇年的人，聽見說一個前進的革命，是爲律師與教師之爲科學思想所鼓勵而領導着的，他一定認爲無稽之談，但

今日我們就要發出一個問題，就是：「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可以維持一個不絕地前進的革命呢？」

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的失敗以及不幸的落於希特勒的輕浮與殘暴的統治之下，完全原是因於不知革命的根本原則，這個革命的根本原則就是：沒有革命是真確的，除非牠完全把那個社會的教育制度改革了纔可。舊制度中，每一次有力量的革命，都是向成立的教育與法律作攻擊。

新式教育管理部對於保存、改革和振興人類事業的進步過程的職務，早已在世界議會中的人物更替方面表現出來，新的人才替代了巴士拉會議舊人物的地位，其後成爲航空獨裁。此時又輪到這一班人感覺得政府的工具，不能措施裕如，而聽命於新奇的思想的衝動了。他們已經廓清了地盤，而社會科學已經準備了新組織的思想，但現在他們感覺得當前有着一種完全與他們的統治習慣不和諧的，傾向創造與發展的衝動。他們的部下把命令退回了，而認爲是「不充足，且不能符合工人們的心理。」所有的計劃，都爲受命者所詆斥爲無謂的勞役而漠然置之。工人們自己處理着一切，而要求比較愉快的進展與比較美好的結果，委員會在開始時堅執着絕對的服從。於是乎教育管理部便發出一個很有魄力的辯論，表明「不須過問而絕對服從是社會的殘賊。」

舊式革命的危機與新式意志的衝突是世界上最相反的一件事情。舊的革命，盡其量是狂熱的、叫囂的、情感作用的，在牠的過程中，不少斷絕街道交通、毀害財產、草菅人命的事實，一個新的政府在劫燼之中草草地建立起來，推翻着牠前任者一切的設施與制度。這種的革命是不滿意的人們向成立的制度所作的反叛。但是這最後的革命是一個表明世界執行者的冷靜與有效的訴諸於世界教育制度的方法。牠不是反叛，牠是由側面入手的干涉。新的制度在前任者的旁邊興起，由牠的手中取過了政權，而代替牠去執行。

世界國家需要軍政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在完全勝利之下，已經把清教專制的訓練的唯一理由溶化以去。但最後明白這件事情的人，卻是那些年長的人，他們方在世界議會中尋思有何工作纔可以使人類的精神有所寄託，不去做壞事情哩！

六 美學的衰替——亞里斯登·西奧多哥俾魯斯的筆記

歷史家有一種習慣，便是利用那個時代的作家的語句來襯托他們的立論。因為歷史已經不

復爲古昔專載君主與政策的範圍所限制，牠們便漸漸地利用私人的傳記、日記、小說、戲劇、信件、圖書之類，爲材料之源。以前這些都認爲沒有歷史的資格的，現在我們看來比較國會與外交的備忘錄還有價值。關於航空獨裁統治下的流行的思想與情感最好的可用的材料，莫如那個天才的畫家亞里斯登·西奧多哥俾魯斯（Ariston Theocopulos 一九九七—二〇六二）的筆記簿。他在三十七年之間直到他死，每天都作筆記，對於時事作精刻的評論，描寫新異的事情，紀述他自己特別的情感的反映，而附以圖畫，夢境與諧畫種種，並加以註釋。這項事實本與讀史者無關。然而選擇牠那足供我們參考的材料，使我們對於第二次世界議會下的生活狀況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實是一個很好的法子。

在他開始的數卷中，顯露着有三件事情是很令他感覺不安的：那便是私人飛行的限制，替他的天才找出路的困難，及人生普遍的缺乏美感。在當時是沒有私人的飛機的，而且不是新式國家的會友並服從牠的法令與訓練的人，便不得爲飛機師。西奧多哥俾魯斯有着一個無政府主義的靈魂，他的欲向海闊天空自由飛翔，無拘無束任其心意所之的願望，使他對於週圍的環境，感覺窒

息不舒。「如果人們任我自己幹，我可以把一些東西貢獻給這個世界。」他這樣地寫。「祇憑了這些老裝飾師們這樣那樣的叫我去做，有甚麼好處呢？我是不是到這個世界來專是摹仿重述那些已經完成了的東西呢？」

在第二處他又寫着道：「有一個可惡的官用飛機師駕機凌空而過，去防止甚麼事情。這簡直把我弄糟了！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繼着便是一段流露內心痛苦的呼聲：「這個臺階的建築是錯誤的。叫我在這幅應該倒下來

的牆頭上畫這麼多的象，有甚麼好處呢？如果我畫得好，那幅牆便將立在那裏不動了。我愈畫得好，他們便愈要把牆留下來。但這是錯的！錯的！錯的！」

幾頁之後，祇有「象」的一個字，單獨的寫在那裏。

繼此便是把象畫成了無數的談諧畫。很明顯地他是對於象表示興趣的，但現在他已厭倦了。他把牠們畫成透明的，表露了牠們內部生活的可憐。還畫着一整頁的不可信地殘忍的象眼睛。

他正在從事於周密的裝飾一條正在建築中的路線，由菲尼斯特角 (Cape Finisterre) 經意

大利北部沿黑海北部的堤壩以迄於克拉米與高加索的這條路線本來由力究立亞 (Liguria) 北岸分出的，但在當時的設計是沿海而入於熱那亞，由此處穿山而過，到了平原，再進入那個仍然存在的齊奧開 (Chioggia)。這是一個不甚高明的世界道路制度，經過許多次的修改纔完成於今日的。這樣大規模的工作與堅固性的裝飾，正足以證明世界議會不知變動尙未終止。這些路，似乎是爲永久之計而計劃的。這證明了智力的不活動。

西奧多哥俾魯斯的工作，是限於由尼斯舊城至熱那亞舊港的一段海岸。牠是很平坦的曲線，有些地方成了直線，很粗暴地以廣闊的棧道橫穿過高原，海灣與海港。在斜坡的上下，以真或假的大理石作坪臺，種了各種的花果樹木。這些坪臺，一望無際地連接着上面的大道，祇有些長青木的林子間斷了牠。資本主義時代的別墅與花園的廢址，沿海各省的城鎮，都已廓清了。住居的屋宇，零星四佈，臺階的路，一直引到海邊的娛樂場所。這些屋宇都是仿了當時的時尚而建築，既低矮，又呆板，激起了西奧多哥俾魯斯的厭惡。他把牠們畫了無數的諧談畫，加註着很多詆毀的言詞。很奇怪，便是他如何地忠實的把牠們畫了出來，而又如何地不真誠的曲解牠。他把牠們畫成戰爭時代

離地甚低的房子，牠們的扁而闊的建築，的確是由那時傳下來的。

「我們仍舊夢想着空中的襲擊與空中的戰爭，」他說，而在第二段他把人們當是「那些壁壘以內的居民……如果我可以取得一架飛機與一顆炸彈，多麼好呢！或者把像我這樣聰明的人，用這種的工作羈縻住，不使參加航空，是別有用意的吧？」

他的工作，不幸得很，使他和這些扁闊的偉大建築非常地接近。因為他對於人物獸類的圖畫，畫得工細，所以在他少年的時候便已享盛名；他有一種超人的本領，可以觀察到物體的內部，並知道內部的活動；在他以前美術家所知道的唯一剖解學，便是筋絡的剖解；而他是受命去在一幅尖削的牆上畫着象的形體。我們必須明白，在當日人們的心目中，是把美術與機械的工作完全分開了。他們以為先把一件東西造成功了，然後再加以修飾。就我們看來，那些在航空獨裁下的工程師的完全缺乏美感觀念，似乎是不可置信的事情。如果他們造了些可怕的東西，便要把美術家找了來加以粉飾。所以西奧多哥俾魯斯的善於感觸的心靈便發生一種感想，為今人的思想作先河。「工程師應該是美術家，」他說，「無論如何，美術家應該做工程師，否則便不要做建築的工作。」

他所建築的圍牆至今仍舊留存着；他的裝飾保全了牠，使他的預言實踐了。完全是因爲他個人，纔保存着，用來做學生們的功課及爲他那無可匹敵的天才作一個碑誌。

有一天他又寫道：「休假一天，划到海面五哩的地方。離岸愈遠，便愈感覺一切的屋宇道路的配置不適宜。我有生以來沒有觀望過這樣醜陋的東西！這海岸真醜極了！道路是太闊太大。永遠也不會有很多的交通運輸。世界上的人口也並不增加，總而言之，路是這樣大，交通反比前不如了。一百十二米突的闊度啊！這正在來的交通之流，起於非尼斯特終於誰亦不知的地方，到底是甚麼呢？現在沒有一些影子。永遠也不會有的。細小的蜥蜴，在那光滑的大道上迷失了路，死在那裏，而且乾了。還有些蚯蚓，也爬出來，死在那兒。人們在雨後就可看見整千整萬的這些死的蚯蚓。許多里之間，沒有遮陰的林子。坪臺的距離不合度，支持坪臺的牆壁看起來非常地尖削。所有的直線和後面山丘的起伏完全不調諧。牠們就是這樣的生存。這些可咒詛的離地不高的矮房子！可惡透了！我們不是爲了要離開地面纔起房子的嗎？」

忽然他大書特書着一個很大的字「合度」

繼此，他便執着了筆沈思，把他的思想寫了下來。「人生的關鍵，不單祇是美，並不是罪惡，而是缺乏合度。痛苦嗎？痛苦是由感覺的不配合而生的。不忠誠嗎？殘忍嗎？一切都是衝動與自制力間的缺乏適宜的配合……。」

很足以令我們注意的事情，便是由他的筆記中，顯出他是試試看作些很多現在人人皆曉的思想。他對於合度與和諧的思想，上很勞心焦思。發明了所有的歷史都是紀錄了配合不適宜的事實。到了今日，自然，這是一種常談了。我們已經說過二十世紀中的經濟史與政治史，幾乎是生活原素的畸形發長，經濟物質的過分膨脹與不能進展的教育，法律與政治的設施同時並行。第一次對於這種不和諧的現象略為覺悟，便由那些計劃裏顯著出來。那些估計社會生活質量的樸陋的嘗試，要推俄國的五年計劃為先導。一九三〇年以後，世界上已充滿了計劃，而大多數是沒有力量與不完善的計劃。

由西奧多哥俾魯斯的筆記中，我們知道甚至在二十一世紀初期，人類的活動中，真正審慎的量的準備的觀念是多麼的不完全。即如在戰爭時期，作戰的心理佔據了人的思想，所以現在，政治

的聯合與統一，以及企業的過度專注於生產效能，已經走在理智的前面。這些筆記事實上說明牠們並不是一個科學化的社會心理學家的著作，而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寫的，雖然他具了特別的天才與表情的能力，也是一個平常人。牠們告訴我們，如何地普通的人受了時代的驅策，如何地普通的人心對於這新的複雜狀況發生懷疑，作為疑問，何以於廢除戰爭，恢復秩序，獲得一切，征服了恐怖，而使先烈最玄妙的希望實踐以後，仍舊去和平與幸福這樣地遠呢？

「生長的苦楚，」他陡然地這樣地寫：「這是老列寧的口頭禪啊！是不是缺乏合度為必不可免的呢？」

繼着他便寫了一陣關於愛的水平線的論文，對於吾人目前的目的，是沒有多大的關係的。但是那個「生長的苦楚」的思想，是一流的流露於字裏行間。陡然地便有數篇是草草地畫着很奇異的嬰兒、小貓、小狗的雛形，很多生長不合度的東西。「是否缺乏合度為任何的生長所不可避免的呢？大自然似乎是感覺得是這樣的，但是她卻善於隨機應變。她原是預備做腿的，但當牠做出來了翼時，她便說：「對啊！我意思是做這樣的。」但在繪圖的工作呢？在工程的工作呢？又將如何？」

他的思想又轉到製造模型，磨礪的耗費，以及把一個機器集攏來時所發生的問題。

「大自然用各種的內分泌來變更生長的不合度，」他沈思着說。「當一間房子已經設了屋架子與造了牆壁之時，吾人便將遣去泥水匠而轉僱塗壁匠與繪畫匠了。所以這是證明了世界政制的變遷。新的內分泌。新的美術家。」

這一段筆記是寫於二〇二七年四月七日的『政制的變遷』(Change of régime)。這個名詞，在當時尚是第一次應用哩。

西奧多哥俾魯斯對於愛情的肉體上與精神上的分析，他的把生理學的程序與最高情感的發展敏捷地連貫起來，雖在美學的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但和我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姑且從略。過了一二年的期間他靜處在巴司郎那的美術圖書館裏，專心注意於他的偉大的象形繪畫，不復再談政治。他喜歡那些和他同事的建築師；他贊美巴司郎那的發展，他可以自由地去做一切的工作。「這些人可以任意地工作，」他這樣地寫：「和那些可惡的委員會，禁止這樣，又要你思量那樣，彼此比較起來，真相差得遠了。」不久，他便受了一個由阿根廷 (Argentina) 地方來的富於創造力

的年輕女子的影響，她便是偉大的美術家珍妮坦·麥凱爾 (Janita Mackael)。筆記中畫着不少她的小照，描寫着她的舉動態度。他還加以註解說：「這個東西是有思想的。」他並沒有叫她的名字，他祇用一個「J」字替代她，以後這個字便屢見於他的篇幅之中。

「我對於一個真的智力豐富的女子真是有點駭怕。大約是德昆賽 (De Quincey)，他曾經夢見一個女子的胸部陡的變成了眼睛的吧？多麼可怕！如果你是給人家這樣地看法。」

繼此便是撕去了的一頁，我們祇可以猜想牠所載的是甚麼了。此後又忽然回復到政治的問題。很多在開始時便寫着是「J說的」或是在結局時加上「這是J的思想。」

隔了幾篇他又說：「此人是有思慮的。我呢？祇是用我的指頭說話對於我是太虛玄了。或者是真的，即如她所說，我是精神上的懶惰。精神上的懶惰——在不絕地和她談了三個鐘頭之後！」

「似乎我的一點明亮的思想，和這些社會心理學家的思想比較起來，竟算不了甚麼。我正好要多學一點。我想J可以做任何人的女教師。」

由筆記中可以隱約地看見珍妮坦·麥凱爾柔弱的丰姿，豐富的腦力，歷歷如生。她是那一種

的女人，在十九世紀時一定是做社會主義革命的，在初期蘇維埃便做委員的，在二十世紀中葉便做新式國家的竭力工作人員的。現在她便把她嗜好裝飾所耗費的時間，很自由地放在當時特別的政治研究上。無疑地她在未遇西奧多哥俾魯斯之前已經具有政治的思想。她感覺得世界是有一些錯誤的地方，但對於應該怎樣去做，那個清澈的認識，是直至她和他發生戀愛之後纔抓住的。那些筆記的坦白與大膽處，不祇描寫一個不平凡的戀愛故事，而且是每一個有價值的戀愛故事所不能分開的互相教育的情形。西奧多哥俾魯斯是她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愛人。起首的時候，他對她也是很不經意的，如對待他生命史裏其他的女人一樣，但其後很明顯地，當他對她有了真的認識之後，他對於她的忠誠愛慕，與日俱進，甚且超過她對於他的情感。

他研究她。他不絕地注意她。我們知道她是如何地影響他。至於他是如何地影響她，我們祇可以由想像中自己捉摸了。有一件事很明顯的，便是她一見之下，便深深地為他的偉大的天才，與無定見的稗性所感動。前者使她大大地震動。由她的遺作上可以看出來。早年的工作比較地優良。他曾經兩次這樣地問着說：「我是否使J覆沒了呢？她的思想失去了原來的風格。她借用了我的

眼睛。那幅諷刺畫。我是否應該負責呢？牠是這樣美麗的東西。」他又繼續地寫道：「在以前，這種母性的特化是「自然」向女人施的狡猾。如果她們不做母親，如果她們不能做母親，爲甚麼她們要沈浸在母性之中呢？何以我想給我一個自由的機會去做我自己所喜悅的事情，比較爲她自己的工作打算還要緊呢？她竟這樣做。我並沒有請求她。或者是我於不知不覺之中向她作過這樣的請求吧？！不這完全是她天生的母性愛。我是她的愛子與愛人，而這個世界便是我的兄弟，而每一天的正當工作漸漸退化，而爲了我們，她竟變得更加政治化與社會心理學化了。」

由這處起，筆記中關於政治的言論，其勢甚強。在最初數集中，表示一個孤獨有創造能力的人，感覺自己遺落在一個冷酷的世界裏，隻手空拳毫無勢力。其後的數集中便表現同是那個人，把眼光放大了，把整個世界視同雕塑的原料，爲了解與輔助的觀念所維持着，與人類的運動互相發生關連與協助。總之，這並不是西奧多哥俾魯斯所想，這是世界社會美感觀念的蘇醒。

「政制的變遷有如鷄雛的破卵而出。卵殼是必須破碎的。但必須有卵殼。讓我們公正一點吧。時間空間都得配合適宜的。如果把卵殼破碎得過早，除了做惡劣的溜黃蛋之外便沒有他用了。又

如果牠過了時仍不破碎，則鷄雛一定死在裏面而腐臭了。」

第四十七卷的筆記是完全專注於重行計劃他那初期所作的批評的問題，那便是關於力克立亞海岸的事情。這本筆記提議甚豐，很多的圖表竟與今日的現狀非常酷肖，即如處理摩納哥的平原與減少坪臺的計劃便是。但他對於橘樹林子的夢想，便顯得已經很奇怪，因為他絕對不知道那些試驗的植物學家如何地作準備的方法。第四十九卷的筆記也是專注於計劃的。在第一頁上面，他寫着『世界的計劃』及『貢獻』的幾個字。他似乎不時的拿這本書來做消遣品。書中有很多明敏的計劃，也有很多不可置信的幻想。有時，他亦像其他的先知一樣，不喜歡詳細縷述，而作諷刺的言論。

有一段很長的紀載是關於他和珍妮坦在莽的塞拉特 (Monserrat) 地方同居的時候，兩人對於個性問題的一段，很有現代精神的討論。這些紀載是談話之後的筆錄，使讀者執卷瀏覽之時，尚隱約可見六十年前這一雙情侶徘徊於斷溪殘澗、茂樹青草之間，很精警地互相對於這種思想作反應，這些創造最後革命的思想；她是很專心而善於批評，堅守著她自己辯論的壁壘來抵禦他

的橫衝直撞的問題，有如一個人在大風之中放紙鳶一樣。

「個人是爲人類而生存的；但是，人類也一樣是爲個人而生存。

「人爲國家而生存，爲的是欲依賴國家而生存，由於國家纔得生存。

「生命是一個鐘擺，搖曳於盡職與越分之間。反抗，服從，反抗，服從。

「秩序、訓練、衛生，祇是爲美術生活而使這個世界臻於安全鞏固。

「我們是斯多亞派 (Stoic)，但也可以爲伊壁鳩魯派 (Epicurean)。

「練習與訓練是生命的烹飪術而不是餐食。

「無時不須「合度。」但除了美術，還有甚麼可以決定合度的呢？

「生命的核心是堅強的意志力。」

這是二〇四六年間他們所作的思想。到底我們今日有沒有真的進步了一點呢？

西奧多哥俾魯斯和他的珍妮坦都同赴那個結束了第二次世界議會的麥幾夫會議。似乎他們倆人都是被邀請去裝飾這個臨時建築起來以供會議用途的臨時城市。那些筆記簿除了畫着很美麗的圖案與鋼質建築的圖型之外，還畫着會議中各個會員的速寫肖像以及大會中人羣的印象。西奧多哥俾魯斯以後還作了一幅圖像，此圖像已刻印於今日所有的歷史書中；那便是安多阿納·亞伊拉的雄偉的丰姿，站近一架飛機的旁邊，預備乘了飛往他所自擇的退隱地方——雪拉·尼華達去。他在向他辭職的光景作着迴顧的姿勢，面部表露着深沈不信任的表情。那個飛機師很耐心地在背後等候着他。『好罷，好罷，這樣便算了罷。』他似乎這樣地說。落日的光輝照耀着他的眼睛，所以牠們雖是直望着，也似乎看不見甚麼東西。

同樣地著名的，便是畫着九位世界議會的議員，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諦聽伊密爾·唐納杜 (Emil Donadien) 教育研究會 (Educational Faculty) 的祕書的言論的那幅畫。

這是最溫和的革命。似乎距離那些戰爭、防守、進攻、射擊、屠劫的老式革命變故相去有千年之久。議會並不被推翻而且榮膺贊揚。創造力證明牠自己是在正式的建設與保守的上面。十餘年來

各個管理部都顯得漸漸地脫離中央議會的管轄；牠們互相直接應付，毫無干涉地成立了大規模的協助，而且漸漸地爲那個主腦機關的障礙。最後是那隸屬於衛生與行爲管理部下的教育研究會作第一次的攻擊。是牠運用了自己的權威去廢除裸體運動主義的禁令，這是三十年前爲議會所設立的「行爲的普通規則」之一。這是一件微小的事情，但議會很注意牠，於是便決定了趁這時機來重振議會的權威。是否世界上仍有一個最高的政府存在呢？這便是那個年長的統治機關所提出的問題。很自然地他們自己認一個主腦的機關是必須的，而伊密爾·唐納杜的溫婉的打破這個成見表示，很明顯地向他們表露，人類的思想是前進的，已迥非昔日他們那以少年熱血來主宰的尚存軍國色彩的世界國家的時代了。

在昔日，集中領袖權的需要，是人們所視爲最要緊的事務的。都認攻擊及毀滅那些分散及耗費人類能力的忠君與信教制度是必須的事情。把一個有秩序的世界經濟制度去替代生產與分配個人利益的混亂制度，更是不可缺少的事情了。然而此種大變遷，已經過了牠的永久基礎已由根據世界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教育改造而確定，軍事的世界國家的工作已經告終了。世界議會的

工作也完成了。

「然則誰將統治這個世界呢？」伊力克·耿那生(Eric Gunnarsson)，那個最年青與最野心的議會會員，這樣地問。

「無須去統治世界了，」唐納杜說：「我們已經使戰爭成爲不可能，我們已經由那個使人互相爲敵的反社會的傳統制度中解放出來。我們已經把因貧困而人爲人役的習慣掃除。那衛生、教育與行爲的各研究會將維持人類的好品行。那食物、屋宇、運輸、衣著、供給、自動力、計劃、研究等管理部亦將各盡厥職爲人類服務。簡直沒有剩一點的事情給一個最高的政府去做。除了仰看着牠一手經營的世界，見得牠是好的，以及爲牠祝福而已。」

「對的，但是——」伊力克·耿那生這樣地說。

這些說話，都灌在辯論中的留聲機片內。而祇說了這兩句說話，那少年野心的伊力克·耿那生，或者他曾夢想着去做世界的大總統的，便由歷史上消失了。

唐納杜繼着便把人類的政治歷史很簡略地作了一個總論，說明何以初民祇知以「擬人」

(Personification) 爲思想的根據，以及不得不擁有一個部落的神祇和君主，原因便是，他不能看到除此之外，有組織協助的可能的。又說，何以君主的習於個人主義，與人相往還，祇陳守於狹義的部落與國家的界線之中，其後又如何地要爲議會、國會等所統治替代，到末了，這些也成了不必須的。這些統治的團體，千百年來把不和諧的人們緊緊地夾了起來，等到最後，有普遍的教育纔把人類永久地團結。

這個辯論的中心點是包含於麥幾夫的宣言中，牠終結了這次會議的議案。

「世界國家現在繼承了牠所屈服所消滅的國家了，那最高的主權政府，曾經征服與吸收所有的較少的主權國的，此時也由人類事業中消失以去了。人類久經苦戰，盲目鬭爭所欲致的和平鞏固，已獲成功，實在受着這個退休的議會的恩惠不少。牠是滿載了人類贊頌之語感激之心而退休的。現今在平靜與安寧之中，我們可以從事於考察那些不至於荒廢的財產，地球上的一切，我們尚未充分發展的能力，以及開展在我們面前的豐厚的生活。這是人類統一的太陽初上的時候。人類的犧牲，已經告終了。由地球的此極到彼極，沒有一個人是沒有自足、健康、興趣與自由的生活的。

自今以後，沒有奴隸；沒有貧窮；沒有因出生關係而屬於下賤的階級的；沒有被判決長久的監禁期的；沒有心身受苦之人而不爲科學的能力與能幹的監督人的服務所幫助的。世界是開展在我們面前，可以任我們在勢力與幻想所及的範圍內去做一切。爲物質生存而掙扎的事情，已經過去了。牠已經被獲到了。禁遏與訓練也成爲不必須了。爲信實而作的奮鬥，以及那不可描述的美的需要，此時方開始活動，不再爲其他低下的掙扎所障礙。每一個人都可以如意地生活。

「我們必須尊敬人類和互相尊崇，以我們有生以來所受的教育，此事不難達到。我們必須向貨幣的習用，公開的作證，公共的和平，衛生與操守表示忠心擁護：這是公民的普通天職，而人類社會藉此以爲維持的。我們必須貢獻我們的工作，滿足世界的所需。爲他人，然後我們自己可以生活。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件工作，沒有一樣享樂是不給予我們的，除了那些有損於人的享樂。你這英雄的議會啊！我們感謝你，無限的感謝你。」

第五集 新式國家統制下的生活

一 創造新世界的朝日

二〇五九年麥幾夫宣言終結了衰敗時期，新式國家初期亦作了一個結束。世界國家，有若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國聯一樣，朦朧興起，爲一個崇高的理想，爲一個渺茫的事迹；牠在崩潰與浩劫的數十年中得到無數的經驗與認識；一九六五年在巴士拉會議中牠正式侵入人類的政治範圍，顯得解決人類問題的唯一方法，現在，牠已經完全征服了人類了。

直至一九七八年第二次會議之後，纔作有秩序集中征服的工作。自那時起，世界議會開始做有些工作，甚至爲以前最大膽的社會學家所不敢想像的。他們很自足於沈潛的發展工作，認爲如果他們不十分爲人們所注意，這種工作，也會自己進行的。這些乃是深遠的精神上的改造的事業，

深刻地透入個人生活的底層而爲向所未有。第一步，先要把傳統的國家思想永遠廓除，而將種族的仇視變爲種族的諒解。這是一件應付萬難的積極工作。次之，世界語必須普遍化，而偉大的文學傑作，須作人人皆識的方言。這也不是輕易成功的事情。再次而且也是三個阻力中最困難的一個障礙，便是要反對那些似乎普及一般的宗教的與文化的制度，如基督教、猶太教、回教、佛教等等，直至二十世紀末葉爲了統治人類事業與個人生活仍舊和新式國家運動作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的文化存在一天，就可以爲一切反對勢力的大本營，使凡是破壞摧毀新世界制度的人們都趨之若鶩，視之如逃遁藪了。

怎樣的反對這些反對者，我們已經說過了，而且我們還說明，使人類的德智訓練與新式國家組織發生直接的與單純的關係，是何等的必要。二〇二〇年後，世界上除了新式國家的學校，不復再有其他的學校開設了。凡是把基督教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都受禁止，但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並不是加以廢除，而是逐漸的現代化了。到處教堂的捐款基金，隨着世界的不景氣而喪失；牠不能再有充分的有教育之人來維持教務；大多數的教堂都是日就荒蕪，無人過問，當世界重新建

築改造的時候，這些衰敗的教堂，也和其他的陳舊建築物一樣，如秋風掃落葉似的化爲烏有。

關於回教的故事，亦大同小異。牠的傾覆，比基督教更快，因爲牠的學校組織比較薄弱。牠是和阿剌伯語有很大關係的。這種方言的腐化，把牠的根基亦爲之撼搖，很像拉丁文的失去效用，瓦解了西方的基督教一樣。牠留下了幾十座美麗的禮拜堂，亦和基督教遺留了幾十座美麗的大小教堂無異。關於回教的稗官野史的記載甚爲豐富，而所述的美好生活，又是遠超於他們的真實生活的。

至於猶太教，相傳這個爲根深蒂固的宗教。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內，猶太人可以自爲一族，享用他們特有的飲食，實行他們特有的宗教儀式，與其週圍異國的人，不相濡染。他們已經成爲政治家的永久不能拔出的芒刺，在到處都爲團體結合的破壞者。在社會關係上，他們也盡操縱出入的能事。沒有人能說，是否猶太人是一個公民，或者，是否他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的。他們也行婚嫁，他們的營業是占優勢的。他們自有其行爲的標準。他們的奇特之處愈多，引起人們的反感也愈大。

很自然的我們會想，像猶太人這樣廣播於天下的民族，是應該有大同主義的思想，與成立互

相連貫的組織以爲許多世界事業作先河的，但是，他們的特別的孤立的的文化觀念太深，所以他們並不想作這麼一個嘗試。世界大戰之後，奉正教的猶太人對於新式國家的運動所做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因爲他們心目中存了一個夢想，叫做猶太民族主義（Zionism）的，便是夢想着他們自己在巴力斯坦（Palestine）建設一個獨立的國家，則巴力斯坦的地方，根據他們的巴比倫傳說是所有這些講塞姆族語言的人民（Semitic speaking peoples）的故鄉，祇有一個心理分析學家或者可以解明他們要這個猶太民族國家做甚麼？牠使他們的固持與大部分人羣分離，而獨立的傳統思想尖銳化，牠激起世界的厭惡，沈潛地與不可救治地去反抗牠。

在二十世紀初期中以以色列人的不受人們歡迎也最爲顯著。經濟的不景氣當然是貨幣的問題，貨幣和信用中一定有很大的錯誤存在。猶太人一向是以操縱金融著名的。然而在那個困難時代，卻沒有一個金融的權威是猶太人。當時抓住了各種複雜的金融上的改革與簡單化問題的領袖人物差不多都不是猶太人。普通不明真相的人，一定會發爲疑問說：『猶太人那裏去了呢？』很容易便把嫌疑與壓迫加到他們的身上去。難道他們可以毫無障礙地做投機生意嗎？很明顯地，那

些非猶太人的投機者會把嫌疑轉嫁到猶太人的身上，猶太人的獲得榮譽，獲得痛苦，都由於他們那種強項的「自異於人」的特質所致。

然而在一九四〇與二〇五九年之間，不及一世紀，而這個陳腐固執的文化居然消失了。牠和牠那猶太民族主義的國家，牠的特異的食品、法律以及一切的行頭，都完全與人類社會溶化了。猶太人並不遭受壓迫；沒有勦滅；雖然在大饑饉的五十年間，政治與社會的大崩潰時期，世界上屢有屠殺猶太人的事件發生，但在清教專制時代，便永無特別的迫害了；但是他們卻在三代之中便能够受到訓練，而脫離了頑冥的種族的爲我主義。他們的目光已被轉移去認清楚他們的種族的真相，而不復專注於摩西（Moses）的預言及上帝對亞伯拉罕（Abraham）的允諾，把以色列人作上帝的選民的牢不可破的觀念。世界上仍然充滿了無數的猶太人，但他們已不再屬於「以色列」人了。

這個成功——十九世紀的人一定會認牠爲神異的——顯明地是由於兩件事情。第一、新式國家的革命由開始便以教育爲先而以政治爲次；牠的深入人心，爲以前的革命所不能望其項背。

第二、牠遇到比較新的及善良的環境。在十九世紀時，家庭已不是經濟與文化的中心生活。猶太人的閉關自守嚴密關防的家庭生活，便是養成他們排斥異族的原因。二十世紀初葉，有許多猶太作者爲本族人所作的小說甚多，描寫嚴密的家庭教訓的漸歸弛懈與新舊兩代的思想的衝突情形甚爲詳晰。蓋自那時起，以色列人已開始瓦解了。

陶鑄下一代的心理的事業，不論是猶太人或異邦人，都已於無意中委諸外界的勢力，特別是委諸報紙與公共學校。自一九四〇年之後，代家庭教育的各項組織，規模愈加擴展起來。新式國家的運動自始便操縱着教師，根據了牠自己的方法來重整普通教育，並防止任何其他與牠相競爭的學校的復興。就使猶太人心裏是有這種慾望，他們在食物上，在身心上，也不能保守他們的特點了。

二〇五九年人類的完全臻於鞏固劃一，及消失各種不同的文化、種族、方言的團體中間的疑忌仇視之心，證明了法萊西 (Falaise)，特溫得的編輯之一——所謂『心理史觀』 (Ment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是有真理的。衰敗時期的確是克服頑固人們心理的抵抗，成就某種可

能的事業的一個奮鬥的時期，麥幾夫的宣言並不祇是證明了人類的勝利與自由，而且是表示牠的完成了的工作。

自從分立的夢想，種族的幻象，仇視的夢囈漸歸消滅之後，在那蘇醒的人類腦海內，看見一些甚麼呢？是一個細小的光明的地球，在牠外面的物質，並不是花草禽獸，而是一個寶藏未啓的地球；其在腦海之內的便是無限的智力的成就。以前人類所做的工作，好像一個小孩子，眼睛與手指向不能合作的時候所作的塗鴉一樣。也像一隻未開眼睛的小貓的搔爬蠕動。但現在，人類的眼光是已經開展了。

這個地球上仍然是未曾盡量發展而滿目荒蕪的；牠的表面上，到處仍遺留着互爭雄長的瘡痕的痕跡。到了二〇五九年，世界到處，仍然表示着延長戰爭，與建設統一權威的戒嚴狀態。即使主權國家時代的大多數的割據與邊壘都歸消失，即使不復有城堡壁壘與險要之地的可追尋，而還有許多事情表明着這個世界是尚在管轄之下，尚不能完全的放任自治。那仔細計劃的飛機場制度以防止二〇四〇年來私人飛行的自由發展，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其他如在無關緊要的大路

上作軍事佈置，而不容許反叛者的經過，亦是一個證明。由空中或由地圖上看來，很顯明地見得這個世界是仍然被統治的。道路的制度，很像一個拋在猛獸身上的網罟。

同樣地顯明的，便是最近在社會與經濟範圍上的征服能力。如同西奧多哥俾魯斯的責備第二次世界議會說是把事做得太過了，甚至對於地球上的水源都發生懷疑。牠的水塔與河流都有一種「威逼的空氣」。即使零碎不整的田畝、畸形而不相稱的農場、不整潔的鑛場、垃圾堆、工廠、工人、貧民窟等，一切屬於競爭的資本制度下的現狀都消失了，但在二十一世紀的動作中，仍然不免剝削的色彩。二十世紀中葉時代森林的遭受焚伐，使世界感受木材的缺乏，現在便不得不竭力地重植森林。世界議會說：「生長罷，不要再做些沒有意思的事情了。」到了衰敗時期的末葉，風景中，不見有一株不入行列，與不整齊的樹木。

到處仍然顯露着不服從與潛伏的恫嚇的情景。人類已經苦力地掙扎過而且得勝了，但也祇是到了此時，他纔有工夫想到一些地球上的僅僅乎最急切與表面上的可能的事情。

四十七年前由麥幾夫會議退出的代表，由空中所見的景象，與我們今日的世界花園相比擬，

是迥不相同的。那些粗笨的想像力，那些對於美術的恐怖，曾經驅策世界議會走入窮途的，使風景之中，平添無數的人工的龐然大物。據西奧多哥俾魯斯所說，那些橋梁與大道很像龐大的犀牛，很不悅目。雖然那些空中戰爭時代的平矮建築，現在已不流行，但是普通的房屋，都有建築得過於堅固與太大的趨向；有時牠們顯得有相當的宏偉，但多數是外表具着軍事時代的粗重樣子，很令人一見便觸目注意。總之，一切的建築物，都還離開靈巧與美術遠得很。

現在遍世界都有豐富的植物，而在當時，不過祇有幾處試驗的區域，在很多地方，森林與耕地，並不見得比一百五十年前繁茂。雖然新的直行方正的森林彌補了戰爭時代的砍伐焚燬，但種植事業並不甚盛；以前是森林的，此時仍舊成爲森林，以前是草原的，此時仍是草原，和舊日的草原所不同的地方，只是沒有那些雜草野花而已。縱然那時森林部自認工作爲滿意，仍有很多爲疾病所侵害的樹木。許多的樹木，照我們看來，都不能欣欣向榮的。在今日的青年人的目光看來，由圖畫中所表現的先人的世界，祇是一個滿目荒蕪，百廢待舉的世界，牠的耕種事業，顯得非常勞苦而又貧乏。

然而把這個和二百年前的風景圖畫相比較，便顯得繁盛與整齊一點。十九世紀的人們，對於城市與鄉野的風景所表示的自由的反響，是很動人的。他們想不到後人會把擺在他們面前的風景認為毫不足道的。像我們一樣，他們可以享受朝雲暮霞之美，西蘇格蘭海岸的自然風景，亦一如今日。他們會不憚長途的跋涉去登臨積雪的高峯，游賞幽勝的地方。他們喜悅由遠處賞鑒流水與森林，並遠眺市廛櫛比的景象。他們沈醉於美麗的花圃芳園之中。他們欣賞之情，由文藝與圖畫之中流露出來。吾人必須費了一點力，纔知道他們所選擇欣賞的景物有多少，是那些一望無際的平坦大道，與龐大粗笨的建築物，是多麼的黯淡無聊啊！

就我們現在所能改造的來看，十九世紀的景物的確是顯得索然無味的，很容易會淪為慘淡的寒酸樣子。美國北方遭受霜災，南方呈現污穢，到處頹敝不堪。幸而當時身體不健全，生命不永年的人們沒有比較的標準，所以對於週圍的惡劣環境和缺乏美性的景物，很少表示不滿之心。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中，很少看見有說這大部分的自然世界是寒酸，不滿意和絕對缺乏同情的。作者與詩人都不敢承認有這樣的事實，因為他們既沒有改善事物的希望，亦沒有改善事物的能力。他們

不能服從心理學的定律來作觀察。

但在第二次世界議會統治之下，評判所及，不祇人們的建設，即連自然的缺乏也受指謫，因為兩者都不是不可移易的事情。赴會歸來的代表，所感覺恐怖的，不祇是那些粗重的工程，呆笨的屋宇以及過分廣闊的道路。很多土地尚未妥為佈置。他們看見底下還有野澤荒田，不毛的石地，缺乏雨量的地方與削巖峻壁。不特他們，我們也以爲這是一個工作尚未完成的世界啊！

「現在我們可以由這裏開始了，」他們說：「現在我們真的要開始工作了。」

二 啓發地球的鎖鑰

我們早知道其他的生命所藉以生長的海陸上的植物，並不能與潮潤及日光的量一同滋生。早在十九世紀的初三十年間，英國一位實用植物學家腓特烈基布爾 (Frederick Keble 1870-1975，其理論見 *Collective Works, in the Science Section of the Reprints*) 已經指出很多植物的生長，即使其餘的環境皆好，而氮氣的溶化供給倘過於延遲，就不能依據了生長階

段而繁茂。他把農業肥料的知識應用到整個生命的各方面來，而堅持着我們是生存於一個「缺乏氮氣的世界裏。」氮氣是由無機物界所產出以供一切的生命所需要的，而且產生是極不容易的。基布爾氏的觀察使研究自然科學者得到一線曙光。其他的學者便把這個學說應用到其他的物質上面。加魯斯·梅頓（Carlos Meloin，一九二七—二〇一四）寫了一段很令人注目的文章，把地球上人類的生命比擬於「一個在不毛之地的饑餓的小馬，牠永遠不會去尋找豐美的草原的。」

陸地上物質的根本缺乏，可以由地質學的記載中追本溯源。生活力是有限制的東西。有幾個時期，牠是非常地繁榮的，即如開採煤礦的時期，生活力似乎是向上升的；但大多數的時期，人類祇守在一个蘊藏着無限的天然鑛產的地球之上，而找不着啓發富源的鎖鑰。沒有個人的知識可以深入這豐富的寶藏。直至集合的科學知識興起，勇敢地由一個門類而應用至於其他的門類，使人類與畜類有獲得較豐足的植物蔬菜的可能；現在人類把精力消耗於戰爭與不合作的貿易謀利上的情事，已經終結了此等可能性可以企圖其實現了。現在千萬的腦子都思維如何地使人類得

到豐富的生活，這種現象，是前些時所夢想不到的。

第二次世界議會在統治之初，殊昧於實用生物學的潛勢力是可以預期這種根本的豐富生活的。牠祇知把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機器發明的邏輯的結果研究出來。最大的結果，便是縮短路程與用機器以替代人力。這個議會的目的，在建立人類永久的統一，設立進步的公衆的活動，藉此可使在不絕地增進的工業繁營之中，有普遍的僱用與普遍的購買力。在開始的時候，牠便專注於壓迫的活動，以保存這個世界去反抗任何私人的壟斷，浪漫的國家主義，宗教的麻醉，與社會的分裂等反動勢力的復活。其後，牠得到無敵的勝利之後，整個世界社會都臻於鞏固，議會便感覺得有很多由安閒而發生的大問題，須待解決的了。

似乎過剩的人類能力的自然出路，就是於其他事業之外，來大量地發展科學的研究以及更深地啓發地球內的天然富藏。世界議會把三分之一的富藏，可以供科學的研究的劃爲生物學的工作，似乎這些世界的統治者，方全神會注於禁遏反動，掃除分裂的學說，重新建立經濟生活，而沒有覺到生物學研究的發展其結果並不祇限於滅除畜類植物的疾病，及種植上的改良與經濟。在

他們的腦海中，絕對不能幻想生物學的發明，能够把十九與二十世紀曾經使人類生命革命過一次的機器發明的光彩，奪了過來。生物學的知識超過了他們的時代，有如美的觀感力的超過他們一樣。

自二十一世紀的三十年以來，第二次世界議會的保守性質阻礙很多科學發明的見於實用。世界已經統一了，牠是在扶助牠的人口（人口的數目，此時維持得很好，不超過二〇〇〇兆的安全標準線）；牠的衛生狀況的佳良又爲亙古所未有；而且在牠的勢力範圍內，都是按時就班的。這種情形便很像一個達了青春發育期的青年仍舊給人當作小孩般待遇一樣。甚至新的豐盛的植物的可能性也不讓牠實現。供給食物的土地是應該在二〇五〇年前便劃分了的，但是這個議會，斷定以爲如果把人口分播恐怕有妨於社會的秩序，所以牠把四五百萬人留着去從事於健康而不甚有趣的農業生產，而在另一方面卻要調查對於過剩的食料有何種工業上的應用。牠在二〇五〇年間仍舊採行了二〇二〇年的標準去生產及分配大宗的出產。牠限制教育的發展與建築的革新。牠已經使世界的人類獲得安全，牠想世界就維持到這個現狀爲止。

在二〇四七年荷馬·李·巴布斯(Homer Lee Pabst)刊行了他的一本關於毒瓦斯的毒質的研究，是源於永遠死亡氣中所發見的絕種呼吸氣的成分而作的研究。這些毒瓦斯現在名爲巴布斯氣，而且有很多的種類。牠們可以使生命發生一種變化，在以前祇可以由宇宙的光線照射的不同而生稍異的。到了二〇五〇年生物學的世界裏，便發現了十幾種絕對新異的植物，以及有兩種新的富於破壞的鼠類。人工的演進新的生物，已經爲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人類的幻想中便開展着無限的可能性。世界議會爲之震懼。牠眼看着這個苦心經營，纔臻鞏固的世界快要爲不可制止的植物與獸類等怪異所佔據了。毒草與奇獸乃使牠感覺不安。牠認爲，甚至人類，也要受到威脅的。法律對於用獸類作試驗之事大加取締，凡巴布斯所創造的新異的獸類都立即報告加以毀滅。奇異的植物，而有陳設及經濟的價值的，便聽其自然不加干涉。但在他自己的實習試驗的範圍的地方，巴布斯便漠視此等取締的命令，而科學研究會又增加了新試驗的原始生物學。此時最高的議會不復能予以干涉，於是那運輸與普遍分配管理部，以及新成立的行爲管理部並衛生服務處都取了巴布斯研究的結果，而在二〇六〇年召集一個會議以供牠們正

式研究。一個關於演進地球上的生物的普通的計劃，已經籌備完成，這個計劃，經過各種的修改，至今仍在應用。

很多屬於我們祖先時代的野獸，現在已在牠們特定的關閉地方監守之下。那裏有十五所超過五百方哩面積的大公園，其中各種的草木禽獸，異常繁盛，不受人類的干涉，除了有時有些徒步而來的有資格的參觀者，或者一架特別執照的飛機由上面飛過而外，可以說是純然禽獸的境界了。普通游覽的人是一概不接納的。在這些地方的生物，其所受人類的影響，比較牠們的祖先爲少。他們是貯備在那裏供試驗用的。據杜摩力(Dumoric)的報告，最顯著的試驗結果，便是用細心的蒙養以及改良種類，居然把已經絕種的淡黃色的鹿的種子恢復了。

第二次世界議會專注於身心俱閒的人的職業問題，其有利的結果，鑛物學與氣象學大有進步。牠並不認識有系統的觀察風雨，是有顛倒這個有秩序的世界的可能。真的，世界議會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制止風的吹向某一方。所以對於火山與地震都認爲有操縱管轄的能力。在二〇〇〇年前，人類的知識對於通常所謂地殼及在此地殼之下的天然富藏，是非常地模糊的。地質學家的

知識，幾乎完全是由地球表面偶然的爆裂，與工業的採掘中得來。但是不息地增加的可供研究天產，使人們可更進一步作有系統的檢討。在當時的地質學的課本中，學者可以讀到許多美妙的發明物，如山西的鑽孔器，赫爾（Hull）與窩特琴茲（Watkins）的指地針，與奴吉齊的鑿石器等，開掘地層至於二十五哩之深。此外，他還可以讀到關於地層下的岩石的描寫。在一百多年前這些是沒有人幻想到的。舊世界的方法，不是用那儲於地下的能力，把地面上所需要的東西驅逐出來的，其寥寥無幾的鑛產，是用人力或機器由上面拖起，而所有的油、煤、鹽等物，都是由汗流浹背、工資微薄的人羣出了無限的氣力換得來的。

一自第二次世界議會注意到天文學，牠的進展，也同樣地急速。實際的天文學是一個很新近的發明。自一六四八年以來，雖然有一些關於風雨計的工作，其實是開始於十九世紀，而且是直到一八五〇年纔作有系統研究的嘗試。試驗空氣的混合質的工作是起於二十世紀初期。彼時人們已經由其中取出氮氣，但這祇足以供肥料的用量的方面，如此稀少對於空氣的混合，殊無任何有價值的影響。到了世界大戰之時，便更作進一步的研究，因為應用永遠死亡氣，必賴空氣把毒氣換

散傳送，研究當地的空氣，混合是極有關係的。其後在二十一世紀的三十年間，也曾利用大批的毒瓦斯去剷除蝗蟲、鼠類與各種蟲害。在當時對於此事會有相當的熱烈表示，後來因為有一兩件不幸的意外危險發生，使議會的熱度又為冰消。人們明白了空氣的混合，除了刺激與清潔之用以外，必須等到能够先把風力管轄到了，纔可以有效。於是乎世界議會對於混合空氣的知識也和其他的科學貢獻一樣，認為時間未到，而暫且擱在一邊。

重新計劃世界的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感覺牠自身有着三個向牠的冒險精神挑戰的有連帶關係的團體。一個包括數千物種的新植物區系等候着由試驗場中解放出來，這還是實驗生物學所從事的動植物變異的無限制的可能性中最顯著的部分。其次便是無窮盡的天然富藏已經準備由地層中出來以補地球上面的行將告罄的富源。其三就是改換空氣的混合與轉動，並不是人力所不可及的事情了。個人的財產與地方的政府的障礙，也早經廓除。照這個表面看來，第二次世界議會的勝利，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牠為人類與世界所做工夫的那種精力已經為一個空前的動機作準備，因牠現在已經急激地改變着，不單是表面上，而是生活的要素了。

那個聯合委員會開始用很安閒的精神與態度去工作。「目前的生活很不錯，」在牠的計劃草案中的緒言內這樣地說：「但這是生活上根本的好處，纔有各種不同的新異之物以供我們所需。我們必須永久關懷於事物的合度適宜與否。在發展新事物中而缺乏合度，便是過去五百年人類感受痛苦與衰敗的普通原因。我們現在有各種管理部的組織，可以防止那些沒有計劃或平衡的曾經使二十世紀初期遭受浩劫的謀利企業，我們於行事之先，可以審度觀察大勢所趨。這是不能不歸功於最高議會，牠取締新發明的立即試用，尤其是最近的生物學發明，苟不加以防範，就恐發生極大的不適宜的禍害，而比較摧毀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禍害更爲過無不及。」

「我們認爲有必須繼續予以取締的，就是以急激進步的生理科學施諸於人類或高等哺乳動物的事情。我們相信目前普遍的人類心理必定反對此種試驗。在第二次世界議會統治之下，對於無痛苦的殺戮生物，以及剷除不健全及殘廢的生物，都認爲合法，使不宜於遺傳的種類絕育，亦經公認爲可以。我們想，就人道主義而論，人類應該指導其種族的遺傳方法，直到我們的行爲知識臻於豐富爲止。一二代之間，我們對於人類的現狀就可以滿意，人類不至再受人煙稠密、缺乏滋養、

傳染癘疫、身心的毒害等等摧殘荼毒。人類的腦力中尚有豐富的未經發展成熟的能力，而此等正是我們樂於用美術的工作，科學的研究，自由愉快的生活，來為後人造福的機會。普通健全的人類生活是可以清理、伸展及使其豐富的。我們必須對於自己的環境表示滿足。甚至在這個地球上，我們的環境，非到千百萬年之後不會有根本的變遷。

「我們直接由人道而移轉注意於別種生物，是很明顯地，有一個很引人注目的境界開展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可以有茂盛的森林，新奇的植物；我們可以把往時滿佈野草青苔的草原，換上了一個柔草如茵的豐美草地。空前未有的花果，都將出現於世。有利於人類的昆蟲也將更使牠增加裨益。所有的禽獸，在改變生理之下，漸漸地將與人類為友。等到我們手足靈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干涉而使生命臻於平衡化。現在不會再有很多的顧慮了，因為人類已經很明敏了。」

「我們為後世所作的計劃並不會把所有的人道主義根本變更。牠祇為人類啓發各種的生活，無論如何的黑暗、紛紜與無效，都是向這個目標走的。目前隨意管轄天氣之事尚為吾人力之不能勝，在現在，精密的氣候統制（Weather Control）雖尚為我們力所不及，但是，我們相信，一

個準確的，可以測定一兩年氣候變化的氣候表已是成爲可能。大規模的事業將着手改變泥土植物花果，把所有的鑛產、深坑、路網與深海交通，重爲佈置。沒有一件是醜惡與厭憎的，牠可以成爲非常引人興趣的事情。向來著名的粗笨的工程建築，此時乃輕盈如豹。向來把世界染污的工業企業，此時整齊如愛潔之貓。第二次世界議會所作的計劃，顯然是爲一個固定不變的社會而設的，我們的新式工作將要把牠們廓除大半。無疑地，我們的工作亦將讓給更勇敢與更可愛的大事業去做了。

這便是二〇六〇年啓鑰的計劃的緒言。今日我們大多數仍舊沈浸於牠的實現之中。牠已經不須勞役而給予人們以職業，沒有困倦，而使人享受安閒。當我們完成自己工作的餘暇，便會四面去看旁人的工作如何。整個世界都是充滿了興味和歡愉，由有着海狗、猴子、虎類與及鱷魚的亞馬孫(Amazons)的森林花園，以至於喜馬拉雅的雪地，那個世界的遊戲場，沒有一樣不使人感覺興趣的。我們可以 and 天文學測量者輪流着在天空之中俯視萬物，也可以在大西洋深海之中鼓動肺部恣意呼吸。而且還可以看見在水中頭行螺的出而覓食與明珠的逐漸生長。

我們今日已習慣於週圍輕盈美麗與千變萬化的事物，倘非披覽七十年前的圖畫紀載，尚不知在最初的數十年中，人類的統一是顯得多麼的平淡無奇哩！在開始，人類方面由屠殺、癘疫、經濟的耗費與普遍的衰落中逃遁出來，原氣未復，深恐回復到舊的紛亂、衝突與經濟的吃人主義（Economic Cannibalism）裏去，而祇希望得到秩序與和平。可是他卻鼓起了勇氣，不獨把這個世界啓發起來，而且把我們自己啓發起來了。

三 地理的計劃

在那些『緩辦的計劃』中，那處於我們現時的活動的後方，其重要只比那誘導人事變化的計劃稍次一點的，便是那些想更改地球形勢的複雜計劃了。這又是一件太偉大危險而為我們目前的知識所不及的事情，但又似乎是人類必須去作一度嘗試的事情。

在現在及將來的許多年代，人們仍舊是為地理所限制的；海洋與大山脈便把我們的生活支配定了。牠們決定了居民，再決定了那一種的人類是適宜於居住於某一個地方。各色各種的人類，

不論是粗黑的或白淨的，矮胖的或瘦長的，都有他們自己的特定的最好地方以供他們培養子女，工作及休息的。人們可以游行這個世界，但祇有一個地方，是可以稱爲他的家鄉。沒有一種人，可以到處爲家的。沒有一個是宇宙人。一種宇宙的人，祇在一個方的地球上與劃一的世界裏，或者可以找尋得着。人類的個別的性質是必須的，現在也沒有人想去減少牠。

但是新式的地理學家們提出的問題便是，是否可以把居民的種類分爲最需要的、需要的、不需要的與有害的幾種？又是否可以把地球的表面作相當的更改，與目前的重整森林的工作同時並行，以重新支配雨量，更改地面的河流，阻止風吹的方向等等方法，而增加需要的居民？譬如把亞平寧（Apennines）提高一點，便可以把牠們提到永遠的雪點，而把整個意大利半島的特質都變遷了。需要的居民增加，因此便使需要的諸色人等，亦趨於增加了。

昨天把這項的事情叫做幻想，今天便顯得是不實際與不必須了，原因便是火山的勢力是可以發放出來的。所以目前，地形學家，和人種學家一樣，必須滿意於他自己的夢——一些關於使一個吐出火焰，時時震撼的地球來應付人類的較大需要的夢。至於想把世界重新創造過，恐怕是幾

千年以後的事情。時間還長着哩！

四 行爲管理部的變革

過去的四十八年間，對於社會統制個人行爲的事情已經有了很大的更改。整個世界內都增進了這種的科學與教師們的技能與品質，但在此之外，教育與警察的性質及宗旨有很大的變動。據我們今日所知的，教育是始於二十世紀中葉時代。牠和前代的薄弱的關係，有如基督教國家的教育，與偶像時代的教育有一絲的關係一樣。讀、寫、算三門是一起來施教的，但除此之外，目標便完全不同了。現代化的教育自從特溫得的宣傳以後，便爲新式國家作宣傳的工作。牠志在建設一種新的思想與精神，使個人把他的能力與活動專向一個決定的目標走，去獲取與維持一個進步的世界社會主義，並憑藉一個通行的貨幣制度來做牠的相互關係的通常媒介物。

這個似乎是一個很偉大的工作。牠遭遇了通常人性上固執的抵抗。但是，如果人類的文明是要繼續生存，這便是絕對的必需。否則便要重複趨於混亂的野蠻，獸性的暴戾以及最後的滅亡了。

思想與行爲的典型是用在這個目標上的，對於其他任何目標，比較上還不甚重要。新式國家，便是人類的整個天職所在。這種的宣傳工作，便轉而爲公共服務的訓練與普遍的公共教育。新式國家會友是一個訓練的團體，受命把牠的訓練方法去施行於全世界的。牠自標爲新的人道主義。牠不採妥協的辦法。牠使整個的教育制度軍事化。在半個世紀之內，便不容許任何其他的教育制度與學校的存立。人類從來也沒有受過這樣的指導和訓練。

第一次世界議會與航空獨裁的教育家是很嚴厲禁遏所謂「不正當的動機的。」節制飲食，勤勞苦幹，嫉視安閒，絕端不信任美術與感官的滿足，尤以性的刺激爲最，這些便是那班重整世界的人的教育思想的大綱了。在十九世紀初步前進的革命思想裏，對於個人的品行已經放恣了一點。曾經有反對「基督教的道德」的舉動，而且有鼓勵人們去打破禁遏命令的趨向。大多數的行爲的自由觀念，到了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間，已經消失。新式國家的運動，在發展中，是很不贊成官能與感情的衝動和滿足的事務。待理者甚繁，這些事情耗費時間，耗費能力。牠引起很多的陰謀。牠玩物喪志，使人失去忠誠之心。甚至基督教在軍事的時代，也沒有對於消耗能力這樣地懸爲厲禁。

的。新的性的清潔主義，其異於昔時的，厥爲牠的公開容許節制生育，不注重於正式的結婚，以及對於青春期的過分衝動，予以相當仁恕，但牠卻堅持着要公共的貞潔，性關係的嚴重，鞏固的結合，與情侶間的絕對忠誠。結果，二〇〇〇年以後，世界便更多一夫一妻制，與風行嚴潔的情操，爲往昔所不及見的了。

今日很多批評家，多以爲那時的禁遏是太過。要知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不同，軍政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們認爲在那訓練的時期中，在那些事物的冷靜的表面之下，有很多祕密與曖昧的事，情滋生着，而第二次議會的日漸頑固，不近人情，實爲這種冷酷的清教主義的直接結果。他們譏諷那時的人們爲淫暴者與色情狂。但這並不是一律的觀念。同樣有名譽的人卻加以否認，以爲在這個建設時期的整齊健全的活動力之下，是沒有這種遏抑而不得伸的慾念，祕密恣情以求滿足的。在心理學問題中，我們對於性的衝動與約制的量的估計，所報告的已不再如此的正確了。

考究的人們，細心地研究文學、傳記、日記、圖畫、警察的報告等等，以追根溯源於前代的心理過程。由這些事情，似乎找得很多相同的事實。拿目前狀況與七十年前比較，相異的地方，有如一八五

五年英國的社會生活與一九二五年不同。在這兩個時期中，都是由絕端嚴肅的禁遏而趨於過分的自由解放的。我們可以探討每一時期的景象，關於這些紀載都非常地豐富。但我們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跡，是說那些的較早時期，人類是感受絕端的腦力疲乏與遭遇不幸的。祇是缺乏顯明的刺激性的生活是非常地按部就班，平淡無奇。牠並沒有影響到政治與營業。牠祇像一隻馴服的野獸，並不十分顯著的，由戲劇與小說中流露出來。在任何必需的時候就能越出範圍。持與一九二〇年的英國狀況相較，便差不多甚麼都不脫性的色彩。牠盡力地鼓吹刺激青年人的心理。自從經濟與政治的問題劇增，社會組織的不健全日漸明顯，人們感覺社會情狀的不滿而又感覺改造上的不容易，乃以性的安慰來代替奮鬥上精神的痛苦。人們就是這樣大聲疾呼，以提倡個人生活的熱烈與反常應付環境的方法。聰明的青年人，便真的作藥物的嗜好與同性的戀愛的宣傳。最能感動觀衆的文學，也將閨房之事，大書特書。誨淫的圖畫，淫暴的刺激，狎褻的言詞，無所不備。這些都是今日的讀者的研究資料。研究這些材料的讀者對於牠們一定會覺得並不見得有何震駭厭惡、刺激興趣之處，祇見得此等描寫是非常地可笑而又愚蠢得可憐罷了。

很自然地，那些散佈滿天下的正在努力從事於社會改革的，新式國家工作人員，對於這種侵佔青年身心的美術與性慾的勢力，發生一種強烈的仇視，因為這些，無形之中斷喪了很多健全有為的青年。新式國家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是採取不干涉的清教主義，其後經過第一次世界議會的廓除浪漫風氣以後，便成爲壓迫的清教主義了。

一百二十年後，教育管理部專向二十世紀初期道德的混亂作抨擊以證明牠干涉私人道德與禁遏刺激是理所當然的。牠不能認清楚新的環境是多麼的不相同。性的煩惱、性的溫柔與性的粗暴，都是衰敗時期衰替的自然結果。人們到處都遇到惡劣的環境，苦於掙扎，不論貧富，都感覺沒有目的，無所事事，與充滿了危險性。不健全的體格漸增。煙酒性慾便成爲刺激、安慰與麻木，他們飽經痛苦的腦筋之唯一工具。美好的少年，沒有地方去賣腦力與氣力的，便走入人肉市場。在每一個聚積不義之財與濫用威權的中心，賣淫制度與寄生人物都滋生潛長。在這個醜惡、憂愁與危險的世界裏，還有甚麼可做的呢？但是二〇四〇年的世界，卻變爲一個忙碌、有趣與健全的世界了。

在這個概括的歷史溫習中，我們不能把各種禁遏的逐步過程，詳細地敘述。現在我們可以直

捷痛快的，憑一己所欲，戀愛、飲食、享樂與我們的工作相輔而行，只須對於血氣未定者，施以正當的顧慮而已。這樣行事，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害處發生。當清教的專制開始時代，統治者感覺得他們是把一隻猛虎禁圍起來，不然牠便會破壞了他們苦心經營的豐裕與安全的世界。所以在弛禁的過程中，真是非常地不願意，而且逐步地經過紛辯纒達到的。但是並不見有洪水猛獸的出現。充分營養的人們不想放縱食慾，精神有所寄託的人，不致爲色慾所顛倒。我們所看見的，並不是甚麼猛虎，而是一隻溫馴可愛的小貓，到處不爲人所注目的。

人道是在轉變着。猥褻的文學、越軌的事物、與性的刺激等恐怖，都不存在了。但是讀上半個世紀的小說戲劇的人，把牠們和舊制度時代的文學相比較，便要感覺着，有較多的個人戀愛，幸福的情侶爲以前的所不及的；而由肉體的愛以表示忠誠，顯出偏愛，增進情感與維持友誼者，也是向來沒有這樣直接而美麗的。我們也有嫉忌之心，但不至於變爲陰險；我們也有慾望，但很少趨於淫亂。在這些事情和其他的事情都表明進步便是簡單化的現象。我們讀史所見到的二百年前的人物，都給我們一個很不良的印象，覺得他們都是些奇怪而困惱的、苦痛的及齷齪的人。在他們的慾望

中，攙雜了仇恨；物質的徵逐成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污點；他們的男女結合是不忠實的，不誠懇的。

雖然一方面把軍政時代嚴肅的性道德禁制解放了，而在另一方面是不容稍懈的。新的制度不能容許那個把我們統制在一起的貨幣財產制度有一毫的忽略的地方。不但我們的警察敏捷的處置盜匪與拐騙和舊世界所知者一樣，並且對於有些在一九二〇年認為很正當的所許可的謀利方法，也被禁制，而且永被禁制。即如那個使人耗費血汗之資的欲望與計策、賭博、是視同假造支票一樣，嚴受處分的；而所有成爲十九世紀社會制度中的組織的投機活動，此時也都絕跡不敢重現了。貨幣是爲個人使用或者作禮物之用的。斷不能誤用牠去做不利於他人的事情。對於這個，我們仍在束縛之中。這種事情是食人的惡俗。除此以外，自由是逐日的增進了。

人類的身心既受到健全的教育，財產貨幣又受到有力而安全的保障，以克制不忠誠的動機，我們感覺每一個人都應該享受行動與行爲的自由，而爲上世紀初年統治這個世界的軍事社會主義者所不能置信的。然而也是獲了他們嚴厲的清廓人類生活之力，所以我們今日纔能安享自由。現在我們可以任意來往，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的事情。不能不說這是受了前人之賜啊！

五 豐富物質的組織

歷史的教師漸漸地感覺非常困難去使每一個新時代，明白一個愁苦不舒，行爲不潔的世界，及一個充滿了不信任與不鞏固的氣氛之中的人類感情與動機是怎麼樣的；所以他便要盡其思索的能力去追懷幻想在一個百物缺乏的時代，人類所留的一絲焦慮、恥辱與憂愁的淡影。除了少數的人，其餘的人類，直到二十世紀末葉，都是感覺物質的缺乏的。甚至富人也要費盡了心思，纔可以獲得物欲的滿足。現在我們簡單化的經濟制度，這樣地平坦裕如，使我們對於日常的需要，不復介懷。無論去到何處，不愁衣、食、住的不能解決。因爲一切太容易了，使我們昧然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廓清與轉折，纔獲得今日的享受的過程。

物質豐富的結果，其中使前人所不及料的，厥爲廢除障礙物。在以前是物質稀少，求過於供，一有所獲，即須盡力保持。人們因爲物質的不充，便不得不極力搜藏。一個家庭並不單是休息親愛的地方，而且是一個貯藏室。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甚至重門封鎖，關防嚴密，以防盜賊的劫掠。得來

既是困難，保守便更形着力。當時富裕的人，都爲錢累，困守其財，如處牢獄，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財物，都造成不可毀壞的性質，設使不幸而毀壞，將不可復置了。每一個人都急急於把東西貯藏起來，而不去利用牠，祇留備不時之需。如果那個富人想轉變一下城市生活，他便須在鄉下建一所房子。在這種的房子裏，又有一種小經濟制度。所有的食物，不單是家中自備，而且都是由私人的田地出產的。又須嚴爲管理監視，以防耗費、惰怠與作弊。有錢人家的衣著都好好地貯藏在衣櫥裏；他的家內，到處都嚴爲設備，防患於未然，以免盜賊的劫掠。總之，在那個時代，不論貧富，都是感覺物質的不充裕的。如果一個富人出外旅行，他便要自備車馬攜帶扈從，而且帶了很大的行李，沈重到不堪。

十九世紀末葉比較豐裕的時代，已經開始把情形稍變，而把財產的千斤重擔減輕了一點。那暫著效用的有限的貨幣與信用的大同制度，資產階級的增加，股份公司的掌理財產，交通轉運的增加利便，一切都使富裕之人得到解放，不須終日坐在家裏作守財奴了。當時有一種普遍的新的努力——雖然現在覺得很不合理——去保有財產，而又不爲財產所累的趨向。成功的目的，並不復是財產的屬有權，而是購買力了。房屋器具等等，都可以交相轉購。以求適用。

人們不須居住在完整的大廈而限定在家內吃飯了，他們可以住在較小的房子而在集體的飯堂或飯館裏進食。他們不必在鄉村裏建築房子，可以自由地去各處旅行，使旅館或租賃別墅的營業，大為發達。他們的行裝也較昔時為輕便得多了。一自零碎的貿易組織成爲大規模的商業，私家貯藏雜物的風氣，亦大為轉移。人們如有所需，便可以自由購買。二十世紀初期的大商店，真是各種各式的貨物都齊備的。

在沙士比亞的時代，新的衣服、傢具、屋宇以及各種新的東西都是罕見之物；但在二十世紀初葉，所有的新現狀，已經有點和今日的現狀相彷彿。廢物利用仍舊不甚發展，到處仍有擁擠稠密的情形，但是有購買能力的人們的改建，便大大地發展了。如果不是因爲愚昧，個人主義，貨幣的起落不常，國家主義的狹窄，而至於社會崩潰，文明破產，那末，世界的分配組織，似宜由一九二五年盛行於美國的聯合公司的規模而一直發展到今日的制度了。同樣地，旅館營業的發達，以及鄉村別墅的租賃已經爲今日流行的辦法的預兆。

自從二十世紀中葉的禍亂與更新的交替時代，運輸聯盟(Transport Union)是由豐富初

期 (Trust Age of Abundance) 的大規模的商業上重建起來的。我們已經詳述那個聯盟是如何地成爲商業的獨裁，最後成爲空海管理部，爲這復興的世界的真正政府。牠那發行與收入能力紙幣的會計所，便成爲新銀行制度；牠的商業議會 (Trading Council) 便成爲新的零售所；牠的供給管理部最後也把世界的生產活動取了過來。由開始的時候這種新的勢力是充滿着活動的思想。牠們不像物質缺乏時代那樣地竭力貯藏的习惯。牠們因爲地球上不絕地增加的出產，而使每一個人都得到豐衣足食。

以前大規模的分配商店，爲後來復興時期新的分配組織創造一個模式。無論在那裏不是舊的城市施以重建，便是新的生產中樞產生，空海管理部的建築師，便建築大的屋宇，先是仿了舊式造得非常地輪奐宏偉，後來便更優美的計劃起來。在開始的時候，這些商店是照了舊式的方法作賣買的，其後慢慢地，對於很多項的貨品，卽如衣著之類的東西，組織新式的交換制度，以新易舊，新的衣服，依了顧客們的需要而製造，而把舊的取來搗爛牠，或爲他種廢物利用的處分。現在沒有一件東西是工作拙劣的，沒有一件東西是補綴的或修理過的。漸漸的這種方法把舊式的洗衣作制

度完全廢除。那些成爲舊世界鄉村風景的點綴品的破爛衣服，隨風飄揚的景象，已絕跡於地面。新的迅速的量度及調整衣服的方法，代替了舊日的卷尺、剪刀及縫紉工具。在經濟恐慌時期，人們往往幾年中都穿着幾件襯衣，每星期洗熨更調，至於破敝不堪；外衣的款式又非常地複雜，週身都是鈕扣條紋，一件外衣也要穿很多年，所以要用黑暗顏色的質地，與碎裂的花樣以遮掩其醜。中世紀時代的衣著，更不整潔。現在我們輕便簡捷的衣服是給予人們很大的便利的；一件外衣可以穿一個星期，一件襯衣可以穿三天，我們不須用衣櫥去保存牠，公司便是我們的衣櫥。如果天氣變更了，到處的公司都預備着適宜於當時氣候的衣着。除非是長途的旅行，不須多備更換的衣服。今日我們的衣服所以比較前人爲簡便，一半是因爲健康較好，一半是因爲我們不喜歡把可愛的軀體隱藏起來，而最大的原因，便是前人把他們包裹着，預防各項的意外的事發生。他們不在屋內的時候，便戴帽子，鞋內還要穿襪，袖口有鈕扣，項上又戴着領結硬領。這種的景象，似乎是在普遍的缺乏時期，裝束整齊是代表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盛裝的人，便表示他是富有。在十九世紀時候，富裕的人多帶金錶鏈，而在很熱的天氣，也拿着手套，以表明他自己的富裕與闊綽。

在空海管理部之下，房屋的制度也大有變更。像世界大戰之後，遍於英國的那些小的而永久居住的房子，此時已不重建。新世界統治的首要工作，便是衛生清潔問題。傳染病到處滋生；四十餘年的社會崩潰情形已經使每一間房屋成爲疾病的牢籠而摧殘生於其中的幼年人。於是房屋管理部（The Housing Control）在腐敗的舊城中重建房屋，以整潔方便爲主體，但在我們今日的目光看來，卻嫌牠們太過粗笨了。這種房子都是十一二層高的，而且建築得非常地堅實。到處都具備了水管、電燈，而且較冷的氣候，還有熱氣，一切的衛生設備均全。以前可以入畫的鄉村茅舍，也爲這種集中的大座房子所替代了，款式材料是因氣候的不同而異。好些村落，可說滿眼望去都成爲這種重重疊疊的屋宇了。甚至有些地方，小的私人的種植仍在進行，而這種重重疊疊的房子，已經有了，並且農夫們是乘了自行車去到他們的產業所在。每一集房子之中，都有託兒所、學校、商店及公衆會堂。

當我們回看那些分立的房子，設備不完的茅房草舍，忽然有了這樣的轉變，似乎是一瞬間的事情，但實際上是由一九九〇年到二〇三〇年間幾十年的工作，纔把這種屋宇制度的新觀念傳

播於世界，而在當時，那些比較進步一點的地方，這種的集中的大座房子的款式，已不盛行，而換了比較美麗與利便的新的建築物了。

歷史圖畫示我們以整個的過程。我們可以看見二十世紀初期繁榮的現象；如塔一般高的公寓和旅館，巍然轟峙，其高度遠在教堂、回教禮拜堂及浮屠之上，由無數密集的陋巷之中，屹然高聳。然不久漸歸衰替。圖畫中滿現殘址荒坵。其中隱約可見甲蟲殼般的防空屋宇、救護所及防空壁壘。一頁頁的圖畫，顯露着更多的殘跡，我們並可看見人類的生活，爲大瘟疫所摧殘。

陡然的便湧現了堅固雄偉的大房子。一個新的世紀開始了。城市擴大而繁盛起來。一堆一堆的房子旁邊，設有大規模的商店，公衆的俱樂部與旅館，在飛機場的附近的公園與花園裏，對於每一種工業，都感覺便利，公衆的俱樂部，自二〇〇〇年後，在建築與社會交際方面，都興盛起來。這也是兩個舊思想的復現；是英、美俱樂部的思想的合併與羅馬人民的浴場的思想所交織而成的。這裏由開始的時候便把體育與遊戲場、跳舞場、會議室、常設的新聞電影院、圖書館、讀報室、畫室、社會的中心等等屬於復蘇的社會生活的，都聚集在一個地方。

二十一世紀重新發現了一個十九世紀的經驗，和一個基督教紀元最初的世紀的經驗，這種經驗，亞力山大大帝也曾經發現過，就是，在新的地方建築新式的建築，較在舊的活動中心樞加以改建尤為容易。舊的地方愈是繁榮的，重建的工作也愈感困難，因為須把重要的活動由舊的地方移植到新的中心樞來，非常地費力。紐約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直至最近紐約的下半部是世界上最老式的城池，古色古香，自有其特具的風格。最陳舊的摩天樓，皇宮式的房子，甚至到了二一〇六年尚未完全趨於崩塌。

這不但不是因為紐約不能跟着時代跑，而且，恰恰相反，是因為牠是新運動的先鋒。我們在上面已經讀過尼古生的紀載說及一九六〇年牠的復興的重要。一二年之後，牠便成為空海管理部美國支部的大本營，一個西方的巴士拉。新政府的急激增進的活動，是需要急為準備的屋宇，所以紐約下部的殘留的房屋，便在倉忙之中稍加修整以備應用了。這樣過了些時，繼着便有計劃重建該城的相對立的團體，發生長期不息的紛辯。不但所謂世界愈窮，所受財產的障礙愈多的道理是真的，而且所謂一個地方成了很重要的前進工作的機關所在，便愈難於使牠現代化，也不無理由。

自二十一世紀中葉以來，世界上又重復出現了私人的房屋，在鄉村中，在海濱，在山明水秀之鄉。但是牠們的式樣是新式的，並不是昔時的草舍村屋了。

便是在世界大崩潰之前，革新人物，如亨利·福特等的心目中，已經有了一種可以遷移的房子，在利便的工業中心區建築完竣之後，而移去任何適合的地方的那種幻想。鄉村學校與別墅，便是一種幻想的出路了。大多數的男女，各有其最喜悅的地方，牠的特別位置，牠的風景，牠的森林野景，不論在山在海，各有其特別的嗜好的。在那裏，他們可以安居、幻想、工作與感覺愉快。在以前即使有這種夢想的人，他們的夢想也罕能實現。祇有少數豪富的人，能夠買地造屋，獨出心裁開闢園圃。等到他們老死窮乏的時候，其他沒有餘暇去自建房屋的人，便轉購過來。後來者也是有他們自己的嗜好的，但是屋中、園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前人的手澤，爲了他們自己嗜好上的不同起見，便祇有大加修改，以求別開生面了。

但是，自從物質豐富機械文明增進之後，新道路制度使大地上交通便利，電力、水力的供給，遍於各處，所以不但容易把斷瓦頹垣的殘址廓除，而且使大多數人民可以用廉價買進很安舒的鄉

村房子。在今日征服自然的能力，已經由無限的生產與敏捷地掃除障礙上很明顯地看出來。人們可以在未有人居的地方費幾個星期的工夫去計劃佈置。一個月之間，他的房子便預備好了；二三日之後，便樹了基礎了，三四個星期之後，他的夢想便實現了。房子已經如他的所欲而建築完成了，與電力相連接，有水量的供給，微笑着站在那裏歡迎他。這簡直要和購買一架飛機或一輛汽車那樣便利了。

在初期中，改建房屋的工作，進行並不如是迅速，然而在起初，牠的速度就比較往時的建築大規模的連雲大廈，快得多了。

把一間房子拆除，也是同樣地簡便。現在我們不須去承讓他人棄置的房屋，有如我們不欲穿着死人遺留下來的衣服一樣。廓除一切，便是這個現代化時代的特質。衰敗的時期，是一個不能把債務、主權國家、愛國心、舊的階級、國界、建築物與夙仇舊恨等等廓清的時期。直到上一世紀人們纔知道甚麼是豐富的真諦，比較重要的，並不是多方收羅物件，而是把多餘的物件放棄。我們今日是普遍地富庶，而不是個人的富庶了。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十七世紀時代富人們旅行的事情了，當時祇有富裕的貴族階級纔可以自由地旅行，我們也知道他們的行裝是多麼的笨重。把他們來和今日一個平常的人想去作一次世界旅行的相比較，便可見得很大的區別。現在的人可以於出行的前夕，和一間旅行社接洽一下，便穿了他身上的衣服出行。祇帶了一個錢袋，一張執照，或者一本筆記本子。他可以戴着他自己所喜歡的裝飾品，他可以攜帶一些自己所愛讀的書籍。其餘他一切的所需，都可以沿途購置。他不需要甚麼屬有品，因為隨處都是屬有品。我們已經解決了二十世紀初期人們所不能解決的財產社會化問題了。我們可以獲得物質的消費，而無須牠歸爲己有。

六 普通人年齡與智慧的增長

兩世紀以來，人類的數目與品質經過很大的變遷。這些事情是常有變化的；每一種動物植物的數目品質都繼續地發生不同之點，然而直到最近，這些情事纔有詳細的記載與系統的研究。二十世紀初期的反進步人物堅持着『人類的天性』是永遠不改的；這等於幻想石器時代的人思

想感覺，一如在石洞中野餐的銀行事務員；孔子與佛家的思想很容易與盧梭、馬克思及特溫得的思想互易。他們不祇是不學無術，而且對於人類過去與目前的真實事跡的認識觀念完全錯誤。祇有到了二十一世紀，對於人類生態上原始作動力的認識，纔顯現於世界大事的討論與實行之中。

在一九〇〇年時，世界上全人口不及九〇〇兆，平均年齡約為二十二歲。在一九〇〇年，人口增加一倍，平均年齡增高了差不多十歲。在一九三五年，人口的最高額已達二〇〇〇兆，而平均年齡幾乎到了四十歲。在一百年間，互相交通的便利，與物體的反應，其增長不可數計。但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家、教育家與律師們，照這本歷史所表露的，是絕對不知道自從他們的計劃探行實施之後，是有這麼多不同之點發生的。他們因循不知考察，調整上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已經把起於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大屠殺及結果成爲一九五七年前的大瘟疫的一大段事實說明了。在三十年間，世界上的人口，低降約一〇〇〇兆，而平均年齡也降爲二十三歲。這不單是數目上一個大減退，而且是知識上的一個大減退。

後來空海管理部與第一、第二兩次的世界議會當政，便恢復衛生狀況與實施科學計劃。一百

年間，人口的增加是嚴密地督察着，與限制着，但是平均的年齡已經伸長到六十二歲，而且仍在增進中。整個人口的數目，在二〇六〇年間已逐漸增加到一五〇〇兆，而在二〇八五年間又回復到二〇〇〇兆了。雖然人口這樣大，卻並非不受管束的，以目前的科學教育與行為管理部的偉大工作，即使再有增加也不致於爲患。

現在世界的人口已達二五〇〇兆，如果地球上啓發了所有的富藏及盡量地增進幸福，那末，在很快的時間便要達到四〇〇〇兆的數目了。所有以前因人口過剩而發生的危險，使人們精神上與物體上感覺窒息擁擠的，現在漸漸地減少了。當代當局者的意見以爲四〇〇〇兆爲最適宜的數目，並以爲不須數十年之後，便可以使人們很活動地與愉快地活到九十歲。但是，到底是否可能使人們的壽命於過了古稀之年以後再活上三四十年，仍是一個未決的問題。人的腦力或者是有限止的，對於新事物感覺興趣的能力或者也會窮盡的。或者將來百歲或百歲以上的人，死起來是很自然的，會毫無痛苦的，在一天愉快的日子過去以後，便爾高枕長眠，離開了這個世界。

生理上數目的變更，包含人生日常生活性質的很大的不同。不但無個人現在都相信他自己

可以活到很老，而且在他生活的環境之下，生出各種與昔不同的反應制度。在中世紀以前的人，都把他們的先人認為比較年長與能幹的人，但是我們對於前人，卻認他們是比較年青與孱弱的。初代的人們，有如居於淺水之魚，不久池涸，而入於枯魚之肆，現在的人，卻是像居於水量充足，水草豐富，空氣流通，環境適宜的大湖裏。前者不絕地在困乏不安，環境播弄中掙扎着生存，很早便死去。雖然他們的天賦品質都與現在的人相同，但是他們的行為舉止便像屬於另一種人類。

且把莎士比亞時代的年青人說一下吧。如果他夭折，便很快衰老。到了四十歲，他便會昏昧，頑舊而自大。各種各式的痛苦疾病，等在那裏去襲擊他，促其衰敗。青春狀態，是不能耐久的。女子的美麗活潑，更是曇花一現轉瞬幻滅。所以他們都及時行樂，抓住了愛情和冒險。世界便充滿了十幾歲青春之火最盛的羅米歐 (Romeo) 與朱麗亞 (Juliet)，而在這樣年齡的今日青年，方在大學內研究學問的時候，離這齣人生的戲劇，還要二十年哩！當時的文學，證明了時代變遷的迅速。簡單的戀愛故事，嫉忌報復，都是戲劇、小說與詩歌的好材料。此外還有謀財劫掠的舉動，都是人生戲劇的一幕。一生的成敗利鈍，是由很短的時日中造成，簡直沒有挽救的機會。以利莎白時代的文學，遺留

給我們很多有趣的生活寫真，使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愉快生活的範圍期間，是多麼的狹小短促！

由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〇年間，生物學的轉變是可以由美術與書籍中很忠誠地反映出來。小說，在開始時是充滿了生之喜樂的，又像小動物似的欣然地接受一切的笑罵譏諷的，便轉而為沈思、分析與有目的的了。生活不再是終止於初期的衝動的了。小說的數目與其他的書籍相比，也漸零落了。個人的直覺中，為社會與經濟的偉大過程所深入，也漸漸地明顯了。當二十世紀末葉文學的復興時，所產生的，是一種成熟的文學，表露出在一個有計劃的世界裏的成年男女們的思想。在小說中所流露的戀愛故事，也多偏重於個人的情愛及人格的交感，而很少描寫初愛的小說。漸漸減少，已不多見。

現在一方面是減除青年的燥急暴動，自私不愼的弊端，繼續地施行，另一方面是審慎、鎮定與見聞廣博的生活大量地開展。由三十歲到七十歲的時期，在以前是認作中年暮境，此時乃認為一生的最重要時代，正是工作、表示與完全自省的時代，以上的三十年，不過是人生的楔子而已。有一個時期，過了四十歲的男女往往感覺自己是殘餘的人物，是挨日子的；整個世界裏都是充滿了朝

氣蓬勃、見聞淺狹、喜動喜鬪的年青人，年長一點的人，是很遲鈍地生活着，雖然他們的見識是比較廣博一點。但是現在大多數的人，年齡雖較長，而身體和思想都是仍舊很健全的，這並不是青春時期的獨有物了。那個「青年的待遇」以老效小的時期，在世界大戰與經濟崩潰之後已經終結。自那時後，便發生了一種青年與知識成熟人們之間的大衝突；起初還是於不知不覺中掙扎，後來竟公開而明白表示出來。

世界大戰後兩代的荒年中，不幸地淪為青年所把持的世界。年長的人不能防止崩潰，新時代中合法的先進者，不是死亡，也是精神破碎，道德淪胥，所以把如暴風驟雨似的解放青年的事實，認為有詩意的正義。意大利為輕舉妄動的青年褐衫黨所磨難；俄羅斯為好高務遠的少年共產黨所把持；愛爾蘭為童心熱血的愛國者所毀壞；而德意志，十年忍辱之後轉而為狂妄幼稚的國社黨所操縱。印度的愛國觀念也是不成熟的。英國殺戮無數的革命青年大違我們仁恕之道。到處都是少不更事之人，把持了殺人的利器，自以為是，盡情馳驟，昧於所事的結果何若。破壞是青年的特性，但是建設在他們的經驗中還是沒有。寬大為懷與中年審慎，在他們的觀念中是毫無效力的。似乎世

界上已無復公理的存在，而一般的青年，蒙面具，駕汽車，黑夜搜捕，殘刑毒打，不論在體力上、道德上，都引起紛亂與恐怖，幾乎摧毀了整個文明的過程。

把這些在交替混亂時代握大權的青年的組織者，如何地臻於成熟的過程，細加檢討，是很有興趣的事情。關於法西斯蒂的書籍，在一九二〇年的，在一九三〇年的，在一九四〇年的，並共產主義的書籍同在這些期間的，是非常地豐富，而且可以自己比較。經過了他們的浮燥情感，階級忠誠，反動意氣之後，我們可以看見這些青年的運動悄悄地回復到有計劃、有訓練與科學化的方法裏去。千百萬的青年，在開始的時候是加入法西斯蒂、國社黨、共產黨與其他的黨派的，或是盲目的褊狹的國家主義者，不合理性的參加者，到了中年的時候，都成爲新式國家的人民。他們最後成爲實現以前他們乘了一時熱血所搜捕、虐待與殺害的人們的計劃與思想的良好工具。

但是現在的青年已經就範了，當我們說到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是和十九世紀的人完全不同的。在體格方面，他是比較地健康與適宜，完全沒有疾病；在智力方面，他是明澈清晰，所受教育的高深，亦是爲前人所夢想不及。他並不是三十歲以下的人，而是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因爲他們

脫離了狹隘的家庭觀念的心理，所以他是比較地少羣居的本性，但是，在他的理想中，他是社會化與不自私的。實際上，雖然他同是受着相同的遺傳，但他是迥然有別的一個人了。拿來與前人相比，他是比較地體魄雄壯，頭腦清楚，勇於自制；對於他人的關係，亦較爲顯明。

這種情形，到處可見，尤其是在孟加拉與中國中部地方，更爲昭著。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見那些精明、憂鬱、擁擠、退化、營養不足、粗受教育、發育不全、生命短促的人們所遺留下來的子孫，與當世最美麗、最長壽與最能幹的人類一並生存着。這種的改變並不是變換人種；而是一百多年忠心實施衛生、教育與經濟組織的結果。這些人民在混亂時期曾爲癘疫所殘賊，在清教育專制的時代又受嚴酷的訓練。現在，他們是久經鍛鍊的精英，在文學上與科學上，和其他的種族一樣，作了很多的貢獻。

七 方言與智力的生長

「我把這一段純粹依照雷汾博士所寫的錄了下來。讀者們一定會說這是二十世紀的通常

英語。設使這是二十世紀的課本，很明顯地，牠不會採用我們的體裁詞句的。牠堅持着要把方言文雅化與擴展化，似乎已經達到了這一步似的，但由字裏行間，吾人卻尋不到這種的痕跡。是必爲雷汾將夢中所得，譯成現在的文字無疑。設使他真的夢見了這麼一部書，他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心靈誦讀的。在那部真的書內，一定沒有我們的字跡、詞句與成語的存在。」

二十一世紀顯著的成就之一，就是敏捷地把基本英語播爲世界語，並把英語大加更改傳遍於世界各地的工作。我們今日所作的英語與莎士比亞、愛迪生、班讓（Bunyan）、蕭伯納的英語迥然不同。牠是脫胎於像虛擬語氣（Subjunctive Mood）一類的古代的精細結構，牠已把綴字簡單化；使讀音標準化；並採用了許多外國的成語，融化了數千外國的單字。不過創設此種語言的人，還沒有周密的想到把牠造成世界語言。牠具有自然的優點，和牠並立的西班牙語、法國語、俄國語、德國語、意國語，都不能及牠。牠是比較地簡易，有伸縮力，而且已經廣播地流傳着的，但是牠的能在這麼多的競爭的方言中獲得優勝，那便不能不歸功於基本英語了。

基本英語是一位英國學者奧克登（O.K. Ogden，一八八九—一九九〇）所發明，他費了很

多年的勤奮工夫去把英文簡單化。很有趣的，便是他和詹姆士·佐愛司（James Joyce 1882—1955）是同一時代的，此人也是專心從事於一種新的英語的研究。但是當奧克登尋釋科學化的簡單方法的時候，佐愛司卻很美術化地去做鋪張揚厲的工夫，最後竟產生了一種紊亂的散文體裁，讀者讀起來，有如瘋人的夢囈，不知其意何指。然而他畢竟也加增了二十五個字，至今仍應用。奧克登在反的方面，努力苦心研究，混合了八百五十個字與及幾條結構的方法，使任何的外國人都可以把普通的意思簡單地與清晰地表示出來。這樣祇須幾個星期的工夫，一個有知識的外國人，便可以用很簡易明白的英文作交談與通訊之用了。總括地說起來，就是把原來說英語的人去限制着他專用那些選擇的字句，比較去教一個外國人完全懂得基本英語，還要感覺困難些。這件工作，是有賴於一個方言教授，魯道夫·波利（Rudolph Boyle 1910—1959）他尋出了一種方法，使說英語的人民，在必須的時候祇限於應用基本英語。

第一次巴士拉議會之後，這種的便利，風行一時。牠已經為空海管理部採用為整個世界內正式通訊的媒介。到了二〇二〇年，簡直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能使用及明白牠了。

我們今日的文字，是以基本英語的表聲作新的起點，首將原來文字的動詞與成語逐漸繼續，然後把外國的名詞與語句相溶化。今人的方言是包括二百萬字，一種彙集的文字，其中混合了世界上各種方言的字句成語。中國人王其君在他最近的文章中，表明仍然有特殊的字句。近來意國籍的二十名作家的字眼，很顯明地表示有喜於採用拉丁文的字句的趨向，拿來和二十名東亞的作者相比，他們的基本，是採用中、美兩國文字。但是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明白，同處在一個不劃分的文化之域。

今日與明日的新式英文，一點都不繁複，關於同意語及通常所列爲「罕用」或「作廢」的辭語，都漸漸加以整理，而且重定義使有作比較更好的解釋。字典組做着批評與研究的工作，而對於適用的字亦准許增加。若把今日的文學書籍與十八十九世紀的文學相比較，我們一定會感覺得今日的表情是很細緻與確切的。十八、十九世紀的文學，我們雖尚能明白牠，但就牠的簡陋方面看來，似乎回復到初期英語與哥特式的文字了。

詞學愈豐富，思想愈精巧。無疑地，以二十世紀人們的腦力與今日普通的人比較，雖然天賦是

一樣的，卻是一個雕琢較少，運用不大靈敏的腦子。牠爲不良的習慣所包圍，爲紛亂不健全的接觸所障礙，爲游移不決的心理所延宕，牠簡直像一架很好的機器，棄置在那裏，爲塵垢所污，失其功效了。現代的腦子，是整理有序，比較地清潔，與油潤的。牠不特裝載豐富一點，而且對於今日的文字運用很爲流利。今日的普通人也會見得二百年前的哲學家、思想家其言論是紆迴曲折，過於冗長而且詞不盡意，他們所發見的還不是意義晦奧，而且，當他們把這些糾纏駁雜的文字中的意義尋繹出來，他們覺得已經把整個的文章全部的意義思考一過了。

一個很有興趣的由十九世紀時便開始工作的研究團體，現在仍然繼續進行。這個團體的領袖是一位女性名爲威爾拜夫人 (Lady Welby, 一八三七—一九一二) 的，她是爲許多和她同時的人所公認爲一個莫名其妙的厭物的。她很努力地和她志同道合的人們通訊，不絕地主張把文字使比較表情確切一點，並認應該有一種『表明的科學』 (Science of Signifies)。奧克登和一個馬德蘭大學 (Magdalene College) 的學友黎卓 (I. A. Richards) 一八九三—一九七七) 是把此事認爲有嚴重性質的。他們兩人著了一本書解釋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Meaning)，

在一九二三年，這是首推為最初改良文字的工具了。基本英語是這種研究的附屬產物。這種新的科學，是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的，在混亂的時期中，曾經消聲匿跡。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纔重新出現。其後便是卡爾·拉丹 (Carl Ratau)，成為一班工作人員的中堅人物，他們是為一種思想所鼓勵着，想去把英文弄成比較明顯，包羅萬有，與普遍化的文字。他的工作現在擴展為大規模的組織，那便是今日我們所稱的文字改良局 (Language Bureau)。這個文字改良局的工作可以與一百五十年前貨幣專家的使貨幣劃一的工作相比擬。所以我們已漸漸地明白知識的進化所以不能充分地進展，是因為文字的互相連合太過寬泛鬆懈的緣故，正和好幾百年的人類文化，受了不完整的貨幣制度的阻礙而不能充分地進步一樣。

現在有一部方在編彙中的，將成為哲學與知識的歷史的偉大著作，便是文字革除的工作。這個計劃是文字改良局的字典組 (Dictionary Section) 所發起的，只是記載着所有原意已經變更的廢語；但是如果要將這種更改的原因追求探討，吾人便須仔細地研究人類思想的最初步驟。譬如靈魂、精神、物體、勢力、要素等字，自始便是由亞利安人與猶太人的思想發源出來的；直至最近

經過袁尚 (Yuan Shan) 的苦心研究，由這些名詞裏，顯出中國人與非洲土人的思想作用是不相等的。文字的逐譯，除了敘述實質的情事以外，常不免鬆懈粗淺。但是把東亞文學中或非洲人的表情中所含有的思想，與今日重要方言中的思想，彼此互譯，其粗陋顯得更甚。這種互相抵觸的地方，就考驗所得，亦可於我們的哲學（包括普通科學）名詞及專門名詞上產生很大的革新。我們今日所寫與所說的方言是一種暫時性的。在我們三代以後的子孫，便不會習用我們今日的名詞與表情，猶之乎我們不會起用前人所乘的火車與汽船及所用的電訊一樣。

現在方把人類腦子內的接觸機能重複整理，所得來的，便是把人類腦力的功用大為擴展，雖然目前尚不知優生學的發展是如何的，牠會抓住了很多為我們目前所捉摸不住的事情。初民的不會繪畫穿針，與牛無異，可是等到他的手指靈敏以後，工匠與機械的能力，便在他掌握之中了。同樣地，我們的知識工具文學，一旦達到了一個新的效能平準以後，我們亦可以預期到研究範圍的無限擴充和更深遠的參透事物的真實了。

現在不但是在磨礪及精鍊腦力，而且還有我們先人的心目中或已見到的知識的分量與特

質的無限增長。個人的腦力，既日臻精巧，而且還有一種集體的腦力，如百科全書，基本的知識體系，這些都是把所知的一切，累積起來，整理起來，有秩序的歸列起來，而備隨時採用。百科全書的組織，集中於巴昔郎那，有工作人員一千七百萬，是人類最可紀念的一件事情。牠的爪牙在一方面伸展至於千百萬的調查者、通訊員，在另一方面使教育的進展與知識的步驟時時消息相通，牠的發達，非常迅速，因為有着不絕地增加的工作人員來為牠服務。人類的知識機械，尚在萌芽的時代。或者可以說是到了青春發育期。因為人的知識方生長起來，開始感覺到牠是多麼的幼稚。

八 興趣的純化

在今日，一個普通的人，不獨比較三百年前的人來得老成與嚴整，而且他的工作，亦大有不同。在他日常生活之外，他的興趣擴伸到很多旁的事情上去。

三百年前，百分之九十之人類如果不是專注於日常生活的直接生產，便是圖謀怎樣地去由牠們的原出產者手中奪取過來。直接的生產者，農民與苦力，企業家，他們的管理人與指導者，以及

直接的分配者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其餘都是干涉者、放債者、地主、租賃者、律師、投機者、寄生者與盜賊，這都是當時人們所認為經濟發展上不可少的人物。法律界、有勳爵者及教育界，除了為軍事目的而被徵兵的不計外，佔其餘的人口百分之五六，而從事藝術、科學、社會及政治思想的研究的人，亦即整個社會的神髓，數目很小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五。

大多數人的興趣是完全限制在工作與佔有的競爭方面。他們是不絕地打算為他們自己利益而工作，或是為僱用者的個人利益、安享與幻想而工作。他們不得不維持自己的飯碗，或打算另尋門路，而職業一事，在經濟恐慌的時期中，是令人很絞腦汁的一件事情。他們的所獲，不能不小心掙節，妥為保守，因為各處都有匪徒，在想無代價的擷取財物。有時，深感生活狹隘，不能發展之苦，使有人會鋌而走險，作投機賭博的事業，以冀萬一之僥倖，而對於大多數人，這種事是充滿着失望和自譴的。在這些煩惱之外，還攪雜了一些戀愛，大量的憎恨，和苦悶的掙扎於光明之途，渴想獲得人家的稱譽與信任，這一切的原素，便充滿在一九三〇年百分之九十九人類的腦中了。他們不能超過這個狹窄的興趣範圍，這種興趣範圍，並不見得比禽獸的興趣豐富，也沒有超過禽獸的能力啊！

新式國家已經把每個人的狹窄的興趣範圍打破了我們今日仍然是像祖先們具着同樣的腦子，筋絡、纖維莫不如舊，但是我們卻不再用我們的腦子去做與祖先們所做同樣的事情了。新式國家有大量的供給，限制人口的增加，已經把追求衣食、爭取食物及互相競爭排擠的興趣，排出人類腦筋活動的範圍以外。一個很少數目的專門工作人員在那裏監視着以前那些偏執的消除。人們不須再爲衣食、住、衛生與個人的自由而感覺苦悶了。我們必須做的工作，並不是厭煩的工作，而是教育指導者替我們選擇好的最適宜於個性的嗜好與特長的工作。當工作完成了，自然知道牠的結果；世界上不再有人來欺騙奪取我們的所得了。我們仍在競爭之中，而且比前更甚；嫉忌依然與仁惠作戰，個人的情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所不同的地方，便是我們對於工作的興趣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而且我們的競爭，是爲了表現特點，獲得鑑賞與自許而奮鬥，並不是爲互相中傷。現在一個平常人的腦力，比較可以大爲舒展，不復爲昔日的煩惱所困了。

這些原始動機的逐漸泯除，很明顯地便是由『罪惡與懲罰』的統計表上所觀察出來的最爲明顯。那便是行爲管理部的訓練組所發行的關於犯罪，故意妨害社會秩序，及懲罰和糾正方法

的統計。在崩潰時期的統計是不齊備的，而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間，比較安寧與繁榮的時代，便有很多材料，可供參考。那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健全的最守法的國家了，但是就統計所見，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來，似乎是一個罪惡之藪！偷竊、各種拐騙、偽造貨幣、黑夜行竊、強暴行劫、毒殺與他種暗殺，都是日有所聞。似乎為財產而作奸犯科之事是永遠不會停息的。由煩悶苦惱，而至於自殺的案子，也是不可勝數。但是現在所有這種罪惡，在缺乏的時期裏，為錢財而犯的罪惡，都在人類的生活中幾乎完全消滅。二一〇四年，行為管理部的報告（二一〇五年的尙未刊出）記載着整個世界裏祇有七百十五件的偷竊案子。而每一件案子中的偷竊目的物，不外個人的美術品，小的珠寶，一塊花邊，一隻寵愛的家畜，幾個小孩子，以及——在一件案子中——一個新的白色燈泡，這些案件的發生都是由於佔有與保存慾所驅使的。到底是否還有其他不能破案與不曾報告的案子，我們是不得而知了。

無論怎樣，犯罪總不能一時被廢除的，只能設法減少牠。可是財產上的犯罪，一旦減少到舊世界統計數字的千萬分之一，他種的犯罪，亦見得減少。但是很多種的人，仍舊很容易犯不法的性行

爲的罪。貌美可愛的人，尤其是可愛的兒童，仍是不能完全避免誘惑、脅迫、煩擾與傷害。妬忌仍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慾，尤以在四十歲以下的人爲甚。行爲管理部記載了幾乎有五十二萬件這樣的案子，大多數是各種的淫暴侮辱，而釀成了六十七件暗殺案。而且有二千一百九十二件自殺案。這些數目，和以前十年的數目相比，不過祇有極微細的改良。

還有一種罪，是除非把美國所謂『毒害』(Malignant mischief)罪歸入此列。往昔的犯罪統計中找不到相同的，那便是騷擾、毀壞、侮辱種種犯罪；這一類的犯罪，是由於嫉視他人的成功，往往於不知不覺之中所生的競爭上的妬忌與憤恨而起。這種的不端行爲是有各種的不同，由一個不能自制的『爲我』主義者的憎恨以至於『夜郎自大』者的不喜他人來批評他，比比皆是。總共有四件暗殺案，數百件侮辱及毀壞案，可以見得這個世界尚不是一個適合於各種人類的天堂。他們若不因爲內心的需要而感覺痛苦，便是爲他人所激怒。但當我們細察去年的犯案總數時，把很微小的案件都計算在內，祇佔二五〇〇兆人口中的七十五萬。由數目上所見的短短的兩個世紀中，人類進步，足以證明人類的前途是大可安心的。人類的腦海中，並不是永久地作惡念了。惡念

的萌發，乃是偶然性的，所以我們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際工作，便在如何地去減除這些偶然性的罪惡發生。

腦力的健全豐富，由於物質的豐富所養成，這種腦力必須找求新的出路，以求精神上的寄託。在舊制度中寥寥無幾的創造人，好新求異的人，有閒階級的歡喜研究發明的人，此時已經成爲一個有力的團體，從事於研究、試驗、分析與紀載的工作，現在此等人數，竟佔了人口的一大部分。

我們今日知道得很清楚，人類的腦力既由饑寒恐怖各種困厄中解放出來，不獨很快便有創造與領導的慾望，而且會有仁慈與輔助的動機。所有從事於生產分配，及交通事業的人，目的都是因爲他們感覺工作有興趣及樂於幫助他人。大有一種爲人服務較勝於爲一己作事的熱心。今日大商店中的理髮匠、鞋匠、成衣匠、帽匠等等與我們會祖時代爲人所輕視的人物，迥然不同了。他們最大的興趣，在使顧客們美觀與安舒，並不是爲僱主去謀利益。在舊文學中，我們可以看見人們對於理髮匠、成衣匠、修鞋匠都鄙視厭惡。原因便是修鞋匠祇知補綴破鞋，理髮匠祇知剪髮，而成衣匠祇知裁衣。此等都是人們所視爲下賤的工作。但是舊世界裏的理髮匠，將不能認識他今日的理髮

牙醫的地位了；他是一個仁慈的專門家，治理我們的牙齒，細審口部，頭髮與皮膚，以察視是否有不健康的徵象，他能使我們精神爽快，且予以勉勵與警告。往往在他爲我們理髮理齒的時候，他的朋友成衣匠會走進來，參加談話，觀察我們的勇敢與進步的精神，而且貢獻許多改良習慣的方法。

舊的分配商業，與顧問的職業，並不劃清界線了。牠們現在與替代舊時代的教員、看護、保姆等等的進化指導者，及替代家庭法律顧問、宗教牧師及醫生等等的普通顧問，時時聲息相通。這種顧問與指導的職業，比較十九世紀的律師、教育家與醫士的人數，超過兩三倍。他們又成爲另一種組織，是爲專門的教師，所做的是關於發展與分播技術及建設與維持共同的思想。這個組織，又不知不覺的變爲一種更深進的組織去從事於專門技術、文藝、美術與科學研究的工作。

初級的生產與運用原料者，我們的農業學家、工程師、化學師、運輸人與工業的指導者，也是爲了他們喜歡這種工作纔做的。他們感覺工作的滿意，他們喜歡那些原料，那些困難以及當時的程序。雖然每一個人的出產日漸增加，我們所用的東西也日漸趨於種類複雜製造精密，而就社會方面或個人方面來看，在人口中這一部分的數目並沒有增加。效能仍是超過要求與慾望的。兩年半

以來成爲我們教育中的必要部分而且供獻大部分勞作的強制公衆役務，還是不能免的。

這種解放人們能力，不爲物困的過程，似乎是無窮盡地繼續下去的。而所有創造與維持整個世界生活的勢力，便指導着這剩餘的能力向新知識的建設與新經驗的積累上做工夫。人們比較上好奇、激動、大膽、精巧與愉快地工作着，一年勝過一年。我們知道世界的可能性與自己的能力愈多，便知道我們的遺產愈富。這個對於人類似乎非常嚴酷的地球，此時已經發現她的恩惠，真是沒有窮盡。而人類的最大發現，便是發現了他自己。里昂那都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具着淵博的目光，創造的熱狂，他的好奇心，他的工作的能力，是世界上產生的一個前導的先鋒者。

九 生命歷史中的新局面

由生態學家的觀點上看來，新式國家的建設是開了生物學歷史的一個新紀元。人類已經適應於變動中的環境，在以前，這種環境是可以毀滅他們的。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大發展與大危難，昭示我們，人類是在不可補救的水深火熱之中掙扎着。

千百萬人的苦心孤詣，無數的無名英雄的竭忠盡誠，及時對於起初那種只知掙扎堅持以避危就安的方法，與以一定的方式，示以明白的目的。這個被恐怖的人類，乃至於再陷入那個曾經吞噬了許多勇敢的以生命作嘗試者的萬人坑中去。在痛苦和不安定之時，牠爬過了危險的最高峯，現在牠已掙扎着而達到了這樣確鑿、了解與安全的水平線，爲一向人類所不能獲到的。

靠了教育訓練與社會訓練的力量，人類獲得了很多特質，沒有牠，他是不能繼續地生存的。在將來，當選擇的工作，爲優生學的力量所彙集與指導之下，這些由學習而得來的特質，將與他的本來天生的性質混合，而他的教育的能力便將解放出來，再作其他的適應。一代一代地過去，他將成了一種新的人類，漸漸地與那個悲涼、殘忍、狂誕、曖昧與可怖的自稱爲原人（*Homo Sapiens*）的東西，相隔愈遠，愈爲不同了。

未來的人與過去的人不同的地方是繁多而且複雜的，但有幾個大綱已經表現出來。我們已經注意今日人們與先人的壽命長短的區別，現在已經延長了青春期，而把壯年由三十五歲移到八十歲了，我們也曾說過今人體格的發展比較完全，因爲有強有力的精神去抵抗傳染病，中毒與

發育上的種種病症。或者我們還只在初步變更體格的時候呢！過去的審美觀念，對於決定人類體格變更的趨向，亦有甚大的關係。但這些體格的發展，雖是緊要的，然而尚不及方在進行中的道德的轉變來得重要。把這些作一個簡單的敘述，恰好把這一部歷史作一個結束。

最重要的，便是個人對於種族生活的關係，亦經重新安排。當我們回想到百萬年前的世界，便可以見到祖先的種類根本上是個人主義的。除了性生活與保護雛兒的本能，這種人是獨個兒流浪的。他沒有結隊覓食，沒有自衛聯盟，他的獨居生活，與一隻老虎實無以異。他是由這個階段，再經過與人接觸的階段。成人的生活中，因為有未成熟的特質保留着，所以仍有這種最初的生活階段的情態。同樣今日剩餘下來的獅子，也有這種情態。牠們還有理性的，而現在牠們成爲友善，比較幾萬年前牠們那種行動的時代，已相差得很遠了。人類是經過了一個像現代獅子那樣好羣的階段，而到了一個像狼與獵犬那樣好羣的階段。

但是人類卻不終止於此。所有他的生活環境，都是趨向更大的社會組織，與更大的互相依賴的。他成了一個耕種者，一個經濟的動物，他的社會漸漸地千人萬人地擴展起來，以互相服務爲維

繁的元素。他產生了方言宗教去把這些集合團體的活動力聯合爲一個共同的有力政策。人類歷史，就我們昭示當世的學生的來看，是一個不斷地增加交通與增加互相依賴的故事。不知不覺中，個人物質方面的自由是經過修改，使與社會的合作不相違背。

我們必須注意於物質兩個字。人類的體力的被屈服與社會化是遠過於他的道德上的屈服。人類的歷史，也便是教育與強迫的歷史。牠是一本給予與獲取的紀載 (A record of give and take)。甚至近日，人類的內心裏，仍舊不脫初民的野蠻性質，所關心的，祇是他自己，他的性生活，及他的子女。他很願意加入侵略與自衛的團體，但只是勉強爲共同的幸福而努力。他不得不爲團體活動的利益而放棄他個人的自由，但是他這樣做，不是出於本心的，必須有了勸告，壓迫與誘惑，他纔肯如此。

人類歷史，不得不成爲宗教與感情的發明與改建的繼續過程，去克服個人的本性，使他馴服與自我犧牲。在每一點的機會上，個人都是想恢復他自己的主動力的。他的『爲我主義』自然而然地在爭佔上風，而希望得寸進尺。

人類的自然的爲我主義，至今仍在積極進行，其強烈程度迄未稍差。但現在他競爭得比較聰明了一點，他認清楚了甚麼是不可能的，個人與社會的長久的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合理的妥協。在初期怎樣的克服爲我的觀念，和訓練牠去做比較牠自己還要偉大的事業的情形，我們已經知道了。

三個半世紀以來，人類意識中感覺到的變遷，便是個人的提高。這種現象是現代歷史的骨髓。大部分人類日常的生活，如覓食、覓居、覓安全等，已經脫離了個人的範圍而成爲社會化了。這樣，人類便可以減除「爲我主義」。牠已經放棄賭博與謀利和其他財產的冀求了。牠已經停止去爲物質而作追逐與奪取了。普通的人，所有競爭的武器與放縱的自由，亦都被剝奪了。現在，甚至兒童也不互相鬭爭的。和平讓步，已成爲我們的第二天性。

所有人類的生活與興趣已經完全社會化了。總括說來，整個人類現在是合而爲一的；整個人類，不論是全部的組織或是分支的組織，彼此都是關係密切首尾相應。雖然聯絡的，並不是肉的帶子，然而是非常有彈性的、無形的、而且精巧的一種維系。在這部世界歷史最後數章中，我們已經特

別仔細，把在世界大戰過程中重要的個人主義，並且也把經過了多少的困難厄迫，人類纔能够達到這個有組織自制能力的現象加以說明。這目前的現象，是由一個比較聰敏的少數人的個性的創造力，在普遍混亂期中，乘機會建設目前秩序的勝利。這個意志堅強的少數人，已經開闢了一個爲前人夢想不到的勢力與豐富的境界。但是新式國家既沒有吸收人的個性，也沒有摧毀人的個性，人類祇在物質的侵略方面受到相當的限制，而繼續着向較崇高的生活享着自由與創業的機會。

個性已經是剝奪了，或者可以說是解放了牠那原始的本能上的獲取欲與保守欲，掃除了自大驕誇與野蠻的虛榮心，而在智慧與知識上不絕地敏捷地生長，對於自己便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自今以後，不復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人，和同類者相搏戰，而成爲一個物種中負責的一部分了。他已經成爲感覺、知識、創造與反應的一個偉大的試驗。

現在人類的團體，乃是一個單獨的組織。包含二千五百兆人之衆，這些人中的個別異點，便如擴展的爪，伸出去試驗學習，使生活臻於豐富，及爲共同的人類引進新的經驗。我們是全體中的一

分子。(註)像這種的事實，在以前我們所知的宇宙內，祇朦朧的顯過一絲淡影。個別異點的感覺，使我們愈覺共同人類關係的密切。我們工作、思想、研究、爭辯，我們冒險與受苦——似乎個人所試的冒險，是永遠困難與危險的；漸漸地我們更加明白，並不是我們的小我，而是那永不滅亡的人，由我們之中，把事情做了出來。

當遲緩地進展的遺傳性抓住了這些社會環境的適應，又當集合的意志克服了個人的動機與掃除了牠現在的人工做作以後，人類的歷史便將走上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具着共同感覺與共同意志的階段。我們此時仍舊是向着這個高峯前趨。當達到這個高峯的時候，人類的生活是多麼的輝煌燦爛呢！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亦非人類心目中所能想像……因為我們方在看着鏡中的花，水中的月啊……

到了這裏，雷汾筆記下來的著作，陡然地終止了。似乎結束得驟然，但是他在這裏寫着『已完』，當然是結束了。我祇作一二句評語，以作一個總結。我從開始便稱這部書作夢書。到底牠是否夢書，

抑或是據他自己宣稱和相信，是未來事物形態的一種神的啓示呢！或者還有第三個可能性。如果說是夢，這部書是太聯貫了；如果說是神的啓示，又使人發生不可置信之念。是否雷氏在百忙與過抑之中，深感不能把世界發展大勢予以詳細的分析，因而作一個簡略的理論，託諸幻想，對於未來的事物作一個預測呢？如果這部書，既不是夢書，也不是預言，牠便是一個世界革命的理論了。很明顯地，牠的命意是：歷史是不絕地發生事故與引進無限的禍患的，直至人們對於現代化的世界國家、社會的、大同的與創造的工作，發生了很大的信心，佔住了整個理想，纔會有變遷。當現存的政府統治生命的理論，今日腐化的宗教與政治的制度，在失敗與崩潰之中，喪失了原來的權威以後，也必定要到了那時，整個世界的重新建設工作，方能實行。而牠必定首先需要像熱心宗教般的男女們的工作，去爲人類創設一個新生活的模式。

(註)這是那個有趣的神祕的聖保羅 (St. Paul of Tarsus 2-62 C. E.) 其著作見 Historical Reprints;

Development of Ideas Series 中 Epistles 一書，並有 Hirsch 及 Potter 二氏所作之分析與評註) 的用

語。聖氏對於耶私 (Jesus of Nazareth 1-30 C. E.) 的簡單的四海同胞主義 (Cosmopolitan fraternalism)

所爲之曲解與引伸甚多。此語後爲基督教之犧牲的僧道主義 (Sacerdotalism) 取而代之。在其復興以前的時期，

保羅使徒思想中，頗有『新式國家』(Modern State)思想的意味。雖然，聖氏之政治上的欠缺公正，竟致與其無可批評的見解，大相悖謬。彼蓋不知血肉犧牲，靈魂不死，私產制度，奴隸制度，為基督教運動之永遠的傷害也。在第一世紀末以前，此語遂完全為習慣上所濫用。又參閱麥肯基 (Ivan Mackenzie) 之 *General Elements of Religion* 2103。麥氏書中，有一章係論及古代作家對於新式國家的預測者，語頗精審，而對於孔子 (551-478 B.C.) 的學說及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354-430) 的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論述尤為詳盡云。